



世纪前沿

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萨义德 戴维·巴萨米安 著 Edward W. Said David Barsamian

梁永安 译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访谈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架建议：文化批评

ISBN 978-7-5327-4667-5



9 787532 746675 >

定价：20.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访谈录

[美] 爱德华·萨义德 戴维·巴萨米安 著 梁永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美)萨义德(Said, E. W.),

(美)巴萨米安(Barsamian, D.)著;梁永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

ISBN 978-7-5327-4667-5

I. 文… II. ①萨…②巴…③梁… III. 萨义德, E. W.

(1935~2003)-访谈录 IV. K83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762 号

图字:09-2008-02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责任编辑 张吉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访谈录

[美]爱德华·萨义德 戴维·巴萨米安 著 梁永安 译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mm 1/16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100 000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667-5/D·096

定价 20.00 元

导论

“我无法过一种没有担当或悬浮的生活，我不迟疑于公开表白我对一个极不热门的政治追求的亲附。”萨义德写道。^[1]

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战争激起了他的政治热忱。一年后，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被定型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面世了。一九六九年，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一番恶名昭彰的话惹恼了萨义德：“看来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他们并不存在。”他毅然决定“接下这个微微荒谬的挑战，也就是去否认她，去清楚说出一段有关丧失与剥夺的历史。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2]

自此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

“为巴勒斯坦人说话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你得到的回报只是羞辱、谩骂和排斥……我有多少朋友避谈这个话题？我有多少同事不愿卷入巴勒斯坦的争论？又有多少自由派人士有时间为波斯尼亚、车臣、索马里、卢旺达、南非、尼加拉瓜或越南的人权和民权请命，却置巴勒斯坦和

[1] Edward W. Said, “Between World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 9 (May 7, 1998) See also Edward W. Said, *Out of Place: A Memoir* (New York: Knopf, 2000).

[2] Edward W. Said, “The Arab Portrayed,” in Ibrahim Abu-Lughod, ed., *The Arab-Israeli Confrontation of June 1967: An Arab Perspectiv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9. See also Said, “Between Worlds,” and Noam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updated ed.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1999), p. 51.

巴勒斯坦人于不顾？”^[1]

他就巴勒斯坦问题所作的高分贝发言让他付出了不少代价。他被污蔑为“散播恐怖的教授”。犹太人防卫联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称他为纳粹。他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被纵火。他与家人都“收到数不胜数的死亡恐吓”。^[2]

超过十年时间，萨义德都是巴勒斯坦国民议会（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的一员，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却对他怒气十足。这不但是因为他主张“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观念”，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不存在军事选项”。他写道：“我对‘武装斗争’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因为这种革命冒进主义只会导致无辜的平民死亡，无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改善。”^[3]

自一九九一年退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后，萨义德成为阿拉法特和所谓的“和平进程”的主要批判者之一。当“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在白宫的南草坪签订以来，他是一片乐观气氛中的罕有反对声音。他一眼就看穿“奥斯陆协议”的底细，并称之为“一纸巴勒斯坦的凡尔赛和约”（a Palestinian Versailles）^[4]。

“克林顿就像个罗马皇帝一样，把两个附庸国的国王拉在一起，让他们握手言和。”他这样告诉我。^[5]

与这种政治积极主义齐头并进的是他对人文学（humanities）的巨大贡献。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他教我们看穿文学对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和中东的再现方式。他也揭发出知识怎样被用来合法化和维护权力。《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

[1] Edward W. Said, “Cherish the Man’s Courage,” in Eqbal Ahmad, *Eqbal Ahmad: Confronting Empire*,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p. xxviii.

[2] Said, “Between Worlds.”

[3] Said, “Between Worlds.”

[4] Edward W. Said, “A Palestinian Versailles,” *The Progressive* 57:12 (December 1993): 22–26.

[5] Edward W. Said, Interview with David Barsamian, *The Progressive* 63:4 (April 1999).

于一九九三年，它与《东方主义》并为萨义德重大文化研究工作的双璧。

奇怪的是，尽管工作繁忙，但这位“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还是抽得出时间来弹钢琴和撰写音乐与歌剧方面的评论。他受到赛泽尔（Aimé Césaire）的一首诗的启迪，并喜欢引用它：

但人的工作才刚开始，
 还有待人去征服
 所有隐藏在他激情暗处的力量。
 没有种族能独占
 美、智与力，
 而在胜利的集合点上
 所有种族都会有一席之地。^[1]

不经意地，诗歌在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们在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见面，而我有一点点紧张。他一开始就问我不是准备了“好问题”，这让我的紧张有增无减。一直到我提到当代巴勒斯坦大诗人达维希（Mahmoud Darwish）的一首两行诗，我们的谈话才开始热络起来。接下来的那些年，我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最后汇整成为《笔与剑》（*The Pen and the Sword*）一书，由共同勇气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

要用笔墨形容萨义德的巨大活力、知性激发性和热忱是很困难的。他喜欢透过谈话交换意见。读者也许会有兴趣知道，他在接受访谈时都是随问随答的。我们没有事先彩排，问题也没有经他事先过目。

[1] Aimé Césaire, “At the Rendezvous of Victory,” trans. C. L. R. James, quoted in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p. 280. Edward W. Said, “A Palestinian Versailles,” 22 – 26. David Barsami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W. Said, *The Progressive* 63:4 (April 1999): 34 – 38.

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萨义德就为了对抗白血病而战。他进进出出医院，周而复始地接受治疗。在这中间，他尽力写作和讲学。他的敌人希望他闭嘴，但诚如他在本书的其中一篇访谈里说的：“除非我死掉，否则这种事不可能发生。”^[1]

巴萨米安 (David Barsamian)

[1] See p. 82.

目录

导论 / 1

第一章 单一国家方案 / 1

第二章 二〇〇〇抵抗运动：巴勒斯坦人的起义 / 21

第三章 他们希望的是我闭嘴 / 50

第四章 恐怖主义的根源 / 73

第五章 以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看以巴冲突 / 93

第六章 在胜利的集合点 / 111

第一章

单一国家方案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KGNU 电台

· 阿拉法特 (Yasir Arafat) 的健康明显欠佳。他会抖，形容憔悴。你对他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吗？

上星期我相当凑巧遇到阿拉法特的一个忠实追随者（我们坐同一班机），他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健康好得不得了，只是有一点点抖，如此而已。但其他人却相信他得了帕金森症，一个住在加沙地带、不久前见过他的医生也是这种看法。不管怎样，过去一年来见过阿拉法特而又跟我谈过话的人都表示，他的灵活性和警觉性都大不如前。所以我怀疑帕金森症之说是真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抓住一切不放。大至国家文件小至下属请假单都要经过他签署。任何事情都要先经过他的办公桌。他仍然是个鸡毛蒜皮都管的总经理 (micromanager)。他的大部分下属（包括他的部长）都有怨言，却没能力改变什么。

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大多数人都忽略的：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地区内最大的一名雇主。除了臃肿的官僚体系以外，他的安全卫队

人数高达四万。^[1] 这是非常没有生产性的经济部门。除此以外，拜他的消费习惯所赐，自治政府对任何下层建设毫无认真的投资。所以，依我所见，巴勒斯坦现在的状况是死水一摊，一天比一天坏，而这主要是归咎于他的统治方法。他关心的只是抓牢权力，确保没有对手挑战他的地位或政治结构发生任何改变。就像约旦的统治者一样，他的权力大部分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所授予的。

主流媒体完全知觉不到有什么正在发生着

· 你的书从前在阿拉法特统治的地区被禁。现在还这样吗？

确实情况很难知道。你可以买得到它们。它们偷偷摸摸在流通。在一个电子邮件、影印和传真大行其道的时代，没有什么是真的禁得了的。一年前我在那里的时候，被一个杂货店老板认出（他也卖书）。他告诉我：“我有卖你的书，但都是放在柜台下面，以防有‘民族权力机构’^[2]的人经过看到。”那是在希伯伦市（Hebron）。更讽刺稀奇的是，在我的书被禁的一年后，我收到资讯部长拉布的（Yasir Abed Rabbo）——禁书令就是他签署的——一封信，想征得我的同意，让他们可以在约旦河西岸出版我的书。^[3] 我当然不同意。

· 以色列的情况怎样？

[1] Barton Gellman, "Netanyahu, Arafat Sign Accord,"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4, 1998, p. A1.

[2] 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即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译者

[3]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Palestinian Lawmaker Condemns Book Ban," August 23, 1996.

可以买得到。

· 其他阿拉伯国家呢？

视情况而定。我没做过调查。在埃及和黎巴嫩几乎都可以买到。我听说我的一些书在约旦被禁而另一些在不同的波斯湾国家被禁。但这是每一个作家都会碰到的事。那些国家行的是独裁统治和君主专制，做什么事全凭一时高兴。哪个当政者看不顺眼什么，就会说：“我们不应该让它流通。”于是那东西就被禁掉了。他们有时也会禁掉某一期的杂志或某一天的报纸。所以情况是完全没有一定的。但我从黎巴嫩那里的出版商得知，在一些较大的波斯湾国家，例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阿拉伯文译本是被禁的。我想摩洛哥和突尼斯也是同样情形。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我不认为他们目前有进口很多书。

· 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你对所谓的“和平进程”的批判就没有停过。多年以来，主流媒体——至少是美国的主流媒体——都蓄意忽略你。不过，最近你的曝光度却大大增加。《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全国公共电台、公共电视网都看得到你或你的文章。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并不只是因为我的批判奏效，而是有许多人现在已看出事实的真相。我们刚才谈到审查制度，而美国这里也有一种变相的审查制度，那就是把你边缘化。你上不了主流媒体。但现在的情形却稍微有点不同，人们可以从网络上读到你发表在别处的东西——比方说我发表在阿拉伯国家报章的文章。《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之所以会邀我写一篇东西，谈我为解决以巴问题而提的双民族国家（binational state）构想，就是因为他们有人在网络上看过我的文

章。^[1] 它的主编打电话给我。他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不只和平进程行不通，犹太复国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他们想寻求一些新的见解。不过，我不认为这代表美国媒体真有什么洗心革面的改变，而只不过表示他们愿意朝旁边瞄一眼：他们想要显得有包容性，所以把我也包纳进去。这一点，只要看看一般媒体对最近一连串事件——比方说和平进程在“怀伊协定”（Wye agreement）后的冻结、以色列大选的逼近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之死等等——说了些什么就一清二楚。全都是老调重弹，同样一套刻板印象，同样一套旧的论述。那是一个不动如山的系统，完全不受事实或真相的触动。这是很让人错愕的。主流媒体完全知觉不到有什么正在发生。我还记得有一次应邀上公共电视网的《查理·罗斯秀》（*The Charlie Rose Show*）。^[2] 罗斯反复要向我灌输老掉牙的观点，不让我把任何一句话说完。我要说的话太惹人生气了，他不允许我说出来。

公民权的标准不应该以种族为依归

· 为什么现在你要呼吁建立一个双民族的国家？

自从一九四七年底离开巴勒斯坦以后，近年来是我人生第一次会定期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走走。去年我去了五次。我去得愈多，对一个事实的印象就愈深刻：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分布是不可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是第一件会让你震惊的事。以色列人是筑路狂。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筑了很多路，但这些路是刻意避开巴勒斯坦人的城镇和村庄的。尽管如此，这个地方太小了，巴勒斯坦人和

[1] Edward W. Said, "The One-State Solu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0, 1999, p. 6; 36-39.

[2] Interview with Edward W. Said, *The Charlie Rose Show*, WNET-TV, June 6, 1996.

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完全不相往来的。其次，许多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雇去建筑和扩大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屯垦区。这真是最大的讽刺之一。另外，也有些巴勒斯坦人在特拉维夫、西耶路撒冷和海法打工讨生活，例如当餐厅侍者等。约旦河西岸的情形也是一样。希伯伦之类的城市看得见屯垦者，更不用说是耶路撒冷及其周遭地区，其中包括贝特哈尼纳（Beit Hanina）这样的巴勒斯坦人大镇——它过去从不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但现在却成了耶路撒冷市界的一部分。所以，不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互动有多么冷漠和带有敌意，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个事实，不是你把人们推到另一条边界后面或另一个国家而可以改变的。打从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开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就已牵扯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意味着必须采取某种安排，让人们可以和平生活在一起。和平，是不可能透过隔离实现的。

另一个我想很重要的因素是，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年轻一代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他们的领袖是国会议员毕夏拉（Azmi Bishara）。他们一直跟以色列的犹太人住在一块，但身份却有如二等公民——有时甚至如同非公民，因为他们没有迁移或拥有土地的权利。他们强烈意识到了自己是被压迫的少数族群，正为民权和公民权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受到世俗化以色列人的非公开的支持。这些以色列人相当忧心教士阶层的权力过大、法律会愈来愈有宗教取向，以及正统派的力量会压过保守派和改革运动。这一切汇聚为一种重要的舆论（美国媒体对此又是只字不提），人们开始谈到制宪的问题（以色列是没有宪法的），谈到公民权的标准不应该以种族为依归，应该让阿拉伯人拥有全面的公民权。这种发展趋势让我非常动容。我跟这两边的人都谈过话，有分别谈的，有一起谈的。这是一个错不了的思想趋势。

第四个让我有此想法的因素是人口学上的现实。到了二〇一〇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人口就会势均力敌^[1]。我谈的不是全世界的巴

[1] See Meron Benvenisti, "The Return of the Refugees Won't Tip the Scales," *Ha'aretz*, July 8, 1999.

巴勒斯坦人或全世界的犹太人。我谈的只是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情况。那地方太小了。南非要比以色列大二十倍，却仍然维持不了种族隔离政策。以色列是四边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到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人口旗鼓相当之后，它更不可能把一种实际跟种族隔离无异的政策维持下去。如果你把中东地区其他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加进来，人数更是大大超过以色列。

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我认为除了建立一个双民族的单一国家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当然，这个目标要能实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看来犹如一种乌托邦——有些人甚至会认为是狂想。但只有这个奠基于平等愿景的构想能让人们活下去，而不是一心想着把对方消灭。我努力去激起人们讨论和反省，看看有哪些办法可以让这样的国家诞生或存活。

让我们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不存在思考他们

· 你的包容主张和“单一国家”方案，跟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一个旧流派是呼应的。

就像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我也读过以往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我在这里是用最宽广的意义来使用“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的。他们中间有些人相当有器量，比方说布伯（Martin Buber）、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马格内斯（Judah Magnes）。他们明白，如果把侵略性的屯垦政策一意孤行下去而罔顾阿拉伯人的感受，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就连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也说过，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民族会自己拱手相让，任由另一

[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以色列的主要缔造者和首任总理。——译者

个民族把他们的土地抢走。^[1] 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早知道冲突在所难免。马格内斯特别意识到这一点，他事实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读他的东西愈多，思索他的话愈多，你愈会发现他是走在时代前头的，是颗不平凡的心灵。有意思的是，他是个美国人。他说：“让我们用更道德和更深刻的方式思考阿拉伯人问题。让我们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不存在思考他们。”我发现，这种精神或明或暗也见于新一代以色列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他们耙梳各种历史资料和档案文件，重新检视了以色列的国族论述，发现它的独立和解放神话是奠基于对阿拉伯人存在的否定、擦拭或顽固的回避。^[2] 以色列过去五十年来所做的事当然不是为了寻求安全。没有安全是这个样子的。以色列一直努力要维持一种隔离阿拉伯人的政策，但这种政策总有行不通的一天，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学上的趋势，另一方面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巴勒斯坦人愈挨揍愈不肯屈服。他们甚至愈来愈决绝和顽强了。

所以那是一种清新的舆论，是从犹太复国主义内部产生的。我无意去否定它或批判它。但要知道它基本上是犹太人内部的辩论，而不是发生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布伯、阿伦特和马格内斯这些人确实想要照顾巴勒斯坦人的需要，可惜事情最后却朝两极化的方向走，这是因为英国人满肚子权谋，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班子——卡曾尔森（Berl Katznelson）、本-古里安和魏兹曼（Chaim Weizmann）^[3] 之流——又都是相当聪明的政客，让马格内斯这些个人——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些个人——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那是个相当有局限性的辩论，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太高估其重要性。

[1] See Simha Slapa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Croom and Helm, 1979), p. 143.

[2] See, among other works,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 - 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Ilan Pappé, *The Making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7 - 1951* (London; I. B. Taurus, 1992).

[3]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以色列首任总统。——译者

我想，像我这一类有幸不用住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不用面对日复一日压力而可以站在一定距离外反省的人，该做的是引发讨论和辩论，把敌对阵营的成员也引进讨论之中。这种事情或多或少已经开始发生。现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知识分子经常会对话，经常会举行会议，但他们的讨论不像过去那样，是着眼于政府的方式解决问题，类似和平进程的一种附属品。那一类的讨论过去已经相当多，但都一事无成。现在的则是一种全新的讨论，赖以奠基的是耐心的学术研究、仔细的档案文件耙梳工作。它不是由有政治野心的人所发起。它主要是学术性的，参与者是些远离主流政治而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圈拥有一定地位的人。这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我不认为媒体对这方面有足够的关注，它们都是一心一意盯着迈向失败的和平进程的动向。

· 以色列本土有20%左右的公民是巴勒斯坦人。^[1] 一九九八年底，你曾经有机会在你母亲的出生地拿撒勒（Nazareth）跟他们其中一些人谈话。但你们谈话的场地有个匪夷所思的名字叫“弗兰克·辛纳特拉堂”（Frank Sinatra Hall）。

那是弗兰克·辛纳特拉捐钱盖的，他是以色列的大力支持者。我想那是一九七〇年代的事。他被说服，在拿撒勒盖一座场馆。拿撒勒是一个以阿拉伯人占大多数的城镇，但也住着些犹太人，主要是住在拿撒勒上城区。其原初构想是盖一个运动场地，供阿拉伯人和犹太少年一起打篮球。虽然场地盖好了，但显然没有能发挥作用。后来它被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所接收。经过一段时间，它成为一个出租的场地。你可以租它来开晚会或举行什么活动。我注意到，那地方除了有个大礼堂，还有一家咖啡馆、一家酒吧和一个撞球场，是人们聚会的好地方。

[1] See Martin Sieff, "The Israeli Arabs-A Ticking Time Bomb,"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ctober 2, 2000.

那次演讲是毕夏拉为我安排的，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接触到身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但凡有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就会有几十又几十个的派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也不例外。来听我讲话的那群人基本上是毕夏拉的信徒，他们有老有少，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奇者，他们因为从未看过我而想看看我。那是个有意思的晚上。我被问到我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被问到我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立场的。但他们知道我思想立场的人并不多，有些甚至连我这个人都没听说过。

所以那是次有趣的练习。参加者基本上可以自由发问。他们可以问我任何想问的问题。身为一个对语言感兴趣的人，透过他们的发问和评论，我可以听得见其他阿拉伯政治立场的腔调——复兴党（Baath）的、纳塞尔派（Nasserite）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也注意到他们有一种独立的声音，反映出这群人有着跟其他所有阿拉伯人不一样的经验。他们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住在一个犹太国家里，所以要比任何其他阿拉伯群体更熟悉以色列人。他们每天都会碰到以色列人，例如在大学里或职场里。

这使得整个讨论显得更加有趣。我们可以直接谈以色列，也没有人忌讳谈宗教的问题。由于毕夏拉原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则是个相当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来听我讲话的基本上都是世俗化的人。听众中间也说不定夹杂着穆斯林。但我在很多阿拉伯国家都碰到过这种人，他们总会在听众当中，而有时你很容易就把他们认出来，例如在埃及，这一类人女的会戴头罩，男的会蓄大胡子。但我发现这些穆斯林对待我的态度有一种有趣的模式，那就是尽管我等着他们质疑我的论点（因为我是个世俗化而又对宗教化政治立场语多批评的人），他们却很少会说话。他们很少问问题，很少公开与我辩论。拿撒勒的情形也是一样，完全没有人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发言。大部分发问者都是想多知道点外面的情况，想知道我对和平进程有何感想。当然，每个人都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替代方案，而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重点是他们都热中参与。

今年三月我会有另一个与他们接触的机会。我要到拿撒勒三天，参加一个阿拉伯学者的会议。拿撒勒的以色列人类学协会也邀请我在他们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对我来说，这是个极有价值的机会，因为一向以来我的去处都是局限于阿拉伯人的地方，又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那里处于被围困的状态，是一个外地人也可以感受得到的。但不管我到哪里，都可以感到不同世代之间质的差异。在我看来，新一代无疑拥有一种新的勇气和怀疑态度。大部分二十岁出头的巴勒斯坦人都看得到知性上的好奇心，比他们年轻的人也是如此。那是在我这一代和下一代巴勒斯坦人身上，我所感受不到的不同气氛。

· 这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一九四八年那场“大灾难”（al-Nakba）的洗礼？

部分与此有关。但也跟我先前提过的情况有关。人们现在可以读到他们在五年前还无法读到的东西。现在有网络，有电子邮件，还有快速流通的地下文学（samizdat）和各种替代性媒体，也就是各种有别于官方媒体的电视、电台。别忘了，谈到媒体，这地区可是世界上媒体最高度饱和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可以通过卫星天线得到各种资讯。他们可以收看阿拉伯国家的电视，也可以收看 CNN。所以他们会作出比较。媒体的多样性大得惊人，人们比从前更加渴望去探索、辩论和讨论出替代方案，年轻人之间尤其如此。从这一点来说，目前的局面比我在一九六七年所面对的局面要乐观很多。人们热中交换意见，谈未来可能的政治转变。

· 听说你在前往拿撒勒的路上，凑巧载到一位搭顺风车的巴勒斯坦年轻人。你们之间有一番具启发性的交谈。

他是个年轻人，住在离杰里科（Jericho）不远的村庄。当时我

正取道阿富拉 (Afula)，要从拉姆安拉 (Ramallah) 前往拿撒勒。阿富拉是位于“绿线” (Green Line)^[1] 里面的以色列小镇。我们是在纳布卢斯 (Nablus) 的外头遇见。他告诉我们他是个赌桌管理员，在杰里科一家新盖的巴勒斯坦赌场——和平进程所带来的奇怪产物之一——接受训练。因为正在受训，所以他只能以搭顺风车的方式通勤。等几星期后训练结束，他就必须住在那儿，因为赌场为员工盖的宿舍届时就会完工。赌场的大股东是奥地利人，但阿拉法特的“民族权力机构”也拥有30%股份。^[2] 以色列人是主要客户，因为以色列是禁止赌博的。他们到赌场，把大把大把钞票花在赌“二十一点”、轮盘和“比九点”上。赌场的外籍雇员和经理都住在离赌场不远的以色列屯垦区。

这家完全没有生产性的赌场是个奇特的组合：由外国人拥有、经营，由巴勒斯坦人支持。当然，“民族权力机构”可以从中牟利，但那钱是不会用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有一小群来自邻近村庄的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工作，伺候前来消费的有钱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我想也包括有钱的巴勒斯坦人。听说，不久以后，那里也会有保龄球场和游泳池。如果这世界有什么地方是最难想象会出现赌场的，杰里科一定是其中之一。它是地球上海平面以下最低的一片陆地，在夏天，即使是有遮阴的地方，温度也高达摄氏六十度。它不是那种在一般情况下你会想要去的地方。如果说那赌场的存在可以代表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的未来的话，那可是个不让人乐观的未来。

· 这赌场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甚至包括苏哈·阿拉法特 (Suha Arafat)，也就是阿拉法特的太太。据《纽约时报》一篇头版文章报导，她称那赌场为一种“耻辱”。“我恨它，”她说，

[1] 绿线是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边界的俗称，确立于一九四八年，因在地图上是以绿色标出，故名。——译者

[2] Deborah Sontag, "Arafat's Gamble: A Casino for an Israeli Clientel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1998, p. A4; Agence France-Press, "Palestinian Authority Admits Squirreling Millions Away in Secret Slush Fund," July 5, 2000.

“这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顾问做过的最可耻的一件事。赌场就开在一个难民营的正对面——不多也不少。我们没有医院、没有下水道，生了病的小孩缺人照顾，但我们却有赌博。了不起。”^[1]

她是个复杂的角色。她会开着蓝色的宝马在加沙地带到处兜风。她很多时间都待在巴黎。她在圣路易岛有公寓。她的发型师和服装设计师都是巴黎人。她的家族介入商业买卖。除了转移一点点人们对整个恶劣局面的注意力以外，我不明白苏哈·阿拉法特这个新角色的戏分何在。她那番话固然没有错，但这并不表示她和阿拉法特的其他班底不用对当前的腐败负责任。

两部看似分离的历史其实是交织在一起和相互对位的

· 你离开以色列之后去了埃及，发现那里的人目光褊狭。你为此而惊诧吗？

没有，因为我以前就领教过这种态度。不管是住在以色列还是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都有一种孤独感。他们生活在以色列权力的阴影里，所以自然会想跟其他阿拉伯世界的人有所接触。但身为巴勒斯坦人，你想要从以色列或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前往阿拉伯世界，都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让你在做这件事之前会再三犹豫。另外，任何在阿拉伯世界旅行的巴勒斯坦人都会自然而然受到疑忌。我自己也不例外，虽然我有美国护照，但我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事实却总是会让我

[1] Deborah Sontag, "Suha Arafat: A Militant in a Blue BMW,"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99, p. A1.

被归类。所以说，想要在阿拉伯世界旅行和接触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很困难的。

更重要的是，到过巴勒斯坦人地域的阿拉伯人非常少，而到过以色列的更几乎是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阿拉伯人反对跟以色列“正常化”，也就是反对跟以色列正常交往。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都是这种态度，波斯湾的国家如此，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更是如此。埃及和约旦是唯一与以色列签有正式和平条约的阿拉伯国家。但以色列与埃及间的和平却被形容为冷和平——以色列与约旦的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换言之，一般的埃及人或约旦人是不会到以色列去的，不会跟以色列打任何交道。至于到约旦和埃及的以色列观光客则只会坐在巴士里看看历史古迹。除此以外，彼此非常少交流，不管是大学之间的、学术社团之间的，还是商业上的往来。这种情形，在欧洲国家之间或世界任两个关系和平的邻国间都是绝无仅有的。阿拉伯国家会这样子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以此作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一种表示。

问题是，这种支持反而让巴勒斯坦人陷于一种困境，那就是让他们无法得到本来可以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例如，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或约旦的医生或医学专家本来可以帮助巴勒斯坦人建立诊所或医院的。他们本来可以参与从行政管理到建立制药厂的一系列活动。但因为拒绝正常化，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同样的，巴勒斯坦的大学生读得到阿拉伯各国学者、记者、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却无缘看到他们。

现在到阿拉伯国家接触阿拉伯人时，我都会对他们（特别是埃及人）说，你们是可以去巴勒斯坦的；你们是可以经过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与埃及处于和平状态。你们应该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到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去，帮助他们，训练他们。但我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不，我们不要护照上盖有以色列人的章。我们不要到以色列大使馆申请签证。我们不要在边界或路障接受以色列警察的检查，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羞辱。”

我觉得这种理由在某个层次说服力微弱，但在另一个层次又相当懦

弱。在我看来，如果他们能把自尊放下，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以色列的检查站或路障或边界关卡，就会知道巴勒斯坦人每天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其次，正如我反复告诉他们的，这样做并不代表承认以色列或助长以色列。相反，通过以色列是一种抗议，一种前去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给予声援帮助并表示。例如，为了建立屯垦区，以色列人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用推土机摧毁他们的房子，而如果有大批埃及人和约旦人在那里，那么巴勒斯坦人面对这种日复一日、一分钟复一分钟的威胁，将会更加有士气。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大学。知名作家、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哲学家、电影明星都是可以到巴勒斯坦去的，但他们却说：“我们不想走进开罗的以色列领事馆申请签证。”我说：“你们不必这样做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开罗有大使馆，你们提出要求，他们就会邀请你们到加沙地带，然后你们可以再到约旦河西岸去。”

所以，要到巴勒斯坦人的地方，是有很多迂回的方法可以使用的。阿拉伯人的心态与其说是一种目光褊狭，不如说是一种懒惰，一种袖手旁观，指望别人会代劳。缺乏积极性——我想这正是我们的大敌。我们总是认定以色列跟一些美国人（比方说福特基金会）在搞阴谋。另一方面，有很多人想要跟他们做生意，却又不肯公开地做。所以他们就偷偷摸摸地来，但在公开场合说的又是另一套：“我们不准备接受正常化。我们拒绝跟帝国主义打任何交道。”我们拒绝坐下来，研究一些能真正帮助巴勒斯坦人的方法和跟以色列打交道的办法。以色列可不是虚构的实体，而是一个真正的强权，它在很多方面都对阿拉伯人的生活有负面影响。

我觉得，这种消极态度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没有一家我知道的阿拉伯大学是设有以色列研究系的，也没有人研究希伯来文（当然，这些大学都是高度政治性的，而其教授与学生也要承受各种不同的压力）。就连巴勒斯坦人的大学也是如此。这当然是可理解的，那是一种抵抗强权的方法，一个在我们生活各层面施压的强权。然而，在我看来，面对以色列，学习它的语言，才是唯一的救赎之道。很多以色列的政治学

家、社会学家、东方学家和情报人员都花时间去研究阿拉伯社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研究他们？这是一种认识你的邻居、你的敌人的方法，是一种打破牢笼的方法。我们继续主动地待在这个牢笼里，只会正中以色列的下怀。

阿拉伯世界的这种消极性和乡愿不只表现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也表现在对美国之外任何国家的态度。阿拉伯世界着迷的是西方，是美国，是哈佛，是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和诸如此类。这样的东西在最头脑简单、最庸俗的媒体上满坑满谷，但却很少有人会去注意印度、日本、中国这些重要的文明。我保证你在安曼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找到有人研究非洲、拉丁美洲或日本。这是一个象征，反映出在历史的现阶段——一个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消融、能力软弱和知识静止的现阶段——我们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不感兴趣。

我一直非常不妥协并相当公开地鼓吹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态度。我们必须挣脱这种自造的手铐，放眼世界的其他地方，并把他们视为与我们平起平坐的国家，与之打交道。我们防卫心理太强了，只会整天感到委屈而一事无成。这部分解释了民主的阙如。阿拉伯人没有民主，不只是因为统治者的专制，不只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不只是因为政权的腐败，不只是因为秘密警察。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缺乏公民观念，而那是非常需要强调和坚持争取的。由于住在那么遥远的距离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透过讲述和写文章反复强调这一点。一个人想要改变现状，唯一的方法是起而行，多读，多问，多接触，挣脱囚笼的枷锁。

· 你反复强调以色列必须承认他们对你的族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做过些什么。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巴勒斯坦人历史很大的一部分一直被埋没了。我们成了隐形

人。以色列论述的力量和强度几乎全来自它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英雄式的开拓者，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建立家园。它没有把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描写为住在城镇里、有自己社会的定居者，而是把他们描写为可以任意赶走的游牧民。建构游牧民角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那确实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来打发作为全体的巴勒斯坦人的方法。跟我谈过话的许多以色列人（特别是我这一代的）都让我明白到，以色列国民教育的一个重点，就是灌输这一套。毕竟，要以色列人承认以下内容是很困难的：他们今天的家园主要是以剥夺、杀戮和驱逐他人得来的，而并不因为他们是逃过纳粹大屠杀的英雄人物。

所以，在我看来，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常化对以色列来说是关系重大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中东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只跟西方有联系的孤立圣所。以色列一直都否定、轻蔑和漠视巴勒斯坦人，这种态度的一个表征是以色列境内的所有路标都是以英文和希伯来文书写，看不见阿拉伯文。所以，如果你是个阿拉伯人而又不懂希伯来文或英文，你就会迷路。这是故意的。这是以色列政府用来把其 20% 人口排除在外的方法。因此，要求以色列在知性上和道德上正视他们自己历史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新一代历史学家责任的一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这才是真相。我想，在上距一九四八年以来五十年的今天，我们可以开始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历史放在一起谈了。这两部看似分离的历史其实是交织在一起和相互对位的。不这样做的话，“他者”（the Other）就总是会被非人化、妖魔化，被变成是隐形的。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对此，心灵的角色、知性的角色和道德意识的角色是关键。必须要找出一种正确对待“他者”的方式，给予他们空间而不是剥夺他们的空间。所以我的这种想法绝不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没有空间的。但我的要求却是把“他者”安置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和空间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关键的不只是研究历史，还要研究地图和地理

学。达扬 (Moshe Dayan)^[1] 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叶说过一句名言：“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建设在一个从前阿拉伯人的聚居点上。”^[2] 他看得见这个事实，而且把它说了出来。他说：我们是以武力取得这些土地的，别忘记这一点。但后来的世代却失去了这种敏感度。所以，任何不受偏见、教条和权威束缚的人都应该采取行动，一步步还原这些地方的本来面目。同样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必须明白，以色列人不是种“附带现象” (epiphenomena)，不像十字军或帝国主义者那样，是我们可以把他们赶回到某个地方去的。必须坚持——我常常这样坚持——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叫以色列的国家的公民。他们不是“犹太人”，不是从前的流浪者，是可以再回到欧洲去的。任何把以色列人视为一种过渡性或权宜性存在的语言都是我们必须完全拒绝的。

音乐的力量

· 巴伦波伊姆 (Daniel Barenboim) 是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和指挥家，生于阿根廷，长于以色列。你曾跟他有过一些有意思的音乐互动。

我们是七八年前认识的，然后相当意外地，我们成了挚友。他像我一样经常出国。我们的路线有时会交错。我们尝试一起做些事情。我们会举行公开座谈，但不是谈政治——因为他就像我一样不能算是政治人——而是谈音乐、文化和历史。身为犹太人或以色列音乐家，他对瓦格纳的音乐很感兴趣。瓦格纳虽然是彻头彻尾反犹太人的，却是个伟大的音乐家。这正是个巴伦波伊姆感兴趣的吊诡：文化与音乐工作相辅

[1] 以色列著名将领与政治家。——译者

[2] Edward W.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2nd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 14.

相成的同时却又会产生矛盾。我们曾经就这个主题有一番对谈，现在正准备整理成书出版。^[1]但他就像我一样，非常不满自己族人保守因循的作风。他近期都没有住在以色列，去年还拒绝跟以色列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在以色列五十周年国庆指挥演奏。他非常反对占领约旦河西岸。他公开赞成应该让巴勒斯坦人建国。他是个有勇气的人，有着一种非正统的人格。连结我们俩的除音乐以外，还有一些生平背景。他随家人搬到巴勒斯坦特拉维夫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家遭驱逐的时候。

我们有着非常诚挚的友谊。最近，也就是上星期，我才帮他在巴尔·宰特大学（Bir Zeit）——约旦河西岸的一所重要大学——安排了一场独奏会。这是他第一次到约旦河西岸演奏，意义重大。安排这场演奏会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解决，但都不是跟他有关的问题。巴尔·宰特大学在抗暴运动期间被关闭了四年。其校长被驱逐了二十年——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四年。直到两三个月前，还有一个学生在校园附近遭以色列士兵杀害。巴尔·宰特大学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嫌隙可说历史悠久。

所以，让一个以色列人来这里演奏是个很难被接受的主意。但各种问题在经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得到解决，而独奏会也得到巨大成功。那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如果我可以代他发言的话，我想那也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为那代表他跨过了一个门槛：他的演奏是纯文化行为，但也是一种团结和友谊的表示。全世界的演奏厅都巴不得请他演奏，而且门票索价昂贵，但他却愿意为巴勒斯坦人免费演出，略尽绵力。他在音乐领域是非常顶尖的人物，是个杰出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但他到巴尔·宰特大学只是以个人的身份演奏。因为那里没有足够好的琴，所以他把自己的琴搬了去。听众基本上都是巴勒斯坦人，而演奏进行的那个礼堂相当讽刺的就叫“卡马尔·纳塞尔”（Kamal

[1] Daniel Barenboim and Edward W. Said,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Nasser Hall)。卡马尔·纳塞尔是埃及总统纳塞尔的堂兄弟，一九七三年在贝鲁特被暗杀。他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暗杀发生当时我就在现场。暗杀小组由巴拉克（Ehud Barak）率领，他是今日以色列劳工党的党魁（同年十一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巴拉克当选总理），当时则是情报部门特击队的指挥官。^[1]

所有这一切让那天晚上的演奏充满高昂的情绪张力，而我深信在场的每个人都不会接收不到它的文化泛音。以色列爱乐管弦乐团的指挥祖宾·梅塔（Zubin Mehta）也来了，他是巴伦波伊姆的好友，是个印度人，支持以色列一向不遗余力。他此前从没到过约旦河西岸，但这一次却来了。眼泪从他脸颊汨汨而下。那是场非常重要的演奏，因为它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宣示。没有人准备要杀谁，或是提出任何的诉求。那是一种人道姿态，是奠基于我和巴伦波伊姆和一群人数愈来愈多的巴勒斯坦朋友的友谊。他的信念是（我认为相当正确），如果以色列想要继续存在，就必须跟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保持一种友好和平等的关系。他无比渴盼可以学会阿拉伯语。他是一个非比寻常有远见的、先知式的天才。像他这样的人不多。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的活动办下去，每隔一段时间办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马友友今年夏天在魏玛（Weimar）有活动。魏玛是今年度的欧洲文化之都。我们计划把一些有天分的年轻音乐家带到魏玛十天。他们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但也有以色列人，年龄介乎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魏玛离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2] 只有一小时车程，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也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这些代表德国文化高峰的人物的家乡。而因为布痕瓦尔德的关系，魏玛跟以色列的建国和巴勒斯坦人的离散多少有关系。那些年轻音乐家将会跟马友友以及来自柏林歌剧院的音乐家同台演奏，由巴伦波伊姆担纲指挥。演奏结束后将

[1] John Kifner, "Israel's Silence Reinforces Belief Its Commandos Killed P. L. O. Aid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88, p. A1.

[2] 纳粹德国所设置的最早和最大的犹太集中营之一。——译者

由我主持一场讨论，谈文化、政治、历史和音乐的关系。入选的都是些优秀的年轻音乐家，是我们从他们寄来的录音带或试演中评选出来的。那个晚会对与会每一个人肯定都是个难忘的经验。

这活动的优点之一——至少在我这个怪人看来是如此——是它没有纲领可言。没有人打算在结束时签署一份宣言。那只是要把一些不同的人集合在一个文化中心，看看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有可能会摩擦出政治的火花，但因为我们都不是政治人，所以政治的一面不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音乐的力量，想要透过讨论和文化来创造一种平等和情谊感，而那是在生活陷于两极化的中东所不可得的。

· 大约八年前，你接受例行性胆固醇检查时发现自己得了白血病。大家都想知道你的健康状况。你现在身体怎样？

谢谢你的关心。我经历了很多段难熬的日子。头三年我不需要接受任何治疗。然后，在一九九四年初春，我突然开始需要治疗，先是化疗，然后是放射性治疗。我大部分时候都是病恹恹的，体重掉了许多。照顾我的是一位极出色的印度裔医师。治疗期间，我沮丧地得知，我得的是一种很罕见的白血病，称为“顽固性白血病”（refractory leukemia），任何已知的化疗方式对它都不起作用。去年夏天我接受了为期十二星期的治疗，用的是一种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新药，称为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我整段时间都是病恹恹的。我一星期要接受这样的治疗三到四次。幸而，我现在处于一种称为暂时性舒缓的状态。这不表示病已经治好。它还是会再回来，但我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不用接受重大治疗，维持大体良好的健康。我现在觉得身体不错。

第二章

二〇〇〇抵抗运动：巴勒斯坦人的起义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九日，纽约市

· 你在论以巴冲突的作品和演讲中反复强调一九四八年的重要性。有什么关于一九四八年的事是人们需要知道的？

我不认为一个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发生过什么事的人，可以了解今日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一九四八年，有一个主要由阿拉伯人构成的社会，从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和摧毁。有八十万阿拉伯人被有计划地驱逐出境。这件史实，相当清楚地记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文件档案里，而有好几个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也在书中谈到过。^[1]当然，这是阿拉伯人早就指出的。到了一九四八年那场冲突的尾声，巴勒斯坦人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少数民族。他们三分之二的人成了难民，其后代子孙（为数约七百五十万）分散到整个阿拉伯世界、欧洲、澳洲和北美。^[2]剩下来那些，在一九六七年以后臣服于以色列的军事占领——约

[1] See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 - 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mong others.

[2] For complete tables and statistics on Palestinian refugees, see the website and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UNRWA): <http://www.un.org/unrwa/>.

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连同东耶路撒冷，全成为了占领区。

一九四八年是巴勒斯坦人开始寻求民族自决的日子。那不是始于一九六七年的。一九六七年只是以色列征服的完成。在一九四八年，不只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土地（94%）被以色列国用军事手段夺去，当成犹太人的土地，而且留下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今天约占以色列全人口的20%——也被禁止拥有任何土地。以色列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国家以犹太人的名义操纵在自己手里的。其次，一九四八年有四百多个阿拉伯村庄被毁，其后又为兴建集体农场（kibbutzim）的以色列屯垦者重建。换言之，每个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其实都是建立于阿拉伯人的产业之上。所以，一九四八年这个化脓的伤口始终存在，但以色列政府却一直说：“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与我们无关。他们会离开是出于他们领导者的吩咐。”以色列动用了各式各样的宣传手段去制造这种印象。直至今日，世人仍普遍认为，巴勒斯坦人不是以色列赶走的。其次，哪怕是在上一次的戴维营会议，以色列都从不考虑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这是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最大心愿。^[1]这是整件事情的核心。

恐怖主义是被压迫者的武器

· 谈谈看大众论述的架构。从“和平进程”（peace process）一词谈起。

和平进程始于一九九三年，当时巴解组织（PLO）与以色列政府签署一项秘密协定。协定中以色列同意让出一些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1] See Naseer H. Aruri, ed, *Palestinian Refugees; The Right of Return* (London: Pluto Books, 2001).

带的土地，给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管治。然而，由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力量强弱悬殊，所谓的“和平进程”实际上只是把以色列的军事占领给重新包装。哪怕是今天，也就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一月，以色列仍控有约旦河西岸60%的土地，控有加沙地带40%的土地。它还兼并了耶路撒冷，到处建立屯垦区。包括耶路撒冷那些以色列人在内，今天大约有四十万的以色列人是非法住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面的。^[1]这是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历史里历时最长的一次军事占领，一共是三十二年。逼近日本对韩国从一九一〇年迄一九四五年的占领纪录。

本质上，和平进程是以接受以色列的一切条件换取的。少量的以色列军队被撤走。屯垦政策不变。耶路撒冷仍然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边界和水源也是由以色列控制。出人都受以色列的管制。安全也是控制在以色列手上。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做的事是要巴勒斯坦人同意让他们把占领行为重新包装。在大众面前，这看似迈向和平的一步，骨子里却是一个弥天谎言。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理解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九日爆发的巴勒斯坦起义为什么会那么激烈和规模这么大。

· “防卫”这个词又如何？

当然，以色列的军队是称为“以色列国防军”。这个名称是为了让以色列军队看起来是国防用途的。美国媒体一直相当误导民众的是，把以色列的军队说成是防卫巴勒斯坦人用的。就此而言，美国媒体简直就像是来自奥威尔的书^[2]里出来的。事实上，除了警察拥有一些

[1] For detailed reports on the settlements, see the website of the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 (FMEP) and its newsletter *The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which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mep.org/>.

[2] 指奥威尔的政治幻想小说《一九八四》。此书以一个想象的将来警察国家影射极权政权的弊害。书中国家的所有书报文献都会因为政治需要不断反复窜改。——译者

小型武器以外，巴勒斯坦人并无武器可言，能对抗以色列的导弹、战机、武装直升机、坦克和火箭的，基本上只有年轻人扔出的石头。最重要的是，战斗都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所以“防卫”是个古怪可笑的形容。以色列军队是一支巴勒斯坦人土地上的武力占领者。巴勒斯坦人致力的是反抗军事占领，以色列人致力的是延长占领，并像阿尔及利亚、越南或印度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军队一样，以平民百姓的生命作为对反抗活动的惩罚。

“恐怖主义”一词呢？

那是一场非常丑陋的冲突，始自一九二〇年代。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把恐怖主义引入了巴勒斯坦。那是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标准伎俩之一，他们把炸弹放置在阿拉伯菜市场之类的地方，以此制造大众的恐慌。这种事在二十世纪三〇和四〇年代达到高峰，犹太复国主义者想以此来逼英国加快撤出巴勒斯坦的脚步，而英国也果然在一九四八年撤出了。

自那时起，以巴双方就一直互相报复，制造出大量死伤。尽管任何无辜者的性命损失都是无可弥补的，任何杀害以色列无辜百姓的口实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巴勒斯坦人的人命损失却是大得不成比例。以过去六星期的数字为例，共有一百八十个巴勒斯坦人和十四个以色列人被杀。^[1]单是这个数字就可以让你感受到个中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的死者中有八个是士兵，而巴勒斯坦人则全是平民。在这个背景下，你可以说恐怖主义是被压迫者的武器。事实上，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攻击是非常有局限性和零星的，但却被以色列的宣传放大和膨胀到古怪可笑的程度。以色列老是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但在这场冲突

[1] 有关阿克萨抵抗运动详细死伤数字，见以下网站：B'Teslem (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 the Palestinian Red Crescent Society at http://www.btselem.org/English/Statistics/Al_Aqsa_Fatalities_Tables.asp and http://www.palestinercs.org/crisistables/oct_2000_table.htm.

中，他们根本不是受害者。他们是欺压者，是欺凌巴勒斯坦人的人。

· 美国一向都被认为是公道的和事佬，你的看法怎样？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那样，接受过美国那么多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这些援助以今日的币值来计算，总数大约是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1] 美国的每一个知名人物——不管是纽约州北部一个小区的候选人还是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宣称自己是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者。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会主动表态，发表一些支持以色列政策的宣言。这除了是因为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力量使然，也是因为以色列支持者的团体非常积极和老练。美国一向的政策都是保护以色列和支持它的一切投机冒险。以色列很多行径——刑讯、以飞弹和直升机攻击平民、实行屯垦、非法兼并土地等等——明明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但美国却仍然否决了很多安理会要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案。^[2]

所以说，美国是个公道的和事佬乃是荒谬歪曲的形容。美国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过去七年来，所有有关和平进程的谈判的材料都显示，美国持的是以色列的观点，跟以色列是一国的。顺道值得一提的是，从罗斯（Dennis Ross）到因迪克（Martin Indyk）到米勒（Aron David Miller），大部分主持和平进程的美国官员都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前雇员或长时间的盟友。

· 保守的英国周刊《经济学人》这样说：“巴勒斯坦新一波的抵抗运动（Intifada）正迅速披上一种严肃的反殖民革命的形

[1] David R. Francis, "Economist Tallies Swelling Cost of Israel to 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9, 2002, p. 16. Official U. S. aid since 1973, calculated in 2001 dollars.

[2] See Stephen Zunes, "UN Resolutions Being Violated by Countries other than Iraq,"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October 3, 200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pif.org/>.

式。”^[1] 这样的措词，在主流杂志或许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认为，爆发于一九八七年的第一次抵抗运动——后来在一九九三年被阿拉法特叫停——就是一场反殖民的革命。这一次的抵抗运动显然也是如此。只有美国媒体才会那么健忘，看不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推行的政策全是古典殖民主义那一套，包括屯垦、筑路、不断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重新规划约旦河西岸的地理形势以方便以色列的控制等。为了筑路，他们不惜摧毁农作物和橄榄树。也就是说，以色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巴勒斯坦人的臣属地位不变，为了确保占领者的利益（有时是闲暇）。

所以，过去六七星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指第二次抵抗运动），就是要推翻这一切，包括推翻和平进程，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和平进程只是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重新包装，以便以色列用不了太多部队就可以统治。这是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讽刺的是，现在很多以色列安全的事宜都交给了巴勒斯坦警察负责，所以那些反殖民示威者所面对的镇压往往是来自巴勒斯坦警察。这样大的怒火，这样巨大的人命损失，乃是一种纯为了摧毁人们生活的占领政策的必然结果。巴勒斯坦人唯一可做的抵抗只是走上街头，勇敢地（有人说是愚勇地）向坦克丢掷石头。

美国媒体都太偏袒以色列了，以致一般人根本无从表达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实际上是推翻殖民式军事占领的一种勇敢尝试。

阿拉法特只是布幕背后的殖民占领者的傀儡

· 你一直认为，在这场最地理性的冲突中缺少了地图。 为什

[1] “The Spreading of Palestine’s War,” *The Economist* (U. S. Edition), October 28, 2000.

么地图如此重要？

首先，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是很小的。以巴冲突已持续了五十年。一般电视观众或报章读者能看到有关以巴冲突的报导本来就少得可怜，当然更不会意识到冲突背后涉及的历史与地理地形学。读到以巴冲突的报导，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这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又来了。”以为冲突双方是势均力敌的两造，阿拉伯人是威胁和加害的一造，而以色列是无辜和受害的一造。当然，人们会有这种印象，多少跟纳粹大屠杀和反犹太主义烈焰的记忆犹新有关。但真实的情形是，随着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建国，有78%历史上原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变成了以色列的。^[1]这个比例还一直在增加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构成了22%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国土，而当前的战斗，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巴勒斯坦人为之战斗的，不是已经失去的78%的土地，而是那还保留着的22%的土地。但在这22%之中，以色列仍然控制着60%的约旦河西岸和40%的加沙地带。因此，如果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巴勒斯坦国，它的领土将会是四分五裂的。它们会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由以色列所筑的路切割、围绕、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今天会被围困在他们小小的领土里的原因。

以色列在那片土地制造了一些既成事实，让巴勒斯坦人无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法从北往南去或从东往西去。占整个地区大约4%土地的“大耶路撒冷”（Greater Jerusalem）已为以色列所兼并，并且完全没有物归原主的打算。^[2]以色列打算要完全控制这地区，唯一留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的只有市政和卫生这些棘手的民生问题。安全事务和边界都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哪怕是今天，阿拉法特没有以色列的许可都无法进出加沙地带。他们可以随意关闭机场，甚至把它

[1] See Samih K. Farsoun and Christina E. Zacharia, *Palestine and the Palestinia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p. 123 - 125.

[2] See The 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ASSIA),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in Maps, 1878 - 2002* (Jerusalem: PASSIA, 2002), Maps 40 - 48 (pp. 110 - 127).

们摧毁（曾经这样做过），让巴勒斯坦人动弹不得。现在，巴勒斯坦人形同被扼着喉咙，慢慢窒息。这就是和平进程的结果。它不是战争的结果。这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在美国的怂恿下与以色列签订那纸协议带来的灾难的一部分，而这也是为什么这协议会泡汤的原因。

· 你的资讯来源是哪些？

一本在华盛顿出版的双月刊《占领区内以色列屯垦区报告》（*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1] 主编是阿伦森（Geoffrey Aronson）。那是中东和平基金会的一本出版物。如果只能选一本的话，它是最权威的资讯来源。其资料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国际性的通讯社，提供的资讯包括了屯垦区的建设率、屯垦区的数目、新的屯垦区的开辟、财物的破坏、屯垦者人口增加了多少等等。

·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科克布恩（Alexander Cockburn）、菲斯克（Robert Fisk）这些以色列屯垦政策的批评者都用“黑人家园”（bantustan）这个词来形容它。^[2]

两者多有相似之处。它源于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过这种政策，他们划出一些地区，让听话的土著建立村庄，由酋长管理。英国人在西非这样做过，称之为“间接统治”，他们找来一些本地人统治那些难驾驭的原住民——实权当然还是操在英国手上。同样的政策也被南非的白人政权采用，他们把黑人集中在一个个所谓的

[1] See the website of The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 (<http://www.fmep.org/reports/>).

[2] See, among other sources, Norman Finkelstein, *Image and Reality of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updated ed. (New York: Verso, 2003) and Noam Chomsky, *Middle East Illusions* (Boul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保留区” (reservation) 或“家园” (homeland)，容许他们享有某种主权——但无一实权。黑人不能控制土地。水不由他们控制。进出都要得到白人批准。巴勒斯坦的模式恰恰就是如此。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被以色列切割为一小块一小块，无异于南非黑人的“家园”。只有阿拉法特这样的人才会以为自己是领袖，他事实上只是布幕背后的殖民占领者的傀儡。

· 沙龙 (Ariel Sharon) 在十月二十八日去了一趟“尊贵的圣地” (Haram Al-Sharif)，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岩顶清真寺 (the Dome of the Rock) 和阿克萨清真寺 (Al-Aqsa mosque)。^[1] 他由大约一千名的以色列军警保护。这位前以色列将军和现任内阁部长此行被认为是新一波抵抗运动的导火线。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沙龙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巴拉克允许沙龙这样做，又是什么心态？

在以色列的大众神话里，沙龙是个英雄角色。他的暴行开始于一九五〇年代。他要为入侵吉卜亚 (Qibia) 的事件负责：只因为前一天有三个以色列巡逻士兵遇袭身亡，他把六十五个无辜者杀死在他们自己家里，作为报复。^[2] 自此，他的暴行就一件接一件。他基本上是个擅长恃强凌弱的人，专门欺负平民和装备远逊于他的敌人。在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之后，他是宣慰使。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他摧毁了很多民宅，声称是为了消灭恐怖分子的巢穴，但那些实际上是加沙地带抵抗者的窝。当然，一九八二年挥军侵略黎巴嫩的行动更是沙龙一手策划的，当时他骗以色列内阁说以军只是要进入黎巴嫩南部几英里，但事实

[1] See Robert Fisk, "Bloodbath at the Dome of the Rock," *The Independent* (London), September 30, 2000, p. 1.

[2] See Emma Brokes, "The Bulldozer: These are Busy Times for Ariel Sharon," *The Guardian* (London), November 7, 2001, p. 2.

却是直取贝鲁特——过程中杀死了一万七千人。^[1] 贝鲁特难民营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指名他要为发生在萨卜拉 (Sabra) 和沙提拉 (Shatila) 两个难民营的屠杀负间接责任，因为屠杀虽然是黎巴嫩长枪党 (Maronite) 民兵干的，但却是以色列军队所授意。^[2]

因此就什么标准来说，他都是个战犯。他毫不隐瞒他巴不得把剩下来的巴勒斯坦人全赶走，赶到约旦去。这个解决方案，他称为“约旦选项”，也就是把约旦这个主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巴勒斯坦人国家。^[3] 自一九六七年违反国际法兼并东耶路撒冷以来，阿克萨清真寺就是控制在以色列手里的，而沙龙去那里，无异是一种挑衅行为。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九日，巴勒斯坦人一等早祷过后就为昨天的事发起示威抗议。以色列警察向示威者开火，杀死了五个平民。^[4] 正如你说的，沙龙是在九月二十八日到那里去的，由巴拉克派给他的一千个警察加以保护。

很明显，沙龙去阿克萨清真寺，是巴拉克授意的，不然至少也是他首肯的。但目的也许不那么是挑衅，不是故意引起后来的流血冲突，以便引发恐怖镇压。我不认为他小小的脑袋可以预见得到这一点。我想那是为了宣示以色列对一个伊斯兰教的圣地主权。此举与其说是挑衅，不如说是羞辱，以显示哪怕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战犯，只要他是以色列人，一样有权出现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它是要宣示，任何以色列人都有权这样做。以色列人可以无视穆斯林怎么想，怎么感受，他们认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可以随意侵犯。这就是沙龙此

[1] Robert Fisk, "This is a Place of Filth and Blood Which Will Forever Be Associated with Sharon," *The Independent* (London), February 6, 2001, p. 1. See also 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The Abductions of Lebanon*, updated e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2).

[2] See Julie Flint, "The Sharon Files," *The Guardian* (London), November 28, 2001, p. 6.

[3] Nicole Gaouette, "Deep Splits Face Israel's New Lead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7, 2001, p. 1.

[4] Ross Dunn, "Muslims Shot in Clash at Jerusalem Site," *The Times* (London), September 30, 2000.

行的目的。它让一神教最丑陋的一面、喜欢倾轧的一面暴露无遗。沙龙等于是代表犹太人践踏伊斯兰教的地方，等于是说：“我们是军事占领者，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媒体从没有看出这一点，老是说沙龙的行为是为了挑衅。那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宣示以色列的力量，宣示犹太人高穆斯林一等。

我就是在西耶路撒冷出生的

· 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 (Elie Wiesel)、《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公共电视网节目主持人罗斯 (Charlie Rose) 和东方学家刘易斯 (Bernard Lewis) 在内的人都像背书一样弹这个调：戴维营谈判的失败要归咎阿拉法特不知好歹，平白错失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说巴拉克的退让是空前的，说他的建议是最慷慨的妥协。

压根儿就不是事实。去戴维营以前巴拉克就把话挑明：他无意退回到一九六七年以前的边界。^[1]但这个原则是和平进程的起点：以色列退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的边界。

· 这是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案规定的。

还有安理会第三三八号决议案。其次，巴拉克也挑明，不会同意让难民返回家园。他挑明的第三点是，他绝不会把耶路撒冷的主权归

[1] See Naseer H. Aruri, *Dishonest Broker: The U. S. Role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3), chapter 10. See also Tanya Reinhart, *Israel/Palestine: How to End the War of 1948*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还给巴勒斯坦人。第四点他挑明的是，他无意撤除屯垦区。^[1] 这些立场，是他后来整个谈判的基本。谈判从没有离它们而去，反而是在巩固它们。另外，如果你检视事实而不是听美国和以色列媒体那些江湖郎中的发言，就晓得巴拉克不准备归还东耶路撒冷。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退让。他只是说：“我们会让你们在圣地成立政权。我们会保留基督徒居住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区。你可以对其中一些穆斯林圣地拥有一点点主权，但东耶路撒冷的实质主权要保留在以色列手中。”这就是所谓的“向前看”的立场！他拒绝接纳难民，也不愿对发生在一九四八年的事情负责任。真不敢想象，这个领袖所代表的竟是一个老是要别人补偿他们在二次大战所受苦难的民族。巴拉克等于是告诉巴勒斯坦人：“你们的要求我们连考虑也不会考虑。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不相干的。”他断然拒绝放弃屯垦区。

面对这种情形，阿拉法特本来是不想参加这场为期两星期的谈判的，因为它不单纯是和平进程的一个延续，而是一个“最终地位”的谈判。阿拉法特无法同意以色列提出的条件。除了因为当前的混乱局势以外，也因为另外两个理由。一是阿拉法特被要求终止冲突，终止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权利要求，也因此是终止任何穆斯林/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权利要求。他做不到。其次，他也被要求放弃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和民族自决的要求，这也是阿拉法特不敢答应的，因为只要他一签字，就吃不完兜着走。因此，那不但不是一个阿拉法特可以从以色列的慷慨中获利的机会，反而是他可能不得不自杀的机会，因为如果他同意以色列的条件，就是把最后的奖品——等于圣代上那颗樱桃——拱手送给了以色列。但他却同意在西耶路撒冷的问题上让步，同意承认以色列对西耶路撒冷的主权^[2]。我就是在西耶路撒冷出生的，我家的房子还在那儿。那里4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但阿拉法特却把他们全

[1] Aruri, *Dishonest Broker*, chapter 20.

[2] 以色列是在一九四八年占领西耶路撒冷，在一九六七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又在一九八〇年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其首都。——译者

部让出。他的让步要比以色列慷慨太多，而且非常有欠思量。所以我认为有人说他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是相当正确的。

以色列一直是在玩一个自杀式游戏

· 巴拉克在九月三十日的国会演说中重提了埃班 (Abba Eban)^[1] 的一句话：巴勒斯坦人从来不会错过一个错过机会的机会。^[2]

以色列在资讯的提供上从一开始就是玩两面手法。它给外国人的资讯基本上是文宣。它们把以色列描绘为坦率的、民主的、大方的、慈悲的、站在受害和防卫的一方。换言之，以色列为自己塑造的是一个对西方自由派深具吸引力的形象。但以色列告诉自己和巴拉克告诉其人民的却是另一回事。不管主政的是佩雷斯 (Shimon Peres)、拉宾 (Yitzhak Rabin)、贝林 (Yossi Beilin)、巴拉克还是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说的都是一样的话。他们说，这是个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的和平进程。拉宾在签署“奥斯陆协议”几个月前才说过：“我巴不得加沙地带沉到海里面去。它是缠住我们脖子的石磨。那里人口太多了，一百万人活在最悲惨兮兮的状态里。我们干吗要扛这种责任呢？我们留住最好的土地就好，其余的就给巴勒斯坦人吧。”^[3]

这就是“奥斯陆协议”的基础。劳工党 (Labor Party) 里头的所

[1]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间以色列外交部长。——译者

[2] Barak quoted in Lee Hockstader, “Israeli Helicopters Hit Key Palestinian Office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1, 2000, p. A1.

[3] Clyde Haberman, “Yitzhak Rabin: Pragmatist Leading Israelis From Isolation to New Pea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1993, p. 1; 12; Sarah Helm, “Talks Reveal a Glimmer of Hope on Golan,” *The Independent* (London), September 4, 1992, p. 9.

谓和平派用来吸引选民的方式，就是老是说和平进程可以让以色列捞到多少好处。他们说：“我们准备要放弃那些没有用的土地。我们打算放弃统治巴勒斯坦人的苦差。我们不打算这样做。让他们自己来做。我们不打算放弃任何屯垦区。”贝林无时不说这一类的话。哪怕如此，他在美国和以色列仍然被归类为大鸽派。他总是说：“我们不打算放弃任何主要屯垦区。我们准备要兼并最好的土地。我们准备要保留耶路撒冷。告诉利库党 (Likud)，他们没有理由反对这样的安排。”^[1]

如果你仔细研究这段历史，就事实来研究它而不只是听表面的宣传，就会明白以色列一直是在玩一个自杀式游戏。以色列认为，阿拉伯人唯一听得懂的论证是暴力。占领就是一种暴力形式。巴勒斯坦人能够有的反抗方式只是对坦克丢石头，或是偶尔进行自杀炸弹攻击——这种攻击尽管恐怖，但跟以色列对三百万巴勒斯坦人持续了三十三年的集体惩罚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以色列是世界唯一一个法律容许刑讯的国家。以色列境内有20%的公民所受到的对待基本上与南非的黑人无异，而理由只不过是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被剥夺各种权利，不被容许购买、租用和拥有土地。他们的土地反复被没收。这是最不像话的一种暴力与歧视政策。显然，以色列希望被阿拉伯国家接受和承认，但它却不肯放弃武力和占领政策，也硬着心肠不肯聆听受了五十年苦的巴勒斯坦人的哭诉。这一切，只会让巴勒斯坦人的怨恨与日俱增。

还有必要一说的是，以色列虽然跟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但历经二十年的和平之后，以色列与埃及的关系基本仍然冷淡。以色列人说，我们努力过了，我们派出过使者。但以色列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自己干了什么事：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复于平民、不断建设屯垦区、践踏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使得以色列被为数三亿的阿拉伯人和

[1] David Zev Harris and Margot Dudkevitch, "Settler Leaders Upbeat after 'Positive' Meeting with Beilin,"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11, 2000, p. A4.

十二亿的穆斯林视为一个流氓国家，只要它的政策一天不改变，它所堆积出来的层层怨气、怒气和敌意就不可能会消散。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它的政策是自杀式的原因。以色列归根究底是一个中东国家。它不是跟德州毗邻的。它不是纽约的一部分。它离开美国六千英里远。黎巴嫩位于它的北疆。它的东面是叙利亚和约旦。埃及在其南面。以色列境内到处都是巴勒斯坦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就更不用说了。你是可以揍他们，而以色列也无疑拥有最强大的军力。它拥有携带两百个弹头的原子弹。^[1] 空军也是地区内最强的一支，甚至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支。它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都遥遥领先。更重要的是它有美国的支持。但它的优势能维持多久呢？总有一天，它会在人口数上落入下风。我估计，到了二〇一〇年，居住在传统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就会跟以色列人一样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人口数将会势均力敌。届时，以色列还控制得了多少局面呢？到了二〇三〇年，那里的阿拉伯人就会是犹太人的两倍。^[2] 换言之，犹太人在以色列会变成少数。

以色列当然应该拥有政治自决权。但这种权利不应该以军事手段为后盾。那不是长远之道。唯一的选项是和平——平起平坐的和平而不是强者强加给弱者的和平。

巴勒斯坦人要求的是权利的实质改善，是建立国家

· 你说居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占以色列人口的 20%

[1] See Seymour M.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Avner Cohen, *Israel and the Bomb*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BBC World News, "Israel 'May Have 200 Nuclear Weapons,'" August, 23, 2000. Repor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892941.stm.

[2] Harvey Morris, "Demography Drives Debate in Israel Over Settlement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une 14, 2002, p. 11.

上下？

没错。一百万人。

· 他们在一九八七年的起义期间相当沉默，但在二〇〇〇年的抵抗运动中却截然不同^[1]。为什么会这样？

理由之一是以色列政府对待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很不像话。直到一九六六年为止，他们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换言之，从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建国开始，他们有十八年时间都是自己国家里的逐客。他们受到你能想象的每一方面的歧视。他们不被容许迁移，没有得到像样的教育，某些工作不准从事。一九六六年，军事管制撤销了，他们的处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他们在国会里有代表，有投票权，但他们却不被允许拥有额外的土地。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土地持续流失。很多村庄的土地都被以色列政府征用，像是乌姆法姆（Umm el-Fahm）这个大概是以色列境内最大的阿拉伯村庄就失去了一万德南（dunam，约相当于二千五百英亩）的土地。^[2]以色列征用这些土地只是为了军事用途。它们被拿来当练靶场。我说过，政府用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预算微乎其微。学校的师资设备都比犹太人的学校差很多。电力和自来水这些基本建设在阿拉伯城镇和村庄都很贫乏。

所以说，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受到严重的歧视待遇，而理由只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这种种族主义影响到整个社群，所以他们最后起而反对它。他们看到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干了些什

[1] 巴勒斯坦人迄今有过两次大起义（抵抗运动），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另一次是在二〇〇〇年沙龙访问阿克萨清真寺之后。但这些所谓的起义基本上都是以石头对抗以色列人的枪炮。——译者

[2] See “MKs Almost Come to Blows over Umm el-Fahm,”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1, 1998, p. 4.

么，而他们认同于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这是第二点最重要的事。以色列一直都致力于摧毁巴勒斯坦人的一体感。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都是以色列公民。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过去是约旦人，现在则处于无归属状态。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是无国之人，过去受埃及管治，现在则处于未定状态。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也是无国之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巴解组织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就是让分处各地的巴勒斯坦人觉得他们归属于同一个民族。我想以色列和美国过去二十年来的政策都是要动摇巴勒斯坦认同感的，让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同一个实体的一部分，不觉得他们集体受到以色列的压迫，而背后的黑手则是美国。

但这些算计到头来都枉费心机。抵抗运动一发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马上就意识到，他们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是一体的，因为两者受到的是一样的待遇、一样的严重压迫和弱化。他们发起一次次示威抗议。但政府给他们的不是政治回应，而是军事回应：共有十三个身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在示威中被以色列警察所杀。^[1]

所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是有连贯性的，那就是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一个民族对待。在这种政策背后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恐惧过去会被揭发出来，让以色列的原罪无所遁形。以色列的原罪就是在一九四八年摧毁巴勒斯坦。这种原罪后来不只没有洗去，反而一再以各种方式重演，让敌视他的巴勒斯坦人愈来愈多：先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继而是散居各国的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的创立者不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居民，而是住在科威特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然后是作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最后一起行动。他们重新肯定巴勒斯坦人寻求民族自决的愿景（这个愿景一直是

[1] Sharon Waxman, "Israeli Jews and Arabs Find Common Ground at 'Peace Tent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8, 2000, p. A23.

以色列否定的)，强烈要求以色列作出补偿。

这个大问题的不是以色列或美国政府一贯以来的思维方式可以解决的。他们想用一些小恩小惠来打发巴勒斯坦人，例如容许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同乘一辆轿车或巴士之类的。这是行不通的。巴勒斯坦人要求的是权利的实质改善，是建立国家。这种要求愈来愈强烈，这种需要也愈来愈强烈。而以色列的拒绝则愈来愈高分贝和刺耳，愈来愈不切实际。对任何以色列人来说，首要之务都是要正视这个他们边界之内的问题，正视那些只因为宗教理由就被以二等公民方式对待的人。

以色列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个没有宪法的国家，只以一组基本法进行管治。它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有很严格的区分。任何事情都由一个人是或不是犹太人所决定。这是行不通的。那实际上是一个由宗教权威运作的国家。很多以色列公民现在都开始担心，要是有一天世俗犹太人不愿意接受正统派和保守派的教士统治，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以色列政府却不思正面回应这些需求，反而退回到传统的回应态度：要么否认问题的存在，要么再次肯定一些与事实脱节的事情。在这方面，巴勒斯坦人的责任重大——不只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一般巴勒斯坦人以至其他阿拉伯人也有这个责任。我们必须用和平的方式把一个讯息带给以色列人：“我们住在这里，你们也住在这里。这是无法否认的。你们必须找出你们过去的真相，找出我们过去的真相。办法也许是透过建立一个像南非那样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1]。”

这场冲突让人吃惊之处，是过去五十年来，冲突两方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行事原则。以色列人说：“我们对这片土地拥有权利。这本是片无人土地。别管一九四八年发生过什么事了。我们来处理一九六七年的事就好。”表达方式容有不同，以色列的说法却从未改变。但在

[1] 南非白人政权下台后，圣公会大主教图图所建立的一个委员会，意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化解黑人与白人的宿怨。——译者

二十一世纪，这是一种不能被接受的态度。你不能只为己谋就把过去一笔勾销。你必须正视另一方的存在，负起该负的责任。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日本人为他们对韩国人做的事负责任，德国人为犹太人，波兰人为犹太人。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不应该有别于其他国家。他们干过的事是把一场灾难加诸另一个民族，这场灾难延续到今天，而他们却一再否认其事。“不，他们并不存在。那是一片空荡荡的土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们只是些阿拉伯人，不算什么。”这样的论点沿用到今天。不然就是说：“他们都只是次等人，是野蛮人。我们要文明开化得多。”我认为这正是今天问题的症结。那不是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突发奇想搞出来的荒谬和平进程所可以解决的。

“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1] 发表后，当魏兹曼被问到巴勒斯坦的原住民要怎样处理时，他说：“只有几十万的黑人，不碍事。”^[2]

我没听说过这个，但那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态度。巴勒斯坦人真的不碍以色列人的事，因为正如赫茨尔 (Theodor Herzl, 1860—1904)^[3] 说过的，如果有需要，大可以把他们“偷偷架走”^[4]。这一点，看看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就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这些一九四〇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文件档案都是可以翻阅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学者都研究过。很清楚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一直都是以色列的一个大问题，而以色列也用尽各种办法

[1] 一九一七年英国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宣言，因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写给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思柴尔德的一封信中提出，故名。——译者

[2] See quotations in 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updated e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pp. 434–435.

[3] 维也纳记者，于一八九七年发起现代犹太复国运动。——译者

[4] See Nur Masalha, *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 The Concept of “Transfer” in Zionist Political Thought, 1882–1948*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92), p. 9.

去处理它：或是试图把巴勒斯坦人赶走，或是假装他们并不存在，或是声称他们不是原住民。这种假装巴勒斯坦人是微不足道少数的态度，我称之为没由来的认识论上的固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从未减低，反而愈来愈升高。

· 屯垦者与正统派犹太人也发起过示威抗议，向汽车和巴士投掷石块。以色列维安部队有过向他们开火的例子吗？

半次都没有。让我告诉你一个相当夸张的例子。希伯伦是个阿拉伯城市，一九六七年以前没住一个犹太人。一九六七年以后，以色列把三四百个犹太人安置到这个住了十二万到十三万阿拉伯人的城市。如今这些屯垦者约占全市人口的0.3%，却控制了20%的土地，这全是拜和平进程之赐。^[1]他们占领的土地可是城市正中央，而不是它的边缘。他们出入都有士兵保护，而军方也提供他们武器。他们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会招摇过市，以展示犹太人对阿拉伯城镇的主权。戈尔德施泰因（Baruch Goldstein）就是这群人中间的一个：他在希伯伦的清真寺杀死了二十九个礼拜者。^[2]这清真寺也是控制在以色列手上。一九九二年到那里访问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想要进寺，你必须先通过以色列士兵把守的拒马和金属侦测器。有一群士兵坐在门边一张桌子上头。对伊斯兰教来说，这是很挑衅的，更夸张的是，他们会用靴踩那些入寺做礼拜的人的脸。尽管如此，戈尔德施泰因在一九九四年二月却通过拒马，向礼拜者开火。

现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情势比那时候还要复杂几百倍，因为屯垦者都爱惹是生非。屯垦区就盖在阿拉伯城镇旁边。屯垦者有武器，也有士兵保护。戈尔德施泰因就是以色列军事后备队的一员。他

[1] See Ian Fisher, "In Grief, Israeli Family Questions Army Aid to Settl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02, p. A10. See also PASSIA, *Palestine Question in Maps*, Map 29 (pp. 78-79).

[2] Chris Hedges, "Soldier Fired at Crowd, Survivors of Massacre Say,"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94, p. A1.

们会走到阿拉伯的村庄去祷告、闹事。他们敲破阿拉伯人的窗户，烧他们的汽车，恐吓他们。自巴拉克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上台后，屯垦区快速增加。在他任内，屯垦区增加的数目要比内塔尼亚胡任内多，而当然更比佩雷斯和拉宾的时候多。所以屯垦区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会让巴勒斯坦人的领土流失，并带来一些好生事的以色列国民。这是和平进程的基本瑕疵之一。巴勒斯坦人为和平进程欢欣歌唱之际，以色列却让一个巴勒斯坦国更为不可能存活。到处都有以色列人。他们控制了约旦河谷。这样，即使巴勒斯坦人可以建国，他们的国家也将不可能跟任何阿拉伯国家有接壤线。透过屯垦区和军事据点，以色列控制了所有的边界。

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 你为埃及的《金字塔周刊》 (*Al-Ahram Weekly*) 写了三篇系列性的文章，题目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 (*American Zionism*)。^[1] 在第一篇文章里，你讨论了以色列大报《国土报》 (*Ha'aretz*) 记者沙维特 (*Avi Shavit*) 对你的一次访谈。你从这种互动中得到了某些看法。

我写那篇文章，是想在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做一个区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是，巴勒斯坦人是存在的，是次一等的人。当然，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是有若干差异。右翼说：“他们被我们征服了，所以就得当我们的仆人。”左翼则说：“我们可以用某种较不引起反感的方式重新安顿

[1] Edward W. Said, "American Zionism-The Real Problem," three parts, *Al-Ahram Weekly* 500 (September 21 - 27, 2000), 502 (October 5 - 11, 2000), 506 (November 2 - 8, 2000). Online at <http://www.ahram.org.eg/weekly/>.

他们。”但他们承认巴勒斯坦人存在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而这是因为今天以色列人几乎每一分钟都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有在特拉维夫这些地方当仆人的、当餐厅侍者的、当司机的、开计程车的。占领区和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就更多了，所以，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意识到巴勒斯坦人的存在的。但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相反，他们根本不把巴勒斯坦人当成真实的存在。他们有一种狂想，认为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意识形态虚构，是为困扰以色列而被创造出来的，也因此是反犹太主义的化身。刘易斯就反复这样说，说那是一种阿拉伯人的反犹太主义。因为把巴勒斯坦人抽离于历史，因为罔顾巴勒斯坦人自一九六七年起就受到军事占领的事实，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比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危险许多。他们认为可以把巴勒斯坦人当成微生物一样来对待。

· 那篇访谈被放在显著的版面。

它被放在《国土报》星期五增刊的首页。^[1]沙维特的观点跟我的显然相当不同，但至少他愿意听听我说些什么。这篇访谈永远不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他们永远不敢登这样的东西。整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在美国形同禁忌，只能被放在边缘又边缘又边缘的位置。很多美国的犹太人组织都致力把这种打压维持下去。

美国的民意是走在官方政策前面的，我们应该紧密恒常 监视媒体

· 几年前你为 BBC 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寻找巴勒斯

[1] Ari Shavit, "My Right of Return," *Ha'aretz*, August 18, 2000.

坦》(*In Search of Palestine*)。^[1]在“BBC二台”和“BBC世界”播出过后，它就形同消失了。英国广播公司几乎完全找不到愿意播它的美国电视台。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巴勒斯坦人观点的电影在美国的一贯下场。犹太人组织系统性地打压它们、封锁它们。如果是在电视播出的话，他们会让节目的广告业主知道，不撤回支持的话将会付出高昂代价。你想播一部巴勒斯坦人观点的影片，就得播五部以色列人观点的影片。我拍那部纪录片碰到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事。没有人要播它。BBC在美国找不到愿播它的电视台。最后，我透过私人关系让它在纽约的第十三频道播出了一次，而据我所知，它也在旧金山的公共电视播出过，但也只是一次。基本上，那影片已经消失了。把巴勒斯坦人描写为有历史和有政治诉求的一群人，在美国是个禁忌。

还有一个例子。自阿克萨抵抗运动在十月底爆发以来，《纽约时报》只登过三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的文章，作者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约旦人，第三篇的措词非常强烈，作者帕切科(Allegra Pacheco)是一个以色列律师，他当时人在美国^[2]。其他文章都是偏向以色列的。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所有大报莫不如此。所有的报导都看不到地图，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什么或他们的生存空间有多么狭小——只剩下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小片一小片活像“黑人家园”的土地。

其结果就是，流传在美国民众意识的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人图像是相当狭隘的。幸而，一些另类的资讯来源已陆续出现。你主持的“替

[1] *In Search of Palestine; A Documentary Film Narrated by Edward Said* (London: BBC, 1998).

[2] Rami G. Khouri, "Israel's Deadly Erro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00, p. A27; Allegra Pacheco, "Palestinians in a State of Sieg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2001, p. A19; Amira Hass, "Separate and Unequal on the West Bank,"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1, p. 4: 9.

代电台”（Alternative Radio）显然就是其中之一。网络也让人可以读到以色列报纸、英国报纸和阿拉伯报纸的文摘，读到世界各地独立记者所写的报导。但官方的观点仍然铺天盖地，根据这种观点，以色列是一个被围困的国家，是一个受害者，而阿拉伯人之所以不接受以色列，是因为反犹太主义心态作祟。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世界本身也是处于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它们的统治者无一不是独裁者和反民主主义者。没有民主制度可言。阿拉伯人为此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那代价不是美国付的，而是阿拉伯人付的，他们的普遍处境——不管是健康、教育、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或环境——过去几十年来都稳步恶化，而且自和平进程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展开以来，更是急速下滑。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意都是站在巴勒斯坦人的一边。那反映的是人们对统治者的不公义的愤慨，不管那统治者是军事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还是作为以色列傀儡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还是摩洛哥或埃及政府这些镇压人民的政权。这一切全是有美国支持的。所以不值得惊讶的是，现代中东历史正迈向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 要怎样才能逆转有关阿拉伯世界的大众论述的不健康素质？

首先要做的是动员美国这里的团体（这样的团体很多），去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挺身而出，为巴勒斯坦人、其他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解而努力。换言之，我们需要动员美国这里的民意。我们必须施更多的压力。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开始我就注意到，美国的民意是走在官方政策前面的。美国的在位者、以色列游说团体和媒体都是化约主义者，立场远远落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后面。只要给美国民众一点点机会，他们就会知道谁站在正义的一边，谁站在不正义的一边。我们应该紧密恒常监视媒体，指出它们报导的不平衡之处——这是很重

要的，而且在全国都有人开始这样做。我们还应该用抗议信去轰炸电视台和《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发起有组织的运动，逼他们改弦易辙。

其次最要紧的是掀掉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正当性。我说过，这种占领已持续了三十二年。这是可能的，就像当年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最终让种族隔离政策无法维持下去。以色列是美国历史上接受过最多美援的国家。美国的学术机构和以色列的大学经常有交流活动。我就曾呼吁过，应邀到以色列大学访问的同仁也应该到巴勒斯坦的大学走走。我们必须主动去做这样的事，必须争取学术团体、作家团体、艺术家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反帝国主义团体和反歧视团体的支持——这样的团体在美国所在多有。我们应该跟民权运动、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合流，让解放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成为一个更大的斗争的一部分。

美国把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卖到中东，有卖给波斯湾国家的，有卖给以色列的。^[1]它们是世界最大的军火购买国之一。我们得做的是把帷幕掀开，让有关中东的辩论不再因为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压力而蹒跚。就像《时事评论》（*Commentary*）或《新共和》（*New Republic*）追着某个人打并不代表他应该噤声，我们不应该怕纸老虎。它们得到的支持事实相当稀薄。它们的吵闹声比它们有权发出的要大。

只要能把年轻人动员起来，只要能唤起人们的批判意识，那逆转潮流就是可能的。我们没有不这样做的口实。

真正的政治愿景只能以和平共存和互相合作为思考前提

· 媒体一直相当注意“哈马斯”（*Hamas*）和“伊斯兰圣战”

[1] Richard F. Grimmett,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1994 to 2001*, August 6, 2002 (RL31529)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2). See also Gideon Burrows,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the Arms Trade* (London: Verso, 2002).

(Islamic Jihad) 这些巴勒斯坦派系组织。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情况如何？

在中东，有钱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宽。全球化因为把各国的经济体转化为让冒险资本可以逐鹿的巨大消费市场，使情况雪上加霜。一些与政权有关系的孤立部门不断发利市，但广大群众则生活在贫穷中，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能力供子女温饱和上学念书。依我看，把伊斯兰教团体视为只是恐怖组织是错误的。它们显然做了一些政府所没有做的事。中东阿拉伯人的政府无一例外都是腐化的，预算都是用在一些大而无当的计划上。以巴勒斯坦人的预算为例，几乎没有预算是用在基础建设，但官僚组织却可以获得大笔大笔拨款。人们会去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就是因为可以从那里获得别处得不到的维生物资。就军事上来说，“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的好战主义者一直都是不成功的。除我刚才说的维生物资以外，他们也没有能带给老百姓什么远景。

换言之，“哈马斯”成立这二十年来，从未能许老百姓以一个未来，而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它根本提不出一个未来的愿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或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解放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也有同样问题。你不能把伊斯兰教当成解决一切的万灵丹。你必须处理电力、自来水、环境卫生和交通运输等等问题。这些都不是单单抬出伊斯兰教就解决得了的。所以在这个层次上，他们是失败的。至于有些人所建议的，让世俗主义成为主导的力量，我认为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在面对以色列、美国和当权者的侵袭时，伊斯兰教仍然是阿拉伯穆斯林的最后文化碉堡。因此，我会说它是一个抵抗的象征，而不是可以马上转化为政治愿景的东西。它不是这样的东西。真正的政治愿景只能以和平共存和互相合作为思考前提，比方说把目标放在建立一个阿拉伯的共同市场，想办法做到资源共享，致力于制定共同的移民政策和建立某种程度的整合等。这样的努力没有

见诸过去两代人。

双民族国家

· 你去年曾经倡议一个双民族国家的方案^[1]，也就是说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组一个国家。你的用意何在？二〇〇〇年的抵抗运动有没有改变你的看法？

当今的首要之务是结束军事占领。而我的建议是从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催生出来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太密不可分，而那片土地也太小了，根本不可能让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军事统治长久维持下去。我是很反对把人从他们的定居地驱逐走的，因为我们自己就遭遇过这种事。然而，我还是认为屯垦区应该拆除。但这不是要把屯垦者赶走，而是让他们与巴勒斯坦人像邻居一样共同生活，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同质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历史上称为巴勒斯坦，至于建立单一国家以后该称为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国，我都没有异议。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经济与历史都太紧密交织在一起了，所以我认为，到最后，双民族国家是唯一可行的长远解决方案。

但是，在过渡阶段，也许应该先让巴勒斯坦人建国，让他们不再受到军事占领。然后，巴勒斯坦国可以出于自由意志，决定跟以色列统一，而且不只可以跟以色列统一，甚至可以跟约旦、黎巴嫩和其他国家统一。中东是世界上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也深具整合的潜力。隔离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只会让一方变成弱势，而让另一方变得更强势和显得是个外来政权。这只会制造更多问题。自一九四〇年代起，随着

[1] Edward W. Said, "The One-State Solu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0, 1999, p. 6: 36-39.

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得到独立和以色列的建国，问题增加了好几倍。它们没有减少。人们是共存在一起，但却是共存于铁丝网之后，共存于猜疑与暴力之后。以色列或叙利亚或伊拉克所行使的国家暴力，是不可能产生人人都渴望的那种稳定与和平共存的。

我仍然认为建立双民族国家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一定会实现。不过，那当然是需要相当时间的，而一些巨大的历史伤痛也必须想办法去抚平。

· 你的身体现在如何？

还可以。我得了一种无法治愈但可以阻缓的慢性病。我必须周期性接受治疗。一个人上了年纪难免会失去一些什么，但重要的是保持头脑运转。

· 你的医护状况很有意思：你在长岛一家犹太医院接受治疗，而照顾你的则是一个知名的印度裔大夫和一群爱尔兰护士。

还有一个印度裔的助理医师，而我则是个巴勒斯坦病人。那是个好地方。我感觉自己是个得天独厚的人。我大概是那里受过最长期密切治疗的病人，迄今已历时七八年。他们对我非常好。我乐于由他们照顾。我不喜欢上医院，也但愿不用上。但如果一个人非上医院不可，那是一个好所在。

· 这听起来跟你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书名大异其趣。

不，我仍然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但格格不入是可以有程度高低的。相对于纽约的错乱生活，医院的生活变得非常可以让人忍受。

· 你接下来有什么出书计划？

我有一本大型论文集《流亡的反思》(*Reflections on Exile*)即将由哈佛出版。接下来还有一本名为《文化、政治与权力》(*Culture, Politics, and Power*)的访谈录,明年秋天会由万神殿出版社出版。再下来是两本小书,一本论歌剧,一本论人文主义。两本都是来自我的讲演。论歌剧那一本以我在剑桥大学的讲座为底稿。论人文主义那本则是来自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

· 你还有时间从事你的副业——玩音乐吗？

我正在整理一本我和一位朋友的谈话录。他是钢琴家暨指挥家巴伦波伊姆。^[1]今年底就会完成。只要一抽得出时间,我就会弹钢琴,跟几个朋友玩玩室内乐。

[1] Daniel Barenboim and Edward W. Said,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2002).

第三章

他们希望的是我闭嘴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日，新墨西哥州，圣达菲

· 自从阿克萨抵抗运动^[1]去年十月爆发以来，发生了好些事件，其中包括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你对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现在是个僵局。除了想回到一个更原先、几乎是原始的立场以外，我不认为双方有什么明确的方向：巴勒斯坦人想要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尽其所能继续抵抗；以色列则想把他们赶走。这就是沙龙的政策。以色列人称这样的政策为“抑制”，但事实上却是用强弱悬殊的武力——包括武装直升机、飞弹和坦克——来对付基本上手无寸铁、毫无自卫能力的平民百姓。这是一种完全不平衡的状态，但美国的媒体却蓄意忽略。这不是一场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战。那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由一支殖民军队使用各种集体惩罚的方式来攻击一群被殖民、没有国家的人民。从政治上来说，抵抗运动没有任何进展。以色列只想保有它的既得利益，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想的是恢复克林顿主政最后那

[1] 指沙龙登临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所引发的巴勒斯坦人起义。——译者

段日子所到达的谈判阶段。至于巴勒斯坦人民，想要的是以色列占领结束。

· 巴勒斯坦人现在比从前更善于说出自己的困境，提出自己的论述吗？

我不认为如此。以色列的力量太强大了，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一丝机会。他们没有组织。现在是有一些网站可以让人取得有关巴勒斯坦的最新资讯。但地图这一类能够真正显示问题症结的东西却不容易得到，也没有真正意义下的论述。美国各大报都总是不断强调“巴勒斯坦人的暴行”，把它们说成是无理的和冲着犹太人而发的。以色列方面宣传攻势相当庞大，它雇用了一些公关公司进行游说，让整个美国国会都任其使唤，而因为它得到美国提供的庞大资金、政治与其他资源，也使得联合国束手无策，难以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免遭以色列部队的杀戮。^[1] 最终结果就是一个偏颇的处境，巴勒斯坦人正在慢慢死去。迄今已死了超过四百人，超过一万四千人重伤，但换到的政治利益却寥寥无几。^[2] 这是一个悲惨和让人完全不能接受的局面。

我们必须向以色列人民散发信息，但却从未这样做过

· 有关阿克萨抵抗运动的消息，如今已退到报纸不起眼的角落。例如，今天的《阿尔伯克基日报》(*Albuquerque Journal*) 只在第四版有短短一则消息。《纽约时报》在第十一版有一则。^[3] 至于

[1] Melissa Radler, "US Backs Israel at UN, Opposes International Monitors," *Jerusalem Post*, August 21, 2001, p. 1.

[2] See chapter 2, note 5 above.

[3] Deborah Sontag, "Death and Daily Life Link Arab and Israeli," *New York Time*, May 2, 2001, p. A11.

圣达菲这里的地方报《新墨西哥人》(*The New Mexican*)更是只字全无。看来,除非有什么重大变化,抵抗运动的不被闻问已成定局。

我的印象是,这相当类似一般以色列人的感觉:阿拉伯人是无足道哉的讨厌鬼。在特拉维夫、海法和海尔兹利亚(Hertzlia)这些地方,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照常过的。他们跟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绝缘。就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屯垦者都不是一定会看到巴勒斯坦人或需要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是被保护的、自成一国的,就像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一样——在南非,这是因为“黑人家园”系统使然,也因为道路是筑在看不到黑人的路线。不断地侵占,不断地围困。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就是这样被扼住喉咙的。没有人报导这事。然后以色列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围攻的受害者。这一套完全是延续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方法:用最寡廉鲜耻的宣传手法把罪过归咎于受害者。

·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在今天的《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整版的文宣,把以色列人对这场冲突的陈腔滥调又重复了一遍。^[1]面对这种宣传攻势,巴勒斯坦人要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这些文宣让人发指,因为它们基本上是谎言,不只是谎言,而且还断章取义。它们引用埃及和叙利亚的一些报纸段落(例如说某个伊斯兰教宗教领袖说了犹太人什么坏话),但又不提供脉络。事实是,一个犹太人国家正在以犹太民族之名攻击巴勒斯坦人,所

[1] The text of the ad (“The Big Lie Is Still Alive”)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jc.org/InTheMedia/AdvertisementsDetail.asp?did-201&pid=699>.

以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犹太人的恨意是跟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有因果关系的。阿拉伯人恨犹太人，不是反犹太主义心态作祟，而是因为以色列的野蛮行径。除了野蛮，没有别的字眼足以形容以色列的行径。

其次，那篇文宣并没有显示出犹太人方面有多么强烈的种族主义。几天前，沙斯党（Shas Party）^[1]的约瑟夫（Ovadia Yosef）才说过，应该把巴勒斯坦人灭绝；他说他们是蛇，所以理应杀死。^[2]如果你浏览以色列的报纸，会发现它们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的仇视心态，要比这篇文宣的引述言论更煽惑强烈得多。它们大部分说不定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捏造来迷惑不知情的美国人的。美国民众不知道他们的钱被用来资助什么事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是以五十亿美金为后盾的，那是美国纳税人的钱，是美国政府无条件交给以色列人的；除此以外，我们还支援以色列武器，以色列说他们拿这些武器来自卫，但实际上却是用来侵略。

遗憾的是，巴勒斯坦人迄今还不明白，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组织性的运动——我认为这样的运动是搞得起来的。大群大群分处各地的巴勒斯坦人一直没有被动员起来。不管是在巴勒斯坦还是阿拉伯世界，都有很多资源一直未被动员。我们的斗争还处于很初始的阶段，依然在为应由谁领导和往哪个方向走争吵不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自治政府，但我们实际上仍处于专制统治下，因为这个自治政府只知道千方百计控制资讯的流通，以便它可以继续保有权力和回到一个没有人想要的谈判去。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当然不想恢复谈判，因为这只会让以色列有权把屯垦行动继续下去。以色列的屯垦区在巴拉克总理任内急速增加。大部分人都以为巴拉克是个慷慨的好人，而他之所以会败选（指在总理选举中败于沙龙），是因为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太软弱。

[1] 以色列国会第三大党。——译者

[2] Sam Kiley "Israeli Rabbi Calls on God to Annihilate Arabs," *The Times* (London), April 10, 2001.

事实上，他的残暴不亚于沙龙。在他任内，屯垦区的成长率比他前四五任以色列总理都要高。

所以，以色列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也就是不停地、积极地压迫巴勒斯坦人和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其使用的方法连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都要瞠乎其后。这一点需要被指出来，因为一直以来，巴勒斯坦的领导阶层和很多菁英分子都相信，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但你看看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要求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时说了些什么——他基本上认为是认为，以色列会在四月中入侵加沙地带，应该归咎于巴勒斯坦人的挑衅。布什政府跟历来的美国政府一样，对巴勒斯坦人的憧憬都是具有敌意的。因此，我们应该把着力点放在美国境内对我们友善的团体，如大学、教会、美国黑人社群、拉丁美洲裔社群、妇女团体等。我们一直都太忽略它们了。

· 巴勒斯坦人处境受到忽略的根本原因何在？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没有更多的超越？

大概是因为巨大的绝望感和被圈禁感。所有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情绪压力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我们被一个无情的敌人杀戮，而唯一能有的抵抗方式只是靠年轻人向坦克、飞弹和武装直升机投掷石块。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我们有一个无法领导的领袖，而理由不只一端。其中之一是这个领袖被关了起来。阿拉法特被困在拉姆安拉（Ramallah）已经有几个月。以色列人把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再把钥匙扔掉。^[1]他去不了加沙地带。另外，以色列正在实行一个不讲审判程序的暗杀政策，只要谁当上巴勒斯坦人的领袖就会把谁干掉。大部分巴勒斯坦人都拮据得要命，没有钱可以买食物喂饱儿女。大部分

[1] See, among other reports, Serge Schmemmann, "Arafat Remains Defiant Amid Rubble of His Compoun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02, p. 1: 8.

人没有工作，超过50%的人失业。^[1] 在某个意义下，我们是孤单的。我们被包围起来。我们在一个敌人手中已经挣扎了一百年，但这个世界对我们仍然不闻不问。这就是主要的理由。

另一个理由是无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巴勒斯坦菁英，仍然以为有捷径可以影响美国。他们不知道，美国乃是以色列背后的黑手，没有美国，以色列根本不敢像现在这样蛮干。巴勒斯坦的政治菁英不懂得美国是怎样运作的，哪些才是可能的施力点。每当这些施力点被触动，都能够起作用。例如，在二〇〇〇年的一项努力，成功地阻止了班杰公司（Ben & Jerry）使用取自戈兰高地以色列屯垦区的水来制造冰淇淋。^[2] 班杰公司成了被杯葛的对象，最后终于屈服。这些策略证明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它由知识分子组成，知道应该把重点放在哪些行动上，而不是整天担心阿拉伯联盟会怎么想，或把指望寄托在英国人和德国人身上。我们应该把焦点固定在那些大角色上。其中一个大角色是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我们必须向以色列人民散发信息，但却从未这样做过。另一个大角色是美国和美国人民——至少是大城市里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终止这场无休止战争的群体。

· 你认为，阿拉伯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地域主义的呢——特别是在美国这里？

美国的阿拉伯人是一个相对新的群体。他们大部分都是刚来不久，缺乏整合，政治上不成熟，习惯以母国的政治观点为依归。叙利

[1] Tracy Wilkinson, "Palestinian Towns Wobbling on Last Legs,"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30, 2002. See also Sara Roy, "Decline and Disfigurement: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After Oslo," in *The New Intifada: Resisting Israel's Apartheid*, ed. Roane Carey (New York: Verso, 2001), and Stephen Farrell, "Dying for Work: Five Pay Price at Gaza," *The Times* (London), December 14, 2002.

[2] Associated Press, "Vermont Ice Cream Maker in Middle East Controversy," September 24, 1998.

亚裔以叙利亚政府的态度为依归，埃及裔以埃及政府的态度为依归，黎巴嫩裔以黎巴嫩政府的态度为依归。很多在中东看到的问题在这里都看得到。有些黎巴嫩人不信任另一些黎巴嫩人，这是黎巴嫩国内派系敌对的小翻版。黎巴嫩人与叙利亚人并不亲近。黎巴嫩人与巴勒斯坦人也不亲近。所以确实存在问题。但那不完全是地域主义的结果。他们身处一个不熟悉和不确定的处境中，忙着整合到美国的社会，所以目前还无法以有自信、有能力的美公民身份发挥力量。希望只能寄托在下一代，也就是我孩子的一代——我认为他们都是高度政治意识的。他们正在慢慢组织起来。这需要时间。

犹太人也是到了大约一九六七年之后才整合起来的，那是因为以色列打了胜仗，让整合者有筹码可用。反观我们来到美国的巴勒斯坦人却是活在军事、政治失败和失去领土的阴影中。这是很难逆转的。我们有失败感，而这是必须加以克服的心理创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向美国的解放团体和全世界的解放运动学习的缘故。但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利用这方面的资源。美国和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是心怀善意和愿意帮助我们的。

一场文化与资讯的战争

· 你认不认为年轻一代比你这一代要少一些恐惧？

毫无疑问是这样。他们也对我们这一代所做的事相当轻蔑，而这是可理解的——看看整个阿拉伯世界有多么乌烟瘴气就可以理解。但这种轻蔑却让他们无法从我这一代吸取经验，利用我们累积起来的知识成就。这一点，是我在一些新成立的阿拉伯人组织跟年轻人共事时所发现的。这些新的组织都是从零做起，回头去做一些我们已经做过而没有需要再做的事。他们应该把我们做过的事当成基础，而不是忽

略罔顾和轻蔑地推到一旁。世代的连续性是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我认为它正在被处理。

不管在人数或资源上，我们都远远不及犹太人或很多其他的美国族群，然而，每次我到美国的各大学演讲，都会看到很多很有能力的阿拉伯年轻人，而他们都懂得跟美国黑人团体、女性主义团体和印第安人团体携手共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机制，以及重新省思怎样才能把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

· 你刚在贝灵汉（Bellingham）的西华盛顿大学演讲了一场。反应如何？我问这个，是因为那儿的气氛与伯克利、麦迪逊和博尔德（Boulder）都大异其趣。

我的讲题是人文主义，没有涉及巴勒斯坦。但那天稍早，我跟五六十个念人类学、文学和政治学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座谈。他们让我惊讶。他们都相当开放，不只开放，而且还对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表示同情。听众当中没有阿拉伯学生。他们大部分是来自美国西北部。他们相当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中东政治情势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进行的游说活动。更讽刺的是，他们其中一个教授（大学里最有名的教授之一）就是美籍犹太人，但却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上课时指定学生读我和乔姆斯基等人的书，这些孩子才会想来听我演讲。这是个好例子。

几星期以前我在普林斯顿作了好几场演讲。听众中有少数看来是右翼的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余的心胸都很开阔，有同情心。上星期我在伦敦演讲。听众想必超过两千人，其中很多是阿拉伯人，但也有不少是英国人。我也在亚非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演讲，数以百计的听众分别是来自第三世界各个国家。他们同样让我惊讶，因为他们也是同样的心胸开阔和愿意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我们从未有系统性地利用过这种方法。因循的阿拉法特政权可

谓愚蠢到家。

所以我努力争取一些目光，让他们会想到要帮助巴勒斯坦人。无疑我们目前面对的是求生存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总得要超越求生的问题，去打一场文化与资讯的战争。在以色列国内，一样有以色列人亟想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未做过任何对他们有益的事。已经有更多的以色列人明白到，尽管以色列挟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但它却要比从前更不安全。因为以色列的领导阶层未能让人民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很多，而它们都是切实可行的，我们犯不着去搞自杀炸弹攻击或徒劳地向坦克投掷石块，把自己暴露在以色列军队的面前。

· 你认为联合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联合国的架构是绝对少不了的。不幸的是，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跑去马德里跟以色列谈判之举，等于是丢掉了联合国这把保护伞。他们对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和第三三八号决议案只有口头上的尊重。这些决议案禁止以色列兼并巴勒斯坦土地和征用更多的土地，而这些都在奥斯陆和平进程展开期间被违反了。现在我们作为巴勒斯坦人必须做的是向领导阶层施压，要求他们停止跟以色列进行进一步的谈判，除非以色列接受第二四二号和第三三八号决议案的原则。我们应该透过联合国大会而非安理会——这是因为美国在安理会握有否决权——向以色列施压，抑制以色列对平民百姓开火的暴行。

攻击我反而让我受宠若惊，因为那让我显得重要

· 从加拿大的《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到《华尔街日

报》到《时事评论》到《新共和》，你都是挨批的靶子。^[1]你怎样回应？

我没有回应。回应只是浪费时间。批我的都是些恨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恨得要命的种族主义者，看来是无可救药的。另外，批我的也不是《新共和》或《国家邮报》的读者，而是它们的老板，像是佩雷兹（Martin Peretz）、布莱克（Conrad Black）和祖克曼（Mort Zuckerman）等。他们都是满脑子歪理的有钱人，请得起人来读我的东西和攻击我。不过，他们老是攻击我反而让我受宠若惊，因为那让我显得重要。而且，他们那样做也只会引起更多人注意到我的工作和作品。写更多的作品——这就是我的回应方式。他们希望的是我闭嘴。除非我死掉，否则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 你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说：

“对一个住在西方——特别是住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生活是让人灰心沮丧的。”^[2]你至今还是这样看吗？

现在让我灰心沮丧的事情是，很多我批评过的偏见、歪曲和对阿拉伯人与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假设，至今继续存在。显然，我认为我的书可以逆转潮流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刻板印象却每天都受到媒体的加强（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因为出于无知或懒惰），同样的意象反复出现，哪怕是想改变现状的人也无力改变些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伯恩斯（John Burns）是《纽约时报》驻印度次大陆的特派员。他大约五年前来找我，说他计划向总编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申请一年的年休假进修，增加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了

[1] See, for example, the scurrilous article by Justus Reid Weiner, “The False Prophet of Palestin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6, 1999, p. A18.

[2]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27.

解。那一年他先后待在哈佛和剑桥。我到哈佛演讲时见过他一次。他说他正在有系统地钻研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东西，以便将来可以从一种不同的观点去报导这方面的事情——不再只是报导暴力和恐怖主义，而是报导阿拉伯文化的多样性和这些社会各种有别于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潮流。一年后他回来了，结果怎样呢？《纽约时报》仍然是在报导阿拉伯人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所以，什么东西容许报导，什么东西不容许，媒体是有内建的规则的。在很多方面，现在的情形只比从前更糟。

但事情也有乐观的方面，因为这种偏颇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开始受到挑战。出现了一些替代性的媒体（你主持的这个电台就是典型例子），而且蔓延得很快。有相当大量的资讯可以通过网络取得，而不同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替代性的报纸。至少在这方面来说，情况相当鼓舞人心。

一直有一股坚决的力量要压制我讲话和压制别人听我讲话的机会。他们用的是惩罚性手段。他们会恐吓你。他们会要求邀我的人取消演讲。他们不是常常得逞，但这是他们企图去做的。他们不会直接与你交锋。这是非常懦弱的。例如布莱克就规定他在英国的记者绝不可说巴勒斯坦人一句好话，也限制他们对以色列批评太过火。但他失败了。包括吉尔摩（Ian Gilmour）在内的很多作者都作出反弹，而布莱克无法让他们俯首。^[1] 美国这里的情况没有那么好，因为佩雷兹绝不允许《新共和》上面有一个字批评以色列。《纽约时报》一直不允许特稿的版面有不同的意见，直到爆发了抵抗运动，情况才有一丁点儿改变。其余的人全都是萨菲尔（William Safire）和弗德曼之流。所以我们只能指望别的地方，它们比较没有那么让人灰心沮丧。

[1] See Charles Glass, "The First Casualty: A Newspaper Proprietor Should Champion, Not Censor, His Writers," *The Observer*, March 18, 2001, p. 27.

· 乔姆斯基说你“跟媒体和主流文化处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因为一方面，你在文学批评上的成就受到肯定和表扬，但另一方面，你又是“〔媒体〕不断中伤的目标”^[1]。

他的处境也非常相似。他是个知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学上的成就一直受到表彰与颂扬。但他也同样受到中伤，被指为反犹太主义者和希特勒的崇拜者。不管指控我还是指控他的罪名都愈来愈荒诞不经，以至于带点滑稽的味道。但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看看我在黎巴嫩南部掷那块石头引起了什么事情？^[2]（二〇〇〇年七月，萨义德被记者拍到在黎巴嫩边界向以色列岗哨投掷一块石头，照片登出，引起轩然大波。批评者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处理此事，但哥大最后以萨义德行为受学术自由保护，拒绝加以惩处。）我掷它，是为了对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二十二年的行为表示不齿，是为了以色列在一九八二年入侵黎巴嫩时所杀死的一万七千人，是为了在希姆（Khiam）监狱受到折磨的八千人——这监狱离我扔石头的地点只有一英里远。攻击我的人张牙舞爪，但过了没多久以后，人们就开始问：“这些人疯了不成？”他们就像是莫里哀的戏剧中走出来的角色：暴躁易怒、不可理喻，一生气就会跺小脚。那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股逆火。它阻止不了乔姆斯基，也阻止不了我。

· 掷石块事件持续发酵。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学会原邀你五月六日发表演讲的，却因为这事而取消邀请。^[3]

这是以色列施压的一个明显例子。我在二〇〇〇年夏天受到弗洛

[1] Maya Jaggi, "Edward Said: Out of the Shadows," *The Guardian* (London), September 11, 1999, p. 6.

[2] See Karen W. Arenson, "Columbia Debates a Professor's 'Gestur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00, p. B3.

[3] See Dinitia Smith, "Freud Museum Speaking Ban Sparks Said Fury," *The Observer* (London), March 11, 2001, p. 21.

伊德学会的邀请，而那是在掷石块事件发生好一阵子之后。那照片最先是登在《国土报》上，两三天后再出现在美国的媒体。那是七月上旬的事情，而我受到邀请则是在八月中旬。我在十月一日回函表示接受邀请。我给了他们演讲的题目。直到第二年二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他们的信，告诉我演讲取消了。为什么？那位绅士说是因为“中东的政治情势和它的后续结果”。我马上回一信，说我想知道一个有关弗洛伊德的演讲跟“中东的政治情势和它的后续结果”有什么关系。直到今天我还没收到回信。但演讲还是取消了。

我后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得到一笔赠款，让弗洛伊德的手稿可以在特拉维夫展出，但捐钱的人是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希望取消我的演讲。弗洛伊德学会乖乖照做了。这事情引起了相当大的抗议反弹。有十几名世界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写了一封联名信，发表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1]，抗议弗洛伊德学会的做法。维也纳的报纸无一不对弗洛伊德学会口诛笔伐。因为批评声浪太大，那个可怜兮兮的会长——他是一名社会学家——不得不出面解释，但他说的尽是蠢话，说什么学会必须考虑到维也纳犹太人团体的感情。但他又说不出这一切跟我的演讲有什么关系。我对他说，弗洛伊德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晚期被纳粹逐出维也纳的，而不过一两代人以后，同样的心态又让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无法在维也纳演讲。^[2]

不过，得知此事以后，伦敦的弗洛伊德博物馆马上邀我去发表原定要是在维也纳发表的演讲，时间任我选择。因为有其他外务，我无法在五月六日弗洛伊德诞辰当天前去演讲，要到了十二月才能成行。后来维也纳的四个学术机构也邀我演讲，包括了维也纳大学、人文科学院、中东学院，我十一月去了。弗洛伊德学会屈服于外界的压力是不成熟

[1] Jessica Benjamin et al., Letter to the Freud Society of Vienn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3: 6 (March 22, 200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lrb.co.uk/v23/no6/letters.html>.

[2] Smith, "Freud Museum Speaking Ban Sparks Said Fury," p. 21.

和相当愚蠢的表现。

《独立报》驻中东的特派员费斯克指出：“辱骂和公然恐吓已经到了指向任何胆敢批评以色列人的程度，不管你是学者、分析家还是记者。其张狂程度直追麦卡锡（McCarthyite）^[1]的时代。对中东的无知在今日美国是那么根深柢固，以致除一些小报以外，媒体都是以以色列的观点看事情。”^[2]

我对包括洛杉矶、纽约、芝加哥、亚特兰大、波士顿在内的大都会大报做过一项粗略调查。它们的报导一律都是来自以色列，也就是说，是它们驻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的记者发回来的（耶路撒冷现已被兼并，所以要算作以色列的国土）。驻在阿拉伯世界而又以巴勒斯坦人观点报导事情的记者少之又少。其次，即使记者以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看事情，他们的报导还是要先经过美国这里的编辑台，修改成符合报社的一贯偏见、一贯的说词。它们一贯强调的是巴勒斯坦人有多暴力和以色列人有多不安全，完全无视于有数以百计巴勒斯坦人被杀、数以千计巴勒斯坦人残废和受伤的事实——这些事实，都是明明白白写在“国际特赦组织”、“人权瞭望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总署”的报告里的。

想要证明巴勒斯坦人遭遇到什么，我可以轻易拿出一打权威的引述给你看。但它们无一上得了各大报的版面，电视画面就更不用说了。就连公共电视网或全国公共电台这些所谓的形象良好的媒体也是一个样。我打电话去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是因为有多如雪片的抗议信和电子邮件寄到它们的总部。这些抗议信显然是犹太复国主义团

[1] 麦卡锡为20世纪五〇年代美国参议员，曾一手主导一场揪共党分子的白色恐怖，很多人被诬陷。——译者

[2] Robert Fisk, "I Am Being Vilified for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Palestinians," *The Independent* (London), December 13, 2000, p. 5.

体或公关公司主导的，好让新闻只能聚焦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困境上。是有少数率直的人在《奥兰多守望报》（*Orlando Sentinel*）、《西雅图邮讯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Z 杂志》（*Z Magazine*）、《第蒙记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哈德福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上为文揭发真相，但为数毕竟不多，而且也不是大部分读者会读到的。

恐怖主义是一个用来让人民感到恐惧兮兮和不安全的虚构

恐怖主义一向以来都是美国媒体的焦点。国务院刚发表了一份年度报告。被点名的恐怖主义国家包括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而它们全都是以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鲍威尔在发表这份报告的时候说：“恐怖主义是一种顽疾。”^[1]老是强调恐怖主义有什么地理政治上的功能？

依我看，这种开口闭口恐怖主义的做法形同一种罪行。它让美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为所欲为。一九九八年轰炸苏丹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政府干这件事，是因为克林顿当时正为莫妮卡·莱温斯基的绯闻所困。轰炸的口实是为了摧毁一家恐怖分子的兵工厂，但后来才发现，被炸的是一家药厂，而苏丹有半数药物都靠它供应。几星期后，苏丹爆发了一场瘟疫。^[2]几百人因为得不到药物治疗而死亡，而他们之所以

[1] Marc Lacey, "Attacks Were Up Last Year, U. S. Terrorism Report Says," *New York Times*, May 1, 2001, p. A14.

[2] See James Risen, "To Bomb Sudan Plant, or Not: A Year Later, Debates Rankl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1999, p. A1, and Tim Weiner and Steven Lee Myers, "U. S. Notes Gaps in Data About Drug Plant but Defends Attack,"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98, p. A6.

得不到药物，则是因为美国的任性轰炸。

恐怖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华府的政策制定者所创造的烟幕，为之摇旗呐喊的则有亨廷顿和埃默森（Steven Emerson）这批靠此为生的人。那是一个用来让人民感到恐惧兮兮和不安全的虚构。有了它，美国就有理由可以在全世界为所欲为。任何对其利益的威胁（不管是涉及中东的、石油的，还是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地缘战略利益的），全都会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以色列自从一九七〇年代中叶开始做一样的事：把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说成是恐怖主义。非常有趣的是，“恐怖主义”一词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法国用这个词来指任何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法国占领的行为（这占领始自一八三〇年，终于一九六二年）。英国则把它用在缅甸、马来西亚。总之，在帝国主义者眼中，恐怖主义代表的是一切对“我们”想要做的事的妨碍。

自美国成为全球性的强权以后，就声称包括从中国到欧洲到南非洲到拉丁美洲到整个北美洲在内的所有地方都涉及它的利益，恐怖主义成为维持其霸权方便顺手的工具。恐怖主义现在被认为是对全球化的抵抗。这个等号已经被画上。顺道一说，我注意到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1]也是这样看的。但凡是人们反对剥夺、高失业率和吞噬自然资源的运动，一律被称为恐怖主义。^[2]

这种恶性循环助长了一些恐怖组织的壮大，比方说本·拉登（bin Ladan）和他手下的人——不管是在沙特阿拉伯还是也门还是哪里的。他们被放大和膨胀得跟他们的实际力量和实际威胁完全不成比例。这种聚焦模糊了美国在全球范围所做的巨大破坏，包括军事上的、生态上的和经济上的。与之相比，恐怖主义所做的破坏只是九牛一毛。

最后，很少人谈到本土性的恐怖主义，很少谈就在美国本土成长起

[1] 印裔女作家，以小说《微物之神》获一九九七年英国“布克奖”。——译者

[2] Arundhati Roy, Interview with David Barsamian, *The Progressive* 65: 4 (April 2001). See also Arundhati Roy, *Power Politics*, 2nd ed.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1).

来的武装团体，也就是麦克维（Timothy McVeigh）^[1] 一类的人。我清楚记得，在俄克拉荷马市的联邦大楼被炸毁以后，有三十家媒体打电话给我，因为这事件有许多中东恐怖主义的特征——第一个这样说的人是埃默森，他在事件一发生就即时被媒体封为恐怖主义专家。^[2] 所以他们马上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但那时我凑巧人在加拿大。有三十家媒体打电话来。他们以为，既然我是中东人，就应该对恐怖主义有所了解，能够对俄克拉荷马的大爆炸案提供些精辟意见。这一类把恐怖主义和阿拉伯人/穆斯林联想在一起的习惯，让美国的阿拉伯人/穆斯林深受其害，以至于在二〇〇〇年参议院选举时，只要候选人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有什么牵连，都会被对手拿来做人文章。候选人之一的希拉里退还了美国穆斯林联合会（Muslim Alliance）——一个非常政治中性的团体——所捐的五万美元政治献金，说是这钱带有微微恐怖主义的味道。^[3] 所以说，在这个国家，会被贴标签的不只有非洲裔和拉美裔的人，还有信伊斯兰教的人。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不会在历史中学到教训

· 美国和英国所主导的对伊拉克禁运显然是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

它们是失败了。首先，禁运的原意是整垮萨达姆。但现在萨达姆却变得更强。其次，拜英美禁运政策之赐，伊拉克的平民受到了巨大伤

[1] 一九九五年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爆炸案主谋，事件造成一百六十八人死亡。——译者

[2] See Felicity Barringer, "Terror Experts Use Lenses of Their Specialti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00, p. A1.

[3] Dean E. Murphy, "Mrs. Clinton Says She Will Return Money Raised by a Muslim Group,"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00, p. A1.

害，近乎集体屠杀般的伤害。自禁运实施以来，伊拉克每年有六万小孩死亡。^[1]有数不清的其他人得了癌症和其他基因转移的疾病。两个联合国“以油换粮”计划的专员因为目睹禁运措施的不人道而辞职。^[2]

第三，伊拉克不是像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所幻想的那样是孤立的。它与埃及接壤，而埃及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伊拉克的经济传统上都是与邻国（特别是约旦）有紧密联系。如今，伊拉克以国际油价的一半价格供应约旦石油，所以约旦愿意与伊拉克贸易。伊拉克跟它的邻国（包括一些波斯湾国家）还有其他的有机性联系。所以，制裁无法以现在的形式继续下去，乃是意料中事。

结果，鲍威尔在今年（二〇〇一）二月穿梭中东，鼓吹所谓的“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这种做法让我错愕，因为它的名称完全是不伦不类的。它反映出，美国再一次幻想人们会愿意违背自己的利益，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走。^[3]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整个禁运政策是徒劳和灾难性的。美国因为强大、富裕和距离中东遥远，以致大部分美国人都知觉不到美国政府以美国之名所做的事，已经造成多么大的破坏，已经引起了——这是更糟的——多么大的仇恨情绪。美国的中东政策除了是为了保证一个少数可以继续遂行宰制外，看得出来有任何其他目的。

· 其中一个打破禁运的国家是土耳其，它甚至派飞机飞到巴格达。这是蛮奇怪的，因为土耳其一直是美国轰炸伊拉克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且还好几次入侵伊拉克北部，攻击库尔德族（Kurds）的反抗军战士。

[1] See Anthony Arnove, ed. *Iraq Under Siege: The Deadly Impact of Sanctions and War*, 2nd ed.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2), p. 79.

[2] Arnove, *Iraq Under Siege*, p. 47.

[3] John F. Burns, "Iraq Defiant as U. S. Lobbies Arabs on Shift in Sanctio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2001, p. 1; 4.

土耳其对库尔德族的攻击是得到美国支援的，其血腥程度让发生在科索沃（Kosovo）阿尔巴尼亚人身上的事俨如星期日的学校郊游。我们不能忘了，土耳其和以色列是非常亲近的盟友。它们会举行共同的军事演习。土耳其跟美国和跟以色列都有军事同盟关系。但目前，因为商业利益考量凌驾于战略利益考量，才会让土耳其决定与伊拉克贸易，换取石油——伊拉克毕竟是区域内第二大的石油供应者。伊拉克将会与巴基斯坦贸易看来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 你认不认为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军事与经济同盟是包围阿拉伯人大战略的一部分？

不是，因为埃及也参与其中。它不是用来包围阿拉伯人的，而是用来包围那些被认为是不妥协的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与其说它是针对阿拉伯人的，不如说它是针对那些看来太过反以色列或太过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但那是一个没大脑和非理性的策略，因为分析到最后，尽管军方是埃及国内最大的雇主而军队又是听命于统治者的，但因为这种政策极为不受人民欢迎，所以不可能持之以恒。如果硬干到底，那埃及当权者的下场就只会像南韩的李承晚或越南的阮高其和阮文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不会在历史中学到教训。他们重复同样的错误，付出的是同样大的人命、经济及政治代价。他们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和视野都是一样差，一代不比一代好。

大屠杀工业与其说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权力

·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现任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最近接受土耳其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否认土耳其人曾经集体屠杀亚美尼亚

人是史实。^[1]

在这方面，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政策同样非常相似。它们同样乐于否认土耳其政府在二十世纪初对亚美尼亚人做过的事。我给你一个例子。在一九八三年，有一个以色列国营电台的节目打算要探讨亚美尼亚人遭遇过什么事^[2]，结果却被禁止播出，理由只因为“大屠杀”（holocaust）和“集体屠杀”（genocide）这些字眼被认为只合该用在犹太人的经历。这种政策被佩雷斯愚蠢地持续下去。卢旺达人、亚美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其他有过相同遭遇的人群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以便可以防范同样的事再度发生，这才符合全人类的福祉。但以色列政府不此之思，反而企图操控记忆，让人们的眼光只专注在某一群受过这种历史灾难的人，以便从中得利。

· 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最近出了一本名为《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的书。^[3]你认不认为有大屠杀工业^[4]这回事？

我想很多方面他都是对的。在这个国家，有些人坚定地要把大屠杀转化为一种世俗宗教，一种犹太人的专利品。事实上，它应该被视为一个更普遍的现象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发生在美国原住民身上的大屠杀。它也应该涵盖数以百万计被卖到美国为奴的黑人的恐怖经验。芬克尔斯坦正确地指出，大屠杀工业与其说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不如说

[1] Robert Fisk, "Peres Stands Accused Over Denial of 'Meaningless' Armenian Holocaust," *The Independent* (London), April 18, 2001, p. 13.

[2] Edward W.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p. 253.

[3] Norman Finkelstein, *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New York: Verso, 2000).

[4] 指许多人把大屠杀的题材商品化、大捞名利的现象。一些大屠杀生还者或冒牌受难者写的回忆录即属此类。——译者

是为了维护权力。它们很少关涉大屠杀受害者的真实苦难。德国和波兰犹太人的遭遇当然都是值得研究的，但不是在今日美国大学所设定的狭窄格局下进行研究。它们应该被视为一个更大的研究——人类不人道史的一部分。

任何人都有返回家园的权利

· 你在很多场合都主张巴勒斯坦难民有返回家园的权利。在这方面，巴勒斯坦人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体认到人有返回家园的权利。我不单是指返回巴勒斯坦。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它体现的是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的精神），把任何人驱离他们的出生地都是不合法的，而即使是他们主动选择离开，也不能剥夺他们日后返回的权利。这是更大的原则。至于巴勒斯坦人方面，这是个应该主张的政治诉求，也慢慢在进行中。但那是“奥斯陆协议”没有提到的。现在巴勒斯坦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群难民营居民。

强调回家的权利也有助于放大今天住在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像是流寓于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是没有居留权、工作权和旅游权的。所以巴勒斯坦人不只在以色列受到不公平待遇，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是一个更普遍现象的一部分：不只巴勒斯坦人有返回家园的权利，任何人都有返回家园的权利。如果他们因为政治或身体上的理由无法返回故土，就应该让他们在流寓地拥有各种正常权利。

这是一个遍及全球的现象，我深感兴趣。我们生活在一个移民的时代，强迫迁移和强行居留的情形比比皆是。这导致了不只在以色列，而且在美国和英国都因为种族纯净神话的驱使，制定了一系列非常

反动的立法。意大利、瑞典、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都声称它们有权把次一等的人——主要是非洲人和亚洲人——拒诸门外。不管是不允许人们返回他们位于巴勒斯坦的家園，还是不允许他们在黎巴嫩、美国或瑞典这些国家建立新家，理由都是同一个：他们被认为是陌生人和异类。但谁是陌生人和谁是原住民的问题必须重新反省，因为像以色列和美国这些国家的居民，当初其实是用武力强行居留的殖民者。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亟待重新省思，只有这样，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的权利才可望落实。

个体意识的价值是人类成就的根部

· 你教书已经超过三十年。你努力灌输些什么给学生？你怎样培养他们的批判意识？

那是难事。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包装化和商品化的时代，其楷模是媒体——包括网络在内。在我看来，任何带有权威口吻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印刷品，批判性的心灵都有责任去质疑。我认为，老师的首要之务是提供资讯与知识，让学生可以接触到一些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教的主要是文学与哲学。有大量的书本和作者是值得认识的，而我敦促学生去读他们。我也试图训练学生读的方法。

其次，我教导学生怎样批判性地阅读，也就是不只把一本书当成一本书来读，而是把它放入脉络，以理解它是怎样产生的。没有任何书是凭空迸出来的。写作是一种选择行为，其中牵涉一系列的选择，由作者与社会互动而形成。第三，我尝试向学生显示，这些书是一个由理解、资讯与知识构成的网络的一部分。比方说，某一部英国小说说不定跟某一部法国小说有关系，或跟某个非洲、加勒比海作家用英语写的小说有关系。我想让学生明白的是，知识与阅读都永无止境。他们

需要无休止地探问、发现与挑战。就算我没做成过任何事，我至少已经把不满意和无尽探问的种子植在学生心中，与此同时又没有减损他们学习的乐趣。这是我的教学所致力的核心。

· 是不是知识分子都只能是站在对立面？

在这个国家恐怕只能是如此。我对个体意识的价值相当看重。它是人类成就的根部。理解如果无法先发生在个体的层次，就不可能发生在集体的层次。在我们的时代，个体意识被大量组织和包装过的资讯轰炸——甚至于窒息。这种轰炸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形成一种不加质疑的接受态度、一种集体的被动性。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受到影像的轰炸，它们要求我们顺服，最后掏钱去购买它们宣传的东西——不管那是新闻还是商品还是旅游。

一切都被包装过，用来销售。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全球化则把这种经济体系硬塞给全世界，留给个人的挑战和质疑空间少之又少。在很多情况下，大型组织——不管是政府或企业——的政策都是近乎盲目，只求利润而不顾责任，导致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的基因破坏。在这样的脉络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只能是反对，我认为那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角色。我不是说他们应该为反对而反对，那不是我赞成的。我所谓的站在对立面是指通过筛选、判断、批判、鉴别，让选择权可以回到个人手中。一个共同体是不能以商品利益和商业利润挂帅的。这是非常难达成的目标，但我认为不是不可达成的。

第四章

恐怖主义的根源

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KGNU 电台

· 发生于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事件让很多美国人困扰迷惑。应该从哪里讨论起呢？是先谈促使恐怖分子这样做的脉络与背景吗？

身为一个纽约人，我必须说那是一件非常震撼和惊魂的事件——尤其是其规模如此之大。那是设计来恐吓和瘫痪美国人的，它造成了很大的死伤，在我看来是无可宽赦的行为。

不过那显然是经过周详计划的，执行得也非常果敢——也许有人甚至会说杰出。我不认为它是乱攻击一通，因为它选择的目标都深具象征性：一是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心脏的世贸中心，一是美国军事系统的总部五角大楼。但这攻击不是为了要求什么，其中显然不包含任何的诉求。它是为攻击而攻击，这是它的不寻常处。

我想，这攻击是对美国过去一整个世纪的海外介入的一次反弹。美国插手的事很多：介入伊斯兰世界，介入产油世界，介入阿拉伯世界，介入中东。所有这些地区都被认为攸关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包括

驻兵和控制波斯湾，保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这些盟友在内，美国无休止的介入让它在这些地区居民眼中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这一点，大部分美国人不是被蒙在鼓里就是不知不觉。

首先必须明白的是，住在那个环境里的人和住在美国这里的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少有共通之处。美国跟伊斯兰世界的直接接触要比从前的强权（比方说英国）少很多，对阿富汗是如此，对印度是如此，对波斯湾国家（如伊拉克）更是如此。这部分与距离极为遥远有关——大西洋和地中海的阻隔都让这些地方显得遥不可及。当然，语言和宗教又是另一道障碍。

伊斯兰世界是一片广大的地域，它始自波斯尼亚，穿过中亚，然后下行到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再兵分两路，东的一路从巴基斯坦、孟加拉延伸到印尼，西的一路延伸到非洲，覆盖整个西非洲。这片地域住的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一共有十二亿的穆斯林人口，而在他们眼中，美国同时有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官方的美国，喜欢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美国——曾经在一九五三年推翻伊朗的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gh）民族主义政府，迎回国王；发动过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来又透过制裁对伊拉克造成巨大伤害（受害者主要是平民）。美国也一直支持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人：先是在一九四八年，然后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军事占领，继而是一九八二年以色列的人侵黎巴嫩南部，最近是在一九八七年和二〇〇〇年的两次抵抗运动。美国提供以色列极大量的武器。所以，如果你是住在这地区，把这些事看在眼里，很自然会认为它们是美国持续追求保有霸权的表现，而这种一心一意的追求也让它对地区内人们的渴望和憧憬置若罔闻。

妖魔化本·拉登的效果适得其反

我想大部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会觉得美国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需

要，认为美国只是在贯彻一些合乎自己利益的政策，与此同时又不多加解释或试图说明这些政策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美国所执行的政策，很多都不符美国自己所揭示的原则：民主、自决、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守国际法。例如，美国纵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三十四年就很难自圆其说：在美国的支持和资助下，以色列的屯垦区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个，屯垦者增加到四十万。美国还说这是它支持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案的一部分表现。

所有这些行为都给伊斯兰世界的人民留下不良印象。尤有进者，这些地区很多统治者的施政都是跟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但美国却不惜违背自己的原则，支持他们。这种支持对被这些政权统治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好处的。

其结果就是让人们对美国产生一种分裂性的观感。我所认识的每一个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对美国都深感兴趣。他们很多都送子女来这里受教育。他们很多都会来美国度假。有些人来这里做生意或受训。他们一方面完全明白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觉得美国政府是不同的一回事，是一个对良知、道德和国际法都不屑一顾的政府。现在，加上美国政府顽固地要实施一种暴力性的政策，一些煽动家——特别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想要煽动起一场对美国发动的圣战并不难。这些人高举大旗，号召说我们必须抵抗美国的政策，再想办法把美国整垮：先是抵抗，然后反击。

讽刺的是，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八〇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得到过美国支持和扶植的，其中包括本·拉登、“塔利班”和“圣战士”。当时美国政府认为，集结穆斯林去对付无神论的共产党，将使苏联陷入泥淖。我记得，在一九八六年，有一群“圣战士”的人来到华盛顿，受到里根总统的欢迎，还被他誉为“自由斗士”^[1]。

[1] Eqbal Ahmad, *Confronting Empire*, p. 134. See also Eqbal Ahmad, *Terrorism: Theirs and Our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2001), p. 4.

这样的加持已经行之有年。然后，很多一般穆斯林开始感到被美国背弃，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贫穷与绝望中，又是特别绝望——绝望和无知。要以伊斯兰教之名把人们结集起来并不难。顺道一说，这些呼吁者都是自封的伊斯兰教发言人。他们并不在任何正式的意义下代表伊斯兰教。他们不是什么伊玛目（imam）^[1]，不是什么教长（sheik）。他们都是自封的伊斯兰教战士。本·拉登的情形特别是如此。他是沙特阿拉伯人，自感是爱国者，认为美国驻军沙特阿拉伯是一种冒渎（沙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生地），认为攻击美国人是自己的责任。另外，这些人也是受到一种必胜主义心态的指使。他们想：既然我们打败过苏联，我们一样打败得了美国。出于这个原因，出于绝望感和病态的宗教感情，让他们产生出一种去伤害和破坏的巨大冲动，一种连无辜者都不放过的冲动——发生在纽约的事就是这样。

我要强调，理解并不等于宽恕。现在有一种让我感到惶恐的趋势，那就是历史地去理解事情在美国渐渐成为一种禁忌，被认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这是非常危险的态度。美国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认知一个事实：我们并不仅仅是世界和历史的一份子，更是形塑世界与历史的一个超级强权。

· 在给伦敦《观察者》（*Observer*）杂志写的文章《伊斯兰教与西方是不足够的标语》（*Islam and the West Are Inadquate Banners*）里，你说美国的求战心态“跟埃哈伯船长死命追逐白鲸的行为出奇相似”。^[2]说说看你的意思。

埃哈伯船长（Captain Ahab）是梅尔维尔（Melville）的名著《白鲸

[1] 清真寺里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译者

[2] Edward W. Said, “Islam and the West Are Inadequate Banners,” *The Observer* (London), September 16, 2001, p. 27.

记》(*Moby Dick*)里的主角。他因为曾经被一条白鲸咬去一条腿，所以铁了心不惜走遍天涯海角、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白鲸抓到。^[1]在全书的最后，埃哈伯船长固然是用鱼叉叉住了白鲸，但自己却被鱼叉的绳子给缠住，白鲸一使力，他就被拉到了水中，最后显然是葬身海底。埃哈伯船长的执念几乎是自杀式的。我想，美国政府现在也是被同样的报复执念所攫住，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起恐怖攻击毕竟是对美国的狠狠一击。“九一一”事件对我们社会所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它会引起高度愤怒自不待言。只不过，目前事情的演变显示，美国政府采取的并不是按部就班和深思熟虑的步骤，不是打算依国际规范把本·拉登绳之以法（从乔治·布什公开说只要把本·拉登抓到而不管死活就可见一斑），而是打算采取某种毁灭性手段、某种跟“九一一”攻击本身同级的暴力罪行。

我认为诉诸战争只会让事情变糟，糟更多，因为那总是会有后遗症的。在我看来，妖魔化本·拉登的效果适得其反。现在政府和媒体把他膨胀成有如莫比敌^[2]，把他膨胀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象征，只会让他变成像神话般的人物，更有本钱可以去玩他的游戏。其实，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把他凡人化，视之为一个对无辜平民犯了滔天暴力罪行的罪犯，并以相应的方式惩罚之。不要把他周遭的世界和我们周遭的世界一起扯下水。但现在，美国人已无可避免地觉得他们是与伊斯兰教开战。不管总统或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市长怎样呼吁，说我们并不是跟伊斯兰教开战，但从这个国家到处都有排挤、攻击穆斯林或状似穆斯林的事件发生，就可看出人民心里是怎样想的。^[3]这样的事数以十计——如果不是数以百计的话。例如，亚利桑那州就有一个锡克教

[1] 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or the Whal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2] 《白鲸记》中那白鲸的名字。——译者

[3] Darryl Fears, "Hate Crimes Against Arabs Surge, FBI Find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6, 2002, p. A2.

徒被杀害，很多人财物受到破坏。^[1]

· 还有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德州遇害。^[2]

对，很多住在纽约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股反穆斯林浪潮的冲击。有些人只因为有个中东名字，就受到警察或 FBI 登门造访。现在这个国家得了多疑症，而且以为自己正要跟一个没有形体的超级敌人——其名字叫本·拉登和伊斯兰教——开战。我认为媒体在这件事情上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它们把同样的画面重播又重播，把本·拉登妖魔化，不容许任何的反省。在把事情报导出来的时候，媒体感染了时下的普遍情绪而不自知，所以才会匆匆作出结论，认为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在我看来，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问题。

· 正如你所说的，妖魔化敌人看来是美国的一贯策略。七〇年代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是首先被妖魔化的，继而是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卡扎菲 (Muammar Qaddafi)、萨达姆，现在则是本·拉登。

显然是那样。而至少在萨达姆和本·拉登的例子中，媒体都避谈这两个人的得势是美国拉拔的。本·拉登的情况我已谈过，但萨达姆也是这样，为了压制伊朗，美国刻意培养他的实力。在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以前，萨达姆曾经从美国这里获得过大量的军火与支援。

现在媒体那种不事分析反省而只一味分化和归类的现象，相当令人忧心。我指的是“恐怖主义”这个词。如今，“恐怖主义”已成了

[1] See Phuong Ly and Petula Dvora, "Japanese Americans Recall '40s Bias, Understand Arab Counterparts' Fea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0, 2001, p. B1.

[2] Somini Sengupta, "Torn Between Silence and Open Discuss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01, p. B10.

“反美主义”的同义语，而后者又成了批评美国的同义语，成了不爱国的同义语。这是个不能接受的等式。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回到一九七〇年代联合国关于何谓“恐怖主义”的辩论。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在八〇年代把抵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圣战士”称为“自由斗士”，而现在却把他们企图抵抗另一些国家入侵的行为看作恐怖主义。我认为“恐怖主义”的定义得要规定得更加精确，以便可以区分——比方说——反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巴勒斯坦人和攻击世贸中心那群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白有一种恐怖主义叫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ism）。

“九一一”恐怖攻击是一个面目模糊、毫无宣示性的集体攻击

· 巴基斯坦的著名学者和政治活跃者伊克巴·阿马德（Eqbal Ahmad）曾对我说过，恐怖主义是穷人的 B-52 轰炸机。^[1]

从某个层次看，这显然是对的，也就是说，穷人的武器只可能是恐怖主义。但这用在“九一一”事件的层次却不对。“九一一”恐怖分子和（比方说）一个执行炸弹自杀攻击任务的巴勒斯坦年轻人是不同的。后者过的是最不堪的生活——极度拥挤、贫穷、无知、饥饿。这种状况 90% 是以色列造成的，是它占领和围困巴勒斯坦人政策的后果。我从不原谅或同意炸弹自杀攻击，但至少它是可理解的。那是一个绝望的人所作出的反击，他一方面感到生活受挤压，一方面看着自己的同胞、父母、兄弟、姊妹受到伤害，所以他想要做些什么，想要反击。他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一个

[1] Eqbal Ahmad,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绝望的人企图摆脱强加的不公义状态。这不是我赞成的行为，但至少是可理解的。

但“九一一”却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它的策划者显然不是绝望和贫穷的难民营居民。攻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人显然都是中产阶级，教育程度高得有资格在佛罗里达的飞行学校教授，而且懂英语。这攻击超越了政治的层次而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层次。这个跳跃，是我认为我们必须给予十二万分注意的，因为它反映出其策划者的心灵极度狂热。他们不想要对话，一心要摧毁，而且是为摧毁而摧毁。要注意这袭击不带有任何政治诉求。它没有宣言。它是一件静悄悄的暴行，不分青红皂白地加诸一整群人身上。我不能承认这是穷人发动的 B-52 轰炸。

但我想补充的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强权也做过同样的事，他们从空中向一些基本上没有防御能力的人投弹的行为，同样不可饶恕。这也是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干的好事。它以 F-16 战机攻击完全不设防的民宅，本质上也是一种恐怖主义。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陆军，没有空军，没有防空能力可言，而以色列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恐怖。它的攻击不分对象，也不管被攻击者毫无还手之力。它纯粹是为了摧毁和恐吓而摧毁。所以说，我们和恐怖分子对彼此所做的事只有一线之隔。

· 阿马德又这样说过：“为革命而进行的恐怖行动都必须慎重选择对象，考虑到它们是不是社会和心理上可为人所接受的。”他说：“别劫机……别杀小孩。”然后他指出：“所有伟大的革命，不管是发生在中国的、越南的、阿尔及利亚的还是古巴的，都从不会使用劫机式的恐怖主义。”^[1]

[1] Eqbal Ahmad, "Terrorism: Theirs and Ours," presen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October 12, 1998. Transcript available from Alternative Radio.

他们是没有这样做，但不能忘了，劫机现象大行其道是在六〇年代晚期和七〇年代初期——当时坐喷气式客机旅行才开始普遍起来，也是跨国交流的象征——而上述的革命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以前。

· 你看到这种行动有任何革命的成分吗？

没有，当然没有。这是我先前就说过的。其中没有信息，没有试图改变人们的心理。那不是任何事情的一部分。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人是有使用恐怖手段的。他们在餐厅和咖啡厅放置炸弹，炸死法国人。这不是我赞成或会以任何方式鼓吹的行为，但那至少是把法国人赶出阿尔及利亚运动的一部分——法国人在那里已统治了一百三十年。但“九一一”恐怖攻击却不是任何事情的一部分。它是一个面目模糊、毫无宣示性的集体攻击。被牺牲的无一例外都是无辜的人。它没有任何可见的目的，唯一目的就是制造恐怖本身。就此而言，那是一种形而上的跳跃，从政治的领域跳跃到疯狂抽象化和神话性概括化的领域。在我看来，这些人是劫持了伊斯兰教，让伊斯兰教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不要掉入这种陷阱，不要以某种形而上的方式去报复。

杀死一个本·拉登会孕育出二十个本·拉登

· 部分媒体和政治评论似乎呼应着《黑暗之心》（*The Heart of Darkness*）^[1]中的库尔兹（Kurtz）所说的话：“灭绝一切野人。”^[2]《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稿人和《来临中的

[1] 《黑暗之心》是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描述一个海员驾驶一艘商船沿刚果河上溯的经历。——译者

[2] Joseph Conrad, *The Heart of Darkne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p. 87.

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Anarchy*)的作者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国家公共电台(NPR)表示,阿拉伯人对西方人“有一股坚固的恨意”。^[1]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则在《大卫赖特曼午夜漫谈》(*Late Night with David Letterman*)节目里说:“他们(恐怖分子)认定自己是这世界的输家。”又说他们是“懒虫”,是“怀恨者”^[2],接着他哭了起来。

卡普兰和丹·拉瑟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让我茫然不解,但他们都不是我特别仰慕或会寻求洞见的人。我完全不认为本·拉登和他同一类的人会自视为输家。依我看,他们认为自己是重大使命的背负者。他们都是自封的战士,满腔激情与信心,满脑子想着要为一个伟大文明反击野蛮人的攻击。

我认为用赢家、输家这种字眼是错的,非常错。对他们而言,西方代表物质主义,代表庸俗,到处都是淫秽的录影带和色情电影。他们把西方看成是单一的东西,一如大部分美国人把伊斯兰教看成是单一的东西。这个原则是两边通用的。在他们看来,西方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一切丑陋和祸害。因此他们的工作是要为真主净化世界。这种论述对任何用它的人来说都很管用,不管是他们那边的人还是我们这边的人——尽管这两边事实是同一边。使用这种二元对立来思考的人都昧于人类应该加以保护的那些真实:多元性、多样性和具体性。不应该相信荒谬的宗教性抽象——更精确的说法是伪宗教性抽象。相信这一套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上帝或真主的工具。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分出赢家输家——应该让各方面都是赢家。

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来不是没有一些较细致的报导和分析

[1] Liane Hansen, Interview with Robert Kaplan, *Weekend Edition Sunday*, 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 September 23, 2001.

[2] David Letterman, Interview with Dan Rather, *Late Night with David Letterman*, September 18, 2001.

的，至少在欧洲是如此。例如，一个前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帕里斯（Matthew Parris）在《泰晤士报》上说：“难道他们不明白杀死一个本·拉登会孕育出二十个本·拉登吗？大玩世界警察的游戏并不是对“九一一”灾难的恰当反应。”^[1]意大利剧作家、一九九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利奥·福（Dario Fo）也说：“大投机者发大财的同时，贫穷却每年杀死数以千万计的人。……不管（“九一一”）屠杀是谁制造的，这暴行都是暴力文化、饥饿和不人道剥削的嫡亲女儿。”^[2]

一般来说，美国以外的观点都要较细致、较多样，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受到攻击。这是一个重点。另一点是它们是较小型的后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不再有一个帝国需要去防卫，而不管它有什么使命感，那都是源于它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九一一”事件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会跑来这里，说英国与美国是肩并肩的。一如以往，他是想要让英国得到美国这个超级强权的阳光沐浴。但欧洲的媒体会比较持平，还有一个原因。欧洲人与中东人在地理上较接近，在历史上也较密切。这让他们觉得彼此是同一条船上的（这条船你可以称之为“真实”或“历史”），所以会觉得有必要用更分析性、更体谅和更自省的态度看对方。

另外，我猜欧洲人因为美国的强大而有某种程度的恨意和妒意，有时会感到受压迫。所以，欧洲媒体对“九一一”事件之所以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解释，是原因复杂的产物。我发现，从一开始，也就是从“九一一”之后的几天起，美国媒体的言论就陷入了沉闷的单色调。本质相同的分析被重复又重复，少有注意力会投在不同的观点，或允许不同的观点、解释和反省发声。我觉得，这个国家有一种心态，那就是把历史分析看成为开释罪行找理由的方法。根本不是这样子。你是

[1] Matthew Parris, "The Bigger They Come the Harder They Fall," *The Times* (London), September 15, 2001.

[2] Steven Erlanger, "In Europe, Some Critics Say the Attacks Stemmed From American Failing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01, p. B12.

可以历史地去分析一件恐怖罪行而不必为它开脱的。不过，现在也有一些焦虑的声音出现，认为美国太急于行动。为了让人们可以冷静一点，有些人大声把心里话说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就连政府内部也出现了若干杂音。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措词就显然有别于国务卿鲍威尔，后者要谨慎得多。他是个官僚没有错，但我认为他意识得到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由不同思想感受构成的。

· 你觉不觉得现在的情势是一九九〇年的翻版？在白宫主政的同样是个叫布什的人，而一个联盟正在形成，要对世界最穷国家之一的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据中情局的报告，阿富汗甚至没有一个功能顺畅的政府。

不，我不太觉得。除气氛以外，我不觉得现在的情势是一九九〇年（指美国因为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出兵波斯湾一事）的翻版，而我想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冷静下来。现在的情势没有一九九〇年那样匆匆忙忙，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敌人、一条有形的前线。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模糊的东西：恐怖主义。而我说过，它的内涵是还没有经过界定的。你不能把恐怖主义单单等同于本·拉登，显然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恐怖主义。除了阿富汗以外，我们没有特定对象，而正如你刚才说的，阿富汗根本不能与一九九〇年时候的伊拉克相提并论——当时的伊拉克拥有庞大的陆军、空军和飞弹。我们看来没有一个目标。光说目标是铲除恐怖主义和修理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是不够的，因为那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需要历时很多年，动用许多不同的方法，而这么广泛和复杂的冲突是大部分美国人还没有预备去面对的。

所以说，当前的气氛固然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又多了一种成分，那就是这场反恐战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定义性，因为，加起来有

六十个国家是被认为支持恐怖分子的。美国要怎样面对这个超级复杂的现象迄今还是未知数。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而诚如帕里斯说过的，就算你抓得到本·拉登也没用，因为很明显的，他的组织如今已独立出去。何况，还会有更多本·拉登这样的人在以后一再出现。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范围更精准、定义更周详和更耐心建构的反恐运动。我们也不只需要调查恐怖分子的现状，还得调查其根源，而那是可探知的，是可以找出来的。

单边主义是乔治·布什外交政策的关键词

· 在皇后区住着个叫康斯坦特 (Emmanuel Constant) 的海地人。他在海地被指控为战犯，以违反人权的罪名被起诉。海地一直试图把他从美国引渡回国。^[1] 如果海地以美国包庇战犯为理由而动用空军或海军攻击美国，那会是什么光景？

正是如此。我想你的问题本身已经包含了答案。那是难以想象的，也唯有美国这个巨大强权能干出这样的事——它目前看来就有这样的计划。我的资讯不比任何人多，但看来美国政府正在搞一个大型的跨国运动，甚至是跨大洲的运动，去对付那些被认为跟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国家。

目前的情形，华府就像有个秘密法庭决定哪个国家应该攻打，而情报部门内部也在辩论，哪个国家合该轰炸。这是完全叫人不能忍受的。没有任何个人或政府有权拥有这种欲望或执行这种欲望的能力。

对“九一一”恐怖攻击的合理回应——再一次，我是以一个为恐怖

[1] Sarah Kershaw, "Renewed Outcry on Haitian Fugitive in Queen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2000, p. B2.

攻击带来的死伤哀痛的纽约人的身份说话——不应该是美国单方面主导一切，而是应该马上诉诸那个世界性的组织，也就是联合国。就像其他事件一样，这个事件的最高指导原则应该是国际法。但一切大概都已经太迟了，因为美国从未这样做，一向都是独断独行，就像它当初攻打伊拉克那样——直到攻打行动计划已经决定了才知会联合国。

· 为什么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曾经努力要在海牙成立一个审判前南斯拉夫战犯的联合国法庭，而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

问得好。但首先要知道的一点是，现在的美国政府已不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乔治·布什从一上任就把话说得一清二楚：单边主义是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词，只要是攸关美国利益的事，他想怎样做就会怎样做，而什么事攸关美国利益，也完全是由美国来定义。美国外交政策偏向单边主义已经有一长段时间，但现在却加速了，而这大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九一一”事件已经把美国的眼光钉死了。缺乏一贯性和我行我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

媒体喜欢找专家，却不问他的能力与资望

· 在你为新版的《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所作的序《媒体和专家是如何决定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一文中，你说：“对伊斯兰教恶毒的概括化，已经成为西方最后一种还被容许的诋毁异文化的方式。”^[1]谈谈大众文化在塑造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所扮演的角色。夏欣（Jack Shaheen）出版了一本新书，叫《放

[1] Edward W. Said,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Updated and revised ed. (New York: Vintage, 1997), p. xii.

映坏蛋阿拉伯人》(*Reel Bad Arabs*)，谈好莱坞一直以来怎样丑化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伊斯兰教。^[1]你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吗？

相当重要。我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而我最先探讨这个主题是在《东方主义》。长久以来，美国人谈到伊斯兰教或阿拉伯人的时候（顺道一提，很多人都认为阿富汗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都不会加以细分，而认为它们有一组核心的本质属性——一些狂想出来、属于大写的“他者”（the Other）的属性。这种态度把伊斯兰教视为西方人的反面：狂热、暴力、好色、非理性等等。这种看法之所以一直坚持不辍，有着非常根深柢固的宗教原因，那就是伊斯兰教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竞争对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同出一个根源，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它先被发展为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再然后是伊斯兰教。另外，伊斯兰教还统治过欧洲一长段时间，始自七世纪中叶，迄于十五世纪，近八百年之久。

把伊斯兰教视为一个有威胁性的“他者”的意识至今还持续着。那套自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有关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知识——我称之为“东方学”——很大程度是为了维系欧洲和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和霸权而设。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形今天并没有改变多少。虽然美国跟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已经有那么长的历史，但如果你看看大部分的大学，就会发现涉及伊斯兰教的课程非常少。而如果你看向大众媒体，就会发现那个始自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的《沙漠情酋》（*The Sheik*）的刻板印象不仅未变，而且电视、电影和一般的大众文化还进一步把阿拉伯人渲染成跨国性的坏蛋。^[2]

[1] Jack G. Shaheen, *Reel Bad Arabs: How Hollywood Vilifies a People*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Interlink, 2001).

[2] *The Sheik*, directed by George Melford (1921) and *Son of the Sheik*, directed by George Fitzmaurice (1926).

要对伊斯兰教作出一些荒谬的概括化是很容易的。几乎每一期的《新共和》都会把伊斯兰教等同于极端的邪恶，把阿拉伯文化贬低为堕落的文化。同样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于今日美国的其他族群身上。人们普遍都很在意——也合该如此——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感受。但对阿拉伯人的歧视却始终存在，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这场辩论中缺乏积极参与。

其理由相当复杂，无法在这里详加析论，但其中一个理由是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一直没搞清楚西方和大部分西方人是怎样看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他们没有一种对西方的文化政策，意识不到参与辩论或对话的重要性。就伊斯兰教而言，就阿拉伯人而言，跟西方文化的对话是阙如的。另外，以色列也要负很大责任。如果你试图谈阿拉伯世界，如果你想把一个阿拉伯作家引介到美国（这个我有亲身经验），总是会引起亲以派的大声抗议，说为什么你不平衡一下？为什么你不同时引介一个以色列作家？有些时候，如果你谈阿拉伯文化或文明，就会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这是一个非常固定的结构，是你必须要去克服的。没有一个容易洽谈的平面，到处都是政治陷阱和圈套。

我想补充谈谈高等教育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虽然它有一个中东语文系，有一个宗教系，却没有常设的《古兰经》课程。但想了解伊斯兰教，你就不能不了解《古兰经》。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像你没读过新旧约就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没读过《摩西五经》（*Torah*）就不可能了解犹太教。何况，《古兰经》在伊斯兰教的地位要比《福音书》之于基督教或《摩西五经》之于犹太教还远远过之。你不可能只从一些概论性的书籍或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就了解伊斯兰教是什么。

· 你在《报道伊斯兰》的导论里说：“有一批所谓的伊斯兰事务‘专家’已经声名显赫，每逢发生什么大事故，他们都会被请出来，在新闻节目或谈话节目里放言高论他们对伊斯兰教那一套公

式化意见。”^[1]公共电视网一个享誉甚高的节目是每晚一小时的《查理·罗斯秀》。我把它自“九一一”攻击事件后邀请过的来宾列成清单。我把其中一些名字念给你听：克拉克（Wesley Clark）、柏格（Sandy Berger）、刘易斯（Anthony Lewis）、里奇（Frank Rich）、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霍格兰（Jim Hoagland）、祖克曼和阿贾米（Fouad Ajami）。阿贾米一共上过三次节目，他本来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常客，现在却不着痕迹地移师到公共电视网去。

它让你看到人们对“九一一”的侧重点何在，也就是不是把它单纯看成一件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而是当成一件具有重大国际后果的事，认为它攸关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你提到的人并不全是一国的，但在这一类事情上，他们的观点大体相同。这些人之中，只有阿贾米算是对伊斯兰或阿拉伯世界略有所知。阿贾米清清楚楚表明他是站哪一边的：美国右翼的一边，新保守主义的一边。他对以色列摆出相当友好的立场，而因为他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以被认为是谈话节目的理想来宾。但事实上，从他出版过的东西和说过的话显示，他不是个有求知欲的人，而在我认识的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专家里面，没有人知道他这一号人物或把他当一回事。这是媒体认知不协调的一个显著例子。媒体喜欢找专家，却不问他的能力与资望，不管他的作品或知识是不是够得上被尊为专家。这是相当让人突兀的。我随口就可以说出半打比阿贾米更精通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事务的人。

· 谈谈即将受美国军事行动影响的伊斯兰世界两翼——西翼的埃及和东翼的巴基斯坦。

[1] Said, *Covering Islam*, p. xi.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埃及政府正备受一个伊斯兰运动的困扰，那基本是由埃及民族主义组织推动的，也就是兴起于一九三〇年代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一个反英、反帝国主义和反君主专制的组织。当然，它的目标也一直是在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埃及虽然以穆斯林占大多数，却不完全是个伊斯兰国家。科普特教会（Coptic）的基督徒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少数，而他们的埃及国民意识一点不亚于埃及的穆斯林。但不管怎样，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正在往一个高度反动的方向走。它把自己视为肩负恢复原始伊斯兰教的使命，企图要把埃及带回到伊斯兰教教法（Sharia）的统治，把埃及转化为七世纪的麦加，把一切现代文明加以摧毁。他们受到注意，是因为他们有武装，相对有组织，其支派有能力执行自杀任务，干出杀死观光客和行刺萨达特（Anwar Sadat）之类的事。他们是一股破坏性和暴乱性的力量。

但这并不表示所有虔诚的穆斯林——戴头套（hejab）的妇女和穿长袍蓄大胡子的男人——都是他们的一分子。另外，埃及国内还有另一个大型的反对团体，它反对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经济和外交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制造了一个贫穷的毕业生阶层，他们的人数以每年数十万计增加。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没有机会，没有像样的住处，无法养家糊口。伊斯兰教把他们全集结在一起。

对于这些人，埃及政府一直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它有时会顺应他们的要求，例如禁掉一些被认为色情和反伊斯兰教的书籍，把教授和作家和公众人物的资料建档，密切监视一些被认为有异心的团体，不管是同性恋团体还是宗教团体。

巴基斯坦的情形却不同，复兴伊斯兰教的努力一直相当不成功。每当有机会举行公投，让全民决定他们想不想要一个伊斯兰政府的时候，他们总是败北。但他们仍然有能力搞破坏、暗杀之类的事。他们也对偏斜的经济体表示不满。巴基斯坦是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却无力解决像卡拉奇（Karachi）这些大城市的贫穷、饥饿和失业问题。所

以，巴基斯坦本来就是個非常不稳定的国家。现在，再加上要配合美国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个大包袱，将会让这个国家陷入深深的不安。要是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的军事政府被一个伊斯兰教或支持塔利班政权的运动搞垮，那局面将会更具威胁性，因为巴基斯坦拥有核武。那可不是好玩的前景。

· 九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的一张头版照片显示两个巴基斯坦警察对一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拳打脚踢。有四个巴基斯坦人在卡拉奇被杀。^[1]

这不奇怪，那是一个军事政府，一心只想着讨好美国和跟着美国动员。这可以为它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豁免掉若干外债。^[2]它会获得更多的资助，而穆沙拉夫政府也会得到美国的巩固。但尽管有这些好处，介入战争对巴基斯坦的影响长远来说是负面多于正面。

· 目前的情形可说充满反讽，特别是在巴基斯坦。他们在一九八〇年代曾经扶植过“圣战士”，而“塔利班”更是他们一手建立和助之取得政权的。

对，至今还是如此。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该怎么说呢……事实上是塔利班政权的控制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有密切的贸易关系，而它们之间的毒品买卖是准官方性的。那不只涉及一两个人。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所有机构都脱不了干系。所以战争一旦爆发，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

[1] See David Rohde, "Militants in Kashmir Deny Pakistani Suppor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02, p. 1; 27, and photograph on p. 1; 1.

[2] Edward Alden, "Bush Offers Fresh Help to Pakista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ruary 14, 2002, p. 10.

· 最后，可不可以说说有哪些有用的资讯来源？

关于阿富汗，有一系列的著作可资参考。我会建议从你提到的阿马德的作品入手。他是我的挚友，两年前逝世。^[1] 我推荐他的作品，是因为他了解阿富汗。他本身是巴基斯坦人。他也了解西方。他了解阿拉伯人。他是个穆斯林。他是个有现代意识而历史知识极为丰富的人。所以我建议从阿马德的作品着手。他有一系列的文章——包括你对他的访谈——都是容易找到的。至于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的资料，有一整座图书馆的资料。胡拉尼（Albert Hourani）和希提（Philip Hitti）的作品都是非读不可的。^[2] 有关当代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作品同样可以塞满一座图书馆。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找一些权威性的作品来读，而不是读一些论战性的文章或国防部为征服和战争所出版的手册。

[1] See Ahmad and Barsamian, *Eqbal Ahmad: Confronting Empire*.

[2] See, among others, Philip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10th rev.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2).

第五章

以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看以巴冲突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五日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KGNU 电台

· 巴勒斯坦目前的危机或许是以色列占领三十五年以来最严峻的。据伦敦《卫报》(*Guardian*) 报导，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严重营养不良”。^[1] 你对目前情势有什么评估？

可怕。那几乎完全是以色列人对西岸城市的占领造成的。加沙被铁丝网围得像个铁笼。城市与城市间的道路是不准巴勒斯坦人用的。整个路网系统都保留给以色列的屯垦者使用，而他们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不合法的。如果把被以色列非法兼并的东耶路撒冷算进来，如今的屯垦者超过四十万人。他们被容许带着武器到处走。巴勒斯坦人基本上是被关在家里面的，每天都有几段很长的禁足时间，中间只会解除一阵子，以便他们可以出外买吃的。约旦河西岸大部分的基本建设都已经遭到摧毁。以色列把那里称为

[1] Jonathan Steele, "For Hire: The Boy Human Shields in Gaza's Most Desperate Town," *The Guardian* (London), August 6, 2002, p. 2.

“恐怖分子的巢穴”而大肆破坏，但事实上，他们破坏的几乎都是民用设施：电力、水力、卫生设施。所有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都遭摧毁，不只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办公室遭殃，连教育部、劳工部、中央统计局的建筑也全都被摧毁。以色列部队砸烂电脑，把硬盘和档案带走。一百万份学童档案被以色列人掠去^[1]。另外，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大部分学生到不了的。等穿过重重的路障，学校早已下课。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变得艰难无比。比方说你想从巴尔宰特到拉姆安拉的医院看病，你根本到不了。你必须在路障前面排好几小时的队，接受检查。有好几十人因为无法洗肾而丧命。有关人们（大部分是平民）在检查站受到射击的报导比比皆是，甚至在美国这里也读得到。

当然，美国媒体更喜欢报导的是巴勒斯坦的自杀炸弹客。报导中会附有流血现场和出殡场面的照片，遇害者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那些炸弹攻击当然都是可怕的事件。问题是，被以色列杀害的巴勒斯坦人要比在自杀炸弹攻击中遇害的以色列人多上许多。现在，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情况的报导，而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几乎每一篇的最后都会说今天有四个或五个或六个巴勒斯坦人被杀。报纸不会登载他们的姓名。以色列士兵杀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死难者中不少是儿童。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比率是三比一，有时甚至是四比一。^[2]

巴勒斯坦人营养不良是以色列人禁止食物流通的直接结果。让我告诉你一件昨天才发生的事。一辆载着四千公斤李子的货车想要进入加沙这个铁笼，却被留置在一个路障前面几小时，因为烈日暴晒，最后李子全烂掉。^[3]最要命的是禁止医疗服务、血液供应和药物。我有一

[1] See Ewen MacAskill, "Schools, Banks, and a Puppet Theatre Trashed," *The Guardian* (London), April 26, 2002, p. 13.

[2] See chapter 2, note 5.

[3] See Joshua Hammer, "Road Rage and the Intifada," *Newsweek*, July 30, 2001, p. 20.

个女性朋友因为生病获准出外就医。救护车要把她从拉姆安拉载到约旦的安曼。她坐在车头。但去到离盖兰迪亚 (Qalandia) 检查站大约两百公尺的时候, 士兵向救护车开火, 挡风玻璃粉碎, 子弹只差几英寸就打中她。这种事司空见惯。

我刚写了一篇文章, 叫《缓慢死: 被细细惩罚》 (Slow Death; Punishment by Detail)。^[1] 我想, 这就是沙龙的计划, 细细惩罚巴勒斯坦人, 让他们慢慢死去。饿他们, 揍他们, 让他们受不了, 自己走人。但他并没有得逞。巴勒斯坦人还是留在自己的土地, 没有离开。他们是绝望, 是不快乐, 但就如所有的反殖民战争的情况一样, 压迫反而加强了他们的韧性和抵抗意志。

巴勒斯坦人目前没有政治前景可言。沙龙的计划基本上是要要求美国大规模援助, 利用这援助把对巴勒斯坦人的围困继续下去。现在人们都在大谈改革, 而有很多改革方案也在酝酿中。很久以前乔治·布什就说过, 我们巴勒斯坦人需要改革。但乔治·布什对巴勒斯坦的了解不多于一颗大头针的针顶。在目前的处境下, 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或选举或安全。巴勒斯坦人等于是被关在自己家里。没有人被允许随处去, 如果你这样做, 就会被射击。车辆会被摧毁。以色列报纸满是有关肆意破坏的报导, 而从四月起, 以色列的破坏行动更是指向了民宅。在杰宁 (Jenin)、雅波亚 (Jabalya)、狄黑旭 (Deheishe) 这些地方, 好几千户巴勒斯坦民宅被美国所提供的推土机所推倒。另外, 老城纳布卢斯市中心被入侵, 由一百五十辆以色列坦克占领。要知道, 那里的街道又小又窄, 坦克开过, 两边民宅的墙壁就会被挤烂。以色列威吓的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平民。

[1] See Edward W. Said, "Punishment by Detail," *Al-Ahram Weekly* 598 (August 8-14, 2002). Online at <http://www.ahram.org.eg/weekly/2002/598/op2.htm>.

被封死在罐头里的沙丁鱼

· 让我学学以色列人的口气说话：“我们没有谈判伙伴，我们采取这些手段，是面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一种自卫。”你会怎样回答？

自一九九三年起，他们就有了谈判伙伴，当时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跟他们签了一纸协议。这协议的后续发展我都记载在我的书里。以色列本来答应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但最后只归还了18%的土地，而如今，他们又把它们给重新占领。在这段期间，屯垦区的数目增加了超过一倍。所以随着所谓的和平进程的推进和谈判的展开，巴勒斯坦人事实上一无所获，屯垦区的数目和巴勒斯坦人被抢走的土地只有愈来愈多。

自一九九六年起，以色列好几次关闭边界，让那些要到以色列打工讨生活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其门而入。以色列又从罗马尼亚和泰国这些国家输入数以万计的外劳。^[1]单是加沙一地，失业率就高达70%，有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每天靠少于两美元生活。^[2]这一切制造了一种绝望气氛。人们名副其实是要为生存而奋斗。他们没有陆军，没有空军，严格来说也没有领袖，因为阿拉法特被关了起来。也没有任何民生事务部门，因为以色列把它们摧毁殆尽。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然后以色列又说他们没有谈判伙伴。其实他们想要有多少谈判伙伴我们都拿得出来。除美国和以色列以外，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会乐于与民选出来的领袖谈判。

[1] Tal Muscal, "Foreign Worker Permits Continue to Rise Despite Government Decision,"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9, 2002, p. 11.

[2] Khaled Abu Toameh and Melissa Radler, "Palestinian Society Teetering on Edge of Ruin, UNRWA Warns,"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2, 2002, p. 2, Wilkinson, "Palestinian Towns Wobbling on Last Legs."

我是个异议分子，而如果要投票，当然不会投给阿拉法特。但他却毫无疑问是巴勒斯坦人的领袖，因为他是在一九九六年一次受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当选的。所以巴勒斯坦是有人当家做主的。但沙龙及其内阁的目的却是要把巴勒斯坦人罪犯化、孤立化和非人化，让他们像蟑螂一样死去。正如沙龙昨天所说的，巴勒斯坦人的领袖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帮暗杀者和腐败的恐怖分子。^[1]

所以说，对，你是可以摧毁别人对话希望的同时而又抱怨没有对话伙伴的。巴勒斯坦人的死伤者之中，大约80%是平民^[2]。迄今有近一年的时间，以色列都在实施所谓的“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s），也就是暗杀行动。^[3]只要他们认定谁是恐怖行动的策划者，就会用汽车炸弹或直升机飞弹或F-16把他干掉。但从一架F-16投弹到全世界人烟最稠密的地方，将无可避免带来其他的死伤。在最近一次行动中，有四座建筑被摧毁。十五个人被杀，其中九个是小孩子。然后，沙龙宣称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执行得最成功的行动之一。^[4]

如果杀死九个小孩子是成功的行动，那我就奇怪，为什么人们在谴责巴勒斯坦人出于绝望的自杀炸弹攻击之余，不同时谴责以色列的恐怖轰炸，它造成的死伤远要大得多。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迄今已杀死八十个人。^[5]他们只说某个人是某件阴谋的主使者，不提出任何证明，不列举任何证据，就径直去杀他。他们会把他旁边的人一起除掉。如果他是坐在车子里，他的家人就得陪葬。以色列还会拆毁他和家人的房子。

[1] Ramit Plushnick-Masti, "Sharon Calls Palestinian Authority a 'Terror Posse,'"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8, 2002.

[2] See chapter 2, note 5.

[3] See Dan Izenberg, "Report Slams 'Assassination' Policy,"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7, 2002, p. 3, referencing reports by the Public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in Israel (PCATI) and the Palestinian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LAW).

[4] Sharon called the assassination of Salah Shehada a "great success." Suzanne Goldenberg, Brian Whitaker, and Nicholas Watt, "Sharon Hails Raid as Great Success," *The Guardian* (London), July 24, 2002, p. 1; Anton La Guardia, "Israel Divided by Policy of 'Target Killing,'" *Daily Telegraph* (London), July 26, 2002, p. 16.

[5] See chapter 2, note 5.

要不就是把他家族中的男性成员驱逐出境。除此以外，自从在春天重新占领约旦河西岸以后，以色列拘留了一批为数不少的巴勒斯坦人，并把其中一些押解到以色列去。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这是不合法的。你不能把别人从他们的土地抓走，带到另一个国家去。但以色列却这样干了。它们还在一些巴勒斯坦人的手臂上用墨水刺上记号，情形跟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两样。以色列是个核子强权，配备最新式的美国军火，却用它们来对付基本上手无寸铁的平民。那很难可以称之为自卫。在我看来，那是恐怖主义和谋杀。

一件从未被美国媒体正视的事情是，不只以色列所谓的自卫是站不住脚的，它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也是站不住脚的。巴勒斯坦人已战斗和抵抗了超过三十五年。他们失去了大部分土地。一纸空文的“奥斯陆协议”让他们失去更多土地。另一件从未被正视的事情是，巴勒斯坦人是一群无国之民。以色列干的事是冲着他们全体干的，不是冲着某些被称为恐怖分子的个人。其目的正如沙龙自己多少说过的，是为了摧毁巴勒斯坦人生命的痕迹。要么进行种族清洗，要么把他们大批送到约旦，或看着他们自己走人，或让他们慢慢死去。

我认为以色列自卫的一套说词完全是胡说八道。要不是有美国撑腰，同样的事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马上被围剿。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敢当着电视镜头前面明着干的国家。电视当然是有缺陷的媒体，它不提供背景与脉络。但它至少可以让你看到民宅被毁的情景，看到以色列坦克怎样在无武装的村庄里大模大样的样子。用“自卫”这样的字眼是语言的歪曲，其诉求只有“荒谬”两个字可以形容。

· 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哪些方面跟以色列的对巴政策有交集？

那是送给沙龙的大礼。沙龙现在爱说，美国在阿富汗所做

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做的事。^[1] 这是一个荒谬的类比。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被切割为一小区一小区的，巴勒斯坦人根本动弹不得。他们就像是被封死在罐头里的沙丁鱼。所以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说成是某种恐怖分子中心——像美国说阿富汗的那样——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其一。

其二是，以色列已经军事占领了巴勒斯坦三十五年。人们会忽视这一点，不是因为以色列不愿意承认那是占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是他们的。几星期前，我看到以色列内政部长兰多（Uzi Landau）在电视谈话节目里争辩说“占领”两个字是用词不当^[2]。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现在也说同样的话。^[3] 兰多说：“你怎么可以说那是占领？我们只是回家。虽然有别的人住在那里，但这不是重点。犹太人是根据神圣权利拥有这片土地的。”

这又是一个荒谬的论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有人胆敢提出这样的论证。第三点我要说的是，不管在约旦河西岸还是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收效都相当可疑。阿富汗是个破败的国家。它受到无情的轰炸。美国声称它俘虏或摧毁了大部分的基地组织（al-Qaeda）。美国抓了两三千个俘虏。他们其中一些被不合法地送到关塔那摩湾（Guantánamo Bay），在那里受到不人道的对待。^[4] 本来，美国攻击阿富汗是为了抓本·拉登。但本·拉登却消失了，奥马尔（Mullah Omar）^[5] 也不知所踪。现在的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政府虽然得到美国支持，但阿富汗的局势只比从前还要

[1] See Gary Younge, "Lots of Wars on Terror: The Bush Doctrine Is Now a Template for Conflicts Worldwide," *The Guardian* (London), December 10, 2001, p. 17.

[2] Interview with Uzi Landau, *The Charlie Rose Show*, PBS, June 28, 2002.

[3] Rumsfeld referred to the "so-called occupation" of Palestinian land. Barbara Slavin, "Rumsfeld View Veers from Mideast Policy," *USA Today*, August 7, 2002, p. 10A.

[4] See Julian Borger, "Civil Liberties Clampdown: Rights Flouted at Guantanamo Bay," *The Guardian* (London), September 9, 2002, p. 4.

[5]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领袖。——译者

动荡。

我没有意思声援塔利班政权。他们是一群狰狞的人。但不要忘了，他们曾经部分受到美国的支持，先是在对抗苏联的战争，后来是在阿富汗内战。他们至少曾经能够维持阿富汗的秩序，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在喀布尔（Kabul）街头闲逛，就会有性命之忧——出了喀布尔之外就更不用说。以为恐怖主义是可以打击和制止的想法同样是荒谬的，因为那是个从未被检验的形而上观念。它让美国就像以色列一样，变成某种恐怖的、近乎神学性罪恶的牺牲品。布什和沙龙都以为他们有权自任为十字军，爱用什么方法打谁就打谁。就因为这样，道德、强弱悬殊的比例和攻击平民全不被当一回事。

美国已经愈来愈相信（这是以色列所乐见的），它有权利去改变别的国家的政权。它公开宣称它想要改变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政权。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利益与以色列的利益有异乎寻常的重叠。但在我看来，它们无一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手在这里力量非常庞大。而像珀尔（Richard Perle）^[1]、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和他们的所有走狗都在把美国拖向战争，制造大破坏——不管是破坏中东地区，还是破坏美国的经济甚至世界的稳定性本身。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但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谈谈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战略利益。

[1] 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的智囊。——译者

美国在这地区的外交政策有两大主轴。一是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和战略地位，以之作为美国的代理人。另一是力保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能够无障碍地源源流入美国。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去六个月以来，美国媒体不约而同出现了一波反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运动，而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两大阿拉伯盟友。我不认为这是偶然的。关键在于以色列和美国想要改变中东的形势图，以便美国可以更直接控制波斯湾的油源。而通过在诸如伊拉克扶植对美国俯首帖耳的新政权，也可以除去以色列的一些心腹大患。

伊拉克是潜在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它有油源。它有水源。它的国民教育程度偏高。它有一个可怕的政府，由一个暴君所领导。它受到禁运的重创迄今已经有十二年。现在美国想要进一步把它剁成肉酱，让伊拉克不再成为一股反对以色列的力量。美国也想对沙特阿拉伯做同样的事。我不是要声援沙特王室（House of Saud），但他们供应了美国六十年廉价的石油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是以牺牲人民和阿拉伯世界的福祉为代价的。

而美国现在却有一个反沙特阿拉伯的运动。大概是想要拉现在的政府下台，不然至少是压制它，让它无法在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共同斗争中起作用。对埃及也是如此。这两个政权都腐败、无效率而专制得无可救药。它们打压人权。民主在这两个国家都寥寥无几——埃及要比沙特阿拉伯多一点。美国想要除去它们，压制它们，就像伊拉克行将会因为被打败而受到压制那样。压制它们就可除去这些国家可能带给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战略利益。其出发点是要让巴勒斯坦人失去一切支持。压制沙特阿拉伯的好方法大概是夺去它的油田。压制埃及。摧毁伊拉克。改变伊拉克和伊朗的政权。然后你就会有一张新的中东形势图——一张让以色列称心如意的地图。

沙龙一直都是打这样的算盘。他在一九八二年之所以入侵黎巴嫩，不只是为了摧毁巴解组织（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为了改变政

权，扶立以色列的恭顺盟友贾梅耶（Bashir Gemayal）上台。^[1] 贾梅耶甫就职就被刺杀了。^[2] 但沙龙并没有学到教训，他仍然以为军事力量和美国的支持可以让他扮演上帝的角色，重绘中东地图。不幸的是，布什和五角大楼那群家伙同样相信这一套。那基本上是一种抽象和理论性的思维。他们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了解少得可怜。

其结果是引起巨大的反美浪潮，而美国目前的政策只让事情雪上加霜。现在美国打算建立一个电台，向阿拉伯人广播，争取他们对美国及其政策的支持。但阿拉伯人不是笨蛋。布什反复重申的美国价值观也许真的存在于他和他四周一群人的脑子里。但阿拉伯人、穆斯林和欧洲人却愈来愈看清楚，美国是个藐视国际法的国家。它撕毁一些协议又拒绝签署另外一些。它认为自己凌驾一切，凡事都可以当个例外。人们看到的是这个，不是美国价值观——不管所谓的美国价值观到底何指。从这个国家出口的，除了消费品以外，还有一种非常有别于自由与民主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正往很糟的阶段一头栽。

七月底，马里兰大学教授泰尔哈米（Shibley Telhami）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指出：“在这个地区（指中东地区），仇美情绪弥漫。”^[3] 如果这一类的评估是正确的话，美国为什么继续推行种种会引起憎恶和怨恨的政策？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想起因是一种知觉的扭曲，而其推手主要是以色列。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扭曲美国的政策，让美国把以色列的福祉摆在第一优先。在美国，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聚焦方式。这个国家的政治论述显然就是这样。我来举一个例

[1] 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Lebanon at War*, 3r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74.

[2] Fisk, *Pity the Nation*, pp. 353-55.

[3] Shibley Telhami, Testimony,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Federal News Service, July 31, 2002.

子。麦考尔 (Carl McCall) 正在竞选纽约州长。他认为, 想要胜选, 就非得到以色列走一趟, 输诚表忠。他跑到约旦河西岸一处屯垦区, 向“恐怖分子”放了一枪, 以证明他对以色列的忠诚, 证明他对以色列及其屯垦政策的支持是真诚的。^[1] 希拉里做过同样事情。除了麦金尼女士 (Cynthia McKinney) 等少数例外, 每一个参议员和众议员都会愿意签署一封信, 承诺支持以色列, 承诺永不指责沙龙。这是一种内建的思维方式。

除此以外, 美国民众对中东情况的惊人无知, 也是美国的偏颇政策得以维持下去的理由。阿拉伯人从未有过统一的宣传政策。跟犹太人比起来, 美国的阿拉伯人是一个很小的少数, 势力、财富和组织性都远不如犹太人。阿拉伯人被视为恐怖分子和狂热分子。伊斯兰教被描绘为爱暴力的宗教。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当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印象。你不容许加以反驳。刻板印象又被希金斯 (Christopher Hitchens)、伊格纳蒂夫 (Michael Ignatieff)、沃尔泽 (Michael Walzer) 这些前左翼分子所加固, 他们异口同声说恐怖主义是伊斯兰教固有的东西, 是伊斯兰教的核心部分。他们甚至创造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 (Islamofascism) 这样的字眼^[2]。结果就是任何异议和理性讨论都几乎受到禁止。

你在媒体上找不到任何对这一类谬论的反驳。再者还有罗斯 (Dennis Ross) 这一类的人。他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中东和平特使。在那之前他是拿以色列的钱为以色列游说的人, 当完特使后又重做冯妇。他在电视上说阿拉伯人断然拒绝以色列的一切美意, 说以色列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而阿拉伯人是罪犯, 应该以核武加以消灭。媒体也

[1] See Adam Nagourney, "McCall's Israel Trip Lingers As Issue in Governor's Rac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2002, p. B5; Susan Saulny, "Demonstrations Highlight Deep Divisions Over Growing Conflict in Middle East," *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02, p. B5.

[2] See Oliver Burkeman, "Nation Loses its Voice," *The Guardian* (London), September 30, 2002, p. 7.

附和他的意见——不过这是可理解的，因为当时人们还处于“九一一”事件引起的震动和愤怒中。

但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两亿八千万阿拉伯人和十三亿的穆斯林，他们并不是一个样的，不都是恐怖分子。这个事实全被遗忘了。结果，人们脑子里有的只是一些抽象化和概括化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又受到刘易斯之流的所谓杰出东方学家的加强。刘易斯说过，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走入了歧途。^[1]听他的口气，就像是在谈一些托儿所里的小孩，他们因为行为偏差而应该送到感化院。在这种情况下，要理性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变成了不可能。如果你试图这样做，就会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者。不过更多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发声的空间。另外，大众的态度也是非常冷漠，对他们来说，中东是个遥远的地方，充斥着想要杀死我们的恐怖分子。结果我们就寻求更多的战争、更多的摧毁，但也招致更大的反美情绪。

我们是受害者的受害者

· 阿马德在为《笔与剑》写的导言里说：“巴勒斯坦人的一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2]

正如我常说的，我们是受害者的受害者。以色列是在第二次世界

[1] Be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e Edward W. Said, “Impossible Histories: Why the Many Islams Cannot be Simplified” (review of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and Karen Armstrong’s *Islam: A Short History*), *Harper’s Magazine*, July 2002.

[2] Eqbal Ahmad, Introduction, in Edward W. Said, *The Pen and the Sword, Conversations with David Barsamian*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4), p. 15.

大战和纳粹大屠杀之后建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始于一八九〇年代，而早在二战以前，巴勒斯坦就已经看得到犹太人的屯垦区。当时犹太人为赶走握有巴勒斯坦托管权的英国人，也曾采取恐怖主义手段。这一切都被人遗忘了。人们还记得的只是——某种程度是正确的——欧洲的犹太人在大战后无处可去。欧洲人不想要他们，美国人不想要他们，只能任由本-古里安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操纵。他把他们带到巴勒斯坦，而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巴勒斯坦民族被剥夺、遭受驱逐。

巴勒斯坦不是无人地带。那里早住着人：八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一九四八年被从他们自己的土地赶走。这一点，在以色列的军事档案里是可以查得到的。过去五十四年来，以色列都受惠于欧洲人、基督徒和美國人对纳粹大屠杀的罪疚感。不幸的是，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巴勒斯坦人。我们巴勒斯坦人总是被视为是反犹的。事实上，巴勒斯坦人是明令禁止杀害犹太小孩的，再说，我们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军事强权，根本没有能力还手。但就因为我们被认定是反犹的，所以就被认为是该杀的。以色列总理贝金（Menachem Begin）在一九八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时就说过这样的话。^[1]他说杀巴勒斯坦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继承了纳粹的传统。

但大家对这件事都是有道德责任的。以德国人为例。他们的立场非常为难，因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他们干的。它与以色列的关系极端敏感。尽管如此，德国和英国还是应该拿出勇气来，面对他们的责任，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是它们一手造成的。当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时，当英国人把巴勒斯坦留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他们就制造了巴勒斯坦人的悲剧。当然，他们是为难的，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有为巴勒斯坦人挺身而出，才符合道德正义。很多巴勒斯坦人都说，欧洲人对犹太人所做的事为什么要我们来买单？历史上，住在阿拉伯或伊斯兰

[1] See Edward Cody, " 'Soldier' or 'Terrorist' ; Through a Mideast Looking Glass, " *Washington Post*, July 7, 1982, p. A1.

国家的犹太人要比住在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好过得多。在伊拉克、也门和埃及这些地方都有犹太人的团体。他们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不觉得有必要到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中东原是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地区。

以色列目前所做的事乃是追求一种神话性的种族纯净。以色列之所以打压和杀害巴勒斯坦人，目的是维持其国家的犹太性格。依我之见，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承认那是一片住着两个民族的土地，唯一的希望就是愿意以平等的方式并存，而不是以一方凌驾于另一方的方式并存。但正如我说过的，西方人对犹太人的苦难是那么的问心有愧，以至于巴勒斯坦人要取得同情仍然困难重重。

但看起来，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明白到，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是不能拿纳粹大屠杀来当理由的。没有错，以色列是个独立的国家。但它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宣示国界的国家。有的只是停战界线。以色列保留扩张国土的权利，一心想着攫取更多的领土，赶走更多的人。这跟纳粹大屠杀一点都沾不上边。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弥赛亚式狂热。它只会让非常血腥的局面长存下去。很多以色列人如今已明白这是一种自杀政策。因为就算以色列能够彻底摆平巴勒斯坦人——比方说把他们杀光或全部赶走——它被一群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国家环伺的事实还是改变不了的。阿拉伯人这种敌意与日俱增，因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现在是在阿拉伯的电视和全世界的电视上看得见的。以色列制造的怨气甚至恨意历几代人都不會消散。他们的政策是非常短视的。假定美国会永远支持它是不智的。他们也不能假定全世界会永远任由它藐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案。总有一天，它会自食恶果。

· 还有两三个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因素。其中一个是一些庞大的美国国防承包商，像是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它们明显是希

望中东局势会继续动荡下去，以便可以卖更多的军火。另一个因素则是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对以色列的热烈支持。

先说第一个。那是极重要的因素。我想全美五百个国会选区的每一个，都多少存在着国防产业。所以，武器外销——它是美国一大出口项目——如今变成了一个就业议题而非国防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东地区要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花更多的钱在买美国的武器上。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军火的最大买主之一。^[1]所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是有相互依存关系的，而这是那些反沙国运动的鼓吹者所忽视的。但讽刺的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科威特和卡塔尔（Qatar）都大量购买最先进的战斗机和激光导弹，却又不能用它们。

埃及也是这个样子，埃及军方是该国就业人口的最大雇主，它的武器极端依赖美国供应。但这些武器却是派不上用场的。它们扭曲了经济结构，是以牺牲人民的福祉而购买的，包括教育、大众健康、科技转移方面的经费都受到严重挤压。埃及会买这些武器，实际是出于美国的吩咐，而得益者则是你提到的那些公司。把大量武器卖到中东地区就是把这个地区给军事化。一个闲置而又太庞大的军人阶级于焉形成，他们除了镇压人民以外别无用处——埃及就是这个样子。埃及人看来不愿意选择战争，但又不愿意选择和平。而在以色列，最先进的武器则是拿来对付巴勒斯坦平民用的。

幸而，美国大学校园已经出现了一个运动，要求大学当局疏远一些和以色列进行军火买卖的公司。^[2]这个运动成长惊人，依循的是七〇和八〇年代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模式。以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来说好了。我对这家公司特别感冒，因为以色列用来推倒巴勒斯坦民

[1] See chapter 2, note 36.

[2] See Matthew MacLean, "Students Demand Divestment, This Time Targeting Israe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9, 2002, p. 14.

宅的推土机，就是它生产的。这一类的公司现在都受到鄙视，大家慢慢了解到它们怎样在中东的硝烟中火上加油。中东乱，受惠的当然是美国的企业，但它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因为你买了美国的军火，就会需要零件、训练人员，等等。这方面的需求增加了沙特对美国的义务，让美国可以在那里加派更多的驻军。

· 基督教右翼呢？

罗伯逊（Pat Robertson）、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这些人都公开鼓吹支持以色列，程度夸张到说巴勒斯坦人是凶手，说穆斯林是背教者，是无神论者，是暴力的狂热分子。但如果你看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事情另有蹊跷。我研究过他们，因为我家在耶路撒冷的房子被一个叫“国际基督教大使馆”（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的团体占用。那是一个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团体，主要由美国人组成。事实上，这一类组织背后的动机都是深深反犹的。但他们却支持以色列。为什么呢？他们说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应该大批大批移居那里。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离散世界各地的所有犹太人都回到锡安（Zion）去。

但基督教右翼之所以鼓吹这个，是为了弥赛亚的再临作准备。因为“基督再临”这思想是包含着一场大战的，凡不转皈基督教的犹太人都会在大战中被杀。这样，世界的新时代才会开始。换言之，基督教右翼对以色列不寻常支持的背后是有着深邃的反犹太主义动机的。一等所有犹太人都集中在锡安，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基督教右翼和共和党右翼是一对因利害关系而结合的夫妻。在美国南部和西部，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口视乔治·布什为他们的领袖，其人数约有七千万到八千万。他的政策受到这些人无条件的支持。布什的政策是非常反巴勒斯坦人的，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毫无了解。但共和党右翼的选民却无条件支持他，因为他是他们利益的保障者。共和党右翼在七〇和八〇年

代曾把基督教右翼视为敌人，但现在却反过来，大力支持和资助基督教右翼的宣传和主张。对于这种现象，我第一个想到的形容词是“扭曲”。事情变得怪异可笑。

我们的公民需要更大的觉醒和更多的资讯，成为他们积极的对话者

· 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你的亲密挚友阿马德。他是一九九九年在巴基斯坦过世的。他在一九九八年说过：“本·拉登是将要来临的事情的征兆。”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说：“美国在中东和南亚播下了非常毒的种子。这些种子正在成长。它们有些已经成熟，有些正在成熟。研究一下它们为什么会被播下、成长和收割是很有必要的。飞弹解决不了问题。”^[1] 什么才解决得了问题？

我想这是相当悲观的。美国并不只是像布什或拉姆斯菲尔德这一类个人的集合。不是说把他们换下来，换上一批明事理的人就足以解决事情。这是系统性的问题。是整个视野的问题。我们的公民需要更大的觉醒和更多的资讯，特别是在美国行将进入一个更侵略性的阶段的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让民众对中东问题的症结有更大的认识，让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中东住着的并不是只有基本教义派的穆斯林。

现在每一个阿拉伯大国都出现了人权运动。它们有追求资讯自由的，有追求言论自由的。女权运动也正在蓬勃发展中。过去十年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女性大大增加。即使是像科威特这样的国家，也出现了一股自由化的风潮，奋力与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抗争。它们有反

[1] Ahmad, *Eqbal Ahmad*, p. 135.

对寡头统治的、有反对家族统治的。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现象，成为他们积极的对话者，而不是一方面向他们说教，一方面恨他们。

我不想拿自己当例子，但我是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的。我总是认为这两个世界是可以并存的，因为这两个世界都有相同心灵的人，他们都希望共存，都信赖理性的论证，信赖世俗化而非宗教性的政治，认为军事化和压迫是非常反生产性的，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我却愿意鼓吹和平主义，因为机会有可能转瞬即逝。军队是没有用处的。而当它们派得上用场的时候（像以色列和美国的情况），则只会制造更多的破坏和播下更多不满的种子。我感到不管是在阿拉伯世界或美国，都有很多人是愿意聆听这个讯息的。问题一直是在于，有媒体大敲战鼓和政府顽固不化的情况下，要怎样才能让这些人会面并了解彼此？

我相信民间社会是希望之所寄，因为像教会、大学这些地方都是有相对大的自由讨论空间的。有愈来愈多比我年轻一代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唯一的转变希望。我不认为转变可以来自政变或布什政府所谈的那种改换政权。

第六章

在胜利的集合点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纽约

· 文化在抵抗运动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有一整系列的文化论述现已成了巩固和维系巴勒斯坦人认同感的部分凭依。有巴勒斯坦人的电影，有巴勒斯坦人的戏剧，有巴勒斯坦人的诗歌，有巴勒斯坦人的文学。还有巴勒斯坦人的批判和政治论述。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被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就此而言，我认为文化极端重要。

但文化论述还有另一个面向：它具有分析的力量，可以超越陈腔滥调，可以戳破官方赤裸裸的谎言，可以质疑权威，可以寻找替代方案。这些全都是文化抵抗的军火库的一部分。

· 文化对权力是有威胁性的。一九八二年沙龙率军入侵贝鲁特时，曾特意把那些官方保存的档案文件加以破坏摧毁。二十年后入侵拉姆安拉时，他又把萨卡基尼文化中心（Khalil Sakakini

Cultural Center) 大肆蹂躏了一番。^[1]

你指出的这点确实非常重要。萨卡基尼文化中心是以萨卡基尼(Khalil Sakakeeny)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九四八年以前巴勒斯坦一位极重要的教育家。他凑巧是我父母的朋友,所以儿时我常常看到他来我家。他创办的学校很有名,很多布尔乔亚的民族主义者都在那儿念书。那不是一所英语学校,而是一所民族主义学校。它也是非宗派性的。它教导巴勒斯坦的年轻人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与政治遗产。萨卡基尼本人是基督徒,但他的很多著名学生都是穆斯林。所以他的学校是一个熔铸民族主义意识的重要熔炉。所以,位于拉姆安拉的萨卡基尼文化中心可说是巴勒斯坦民族、知识和文化生活的象征,也因此会成为以色列人的靶子。

二〇〇二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又洗劫了巴勒斯坦的中央统计局。他们搬走所有电脑,破坏硬盘,又带走原属于教育部与卫生部的所有档案。^[2]任何看似档案库的东西都是以色列人除之而后快的,因为它们会为一段湮灭的历史提供物质性的存在。这是每一个帝国主义者都有的愚蠢心态。在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也禁止学校教授阿拉伯文。但人们总是有办法找得到地方(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把口语传统给传承下去。殖民者总是想要去压抑,但民众总是有抵抗的技巧与意志。

在一个大变动和抵抗的时代,诗人试图透过传统找出他或她自己的声音

· 穆罕默德·达维希被认为是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诗人。他

[1] Michael Jansen, "Military Is Deliberately Destroying State Structures Built by Palestinians," *Irish Times*, April 16, 2002, p. 9.

[2] Jansen, "Military Is Deliberately Destroying," p. 9. See also Justin Huggler and Phil Reeves, "What Really Happened When Israeli Forces Went Into Jenin?" *The Independent* (London), April 25, 2002, pp. 4-7.

的重要性何在？

那很复杂。首先，达维希是在以色列长大的。他不像巴解组织大部分成员那样是个巴勒斯坦人。他不是从侨居地回来的。他一直住在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公民。他能说流利的希伯来语，也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他是最早的所谓抵抗诗人之一。换言之，他的诗歌充满民族主义基调，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坚持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是《身份证》（Identity Card），其起句这样说：“记下来！我是个阿拉伯人。”^[1] 这首诗事实上源自他的亲身经历。直到一九六六年为止，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都是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常常需要到什么机关报到、登记。有一次，他以桀骜不驯的语气对负责登记的人说：“记下来，我是个阿拉伯人。”他那首诗的第一句就是这样来的。

达维希在一九七〇年代初离开了以色列，住在埃及，后来又住在贝鲁特和巴黎，成为一个流亡诗人。我深信他是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足以与最近逝世的叙利亚诗人格巴尼（Nizar Qabbani）和尚在写诗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onis）并驾齐驱。他的地位与南亚传统中的费兹（Faiz Ahmed Faiz）多有相似之处。达维希吸引到大量的群众——数以千计——去聆听他朗诵自己的诗歌。

他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虽然跟巴解组织的渊源悠久，但却是个喜欢隐遁的人，很少从事公职。他的品位和视野都相当世界主义。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诗作产量庞大，并发展出另一种风格的诗歌——我称之为沉思与抒情的风格。他的写作题材广泛，从安达鲁西亚（Andalusia）到美洲原住民到他自己的重病，无所不写。他最新的一

[1] Mahmoud Darwish, "Identity Card," in *Splinters of Bone*, trans. B. M. Benani (New York: Greenfield Review Press, 1974), pp. 13-14.

首颂诗 (*qasida*) 是《围困下》 (*Under Siege*)，描写的是二〇〇二年以色列入侵约旦河西岸时的情景。^[1]

他是个有很多向度的诗人。他当然是个大众诗人，但也是个具有强烈个人性和抒情性的诗人。他肯定是个世界级的诗人，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他跟沃尔科特 (*Derek Wolcott*) 和希尼 (*Seamus Heaney*) ——一个是加勒比海人，一个是爱尔兰人——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分上下。他完全不是个宗教诗人，但很多诗歌都受到《古兰经》和《福音书》的语言的影响。影响他的还有洛尔卡 (*Lorca*)、聂鲁达 (*Neruda*) 和叶夫图申科 (*Yevtushenko*)。他在俄罗斯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对那儿的文学传统相当熟悉。有些较新一代的诗人——像布罗茨基 (*Brodsky*) ——他也熟悉。

· 你曾经比较过达维希和早期的叶芝 (*W. B. Yeats*)。

对，因为达维希跟解放斗争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如叶芝曾经为争取爱尔兰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而斗争。叶芝总是跟一些正规的文化团体有关联，像他对阿比剧院 (*Abbey Theatre*) 的参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爱尔兰的参议员。他要比达维希更加是个公众人物，尽管达维希也相当有名。达维希几乎没有担任过公职，唯一例外是任巴勒斯坦民族议会议员那段期间，但那不是什么真正重要的职位。

· 诗与政治论争的界线何在？它们是可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吗？以聂鲁达为例，他是以浪漫诗人和形而上诗人的身份成名的。但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去过西班牙一趟以后，诗风有了激烈

[1] Mahmoud Darwish, "A State of Sieg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afhoum.com/press3/92C10.htm>.

的改变。为了回应批评者，他写了《我作些解释》（I'm Explaining a Few Things）一诗，诗中他假借批评者的口吻发问：

“丁香花在哪里？”又说，“你们会问我：你的诗篇／为什么不诉说梦想、树叶／和你祖国的大火山？”他在诗的结尾处三次重申他的回答：“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吧。”^[1]

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就像聂鲁达一样，以诗来回应处境的要求。这些诗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像图康（Fadalla Tukan）就是非常优秀的女诗人。自一九四八年起，我们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就是高度政治性的，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自我表达被封死了。本来，任何诗人其实都是以某种方式回答其自身所处的政治和历史情势的要求，所以每个诗人都是与政治存在隐含关系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Adorno）说过，哪怕是最私人形式的一种诗歌——也就是抒情诗——都是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但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诗歌却因为某些特别的理由而显得政治味道浓厚——然而这并没有使它们单单成为政治文学。固然，有些政治文学是没有艺术价值的，但美学形式与政治题材之间不必然是冲突的。

在阿拉伯世界又特别是在巴勒斯坦人的例子中，美学与政治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无时不受到压迫和封锁——我们受到军事占领，我们的国家被摧毁，我们自感是一个流亡国家。所以作家就对此作出回应，努力去界定我们的处境。另一个原因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言传统的内在动力有以致之。阿拉伯语是非常强有力的一种语言，也是阿拉伯人文化表达的核心。它是非常紧密地跟真主的语言——也就是《古兰经》的语言——连结在一起的。《古兰经》是 *munzal* 的，换言之是由真主

[1] Pablo Neruda, “Explica Algunas Cosas/I'm Explaining a Few Things,” in *Selected Poems*, ed. Nathaniel Tarn (New York: Delta, 1972), pp. 150-55.

直接启示的。它是真主无中介的话语。所以在一个大变动和抵抗的时代，诗人很自然地会试图透过这个传统找出他或她自己的声音。阿多尼斯在他的诗歌里充分做到这一点，而这也是他的诗为什么那么难懂的原因。他的诗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反知识。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去对抗旧的语言，但他能够成功，又是因为他从《古兰经》的习用语与信仰中汲取资粮。

· 很多美国人对阿拉伯语的所知就只有这个神话：“刀”字有一千个说法。

对，那很荒谬可笑。阿拉伯语被大大歪曲了。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的语言，所以它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用来争论的语言。另外它又被认为是一种暴力性的语言。事实上，任何像我这样懂好几种语言的人都会觉得，阿拉伯语是最美丽的语言之一。它的结构非常对称，非常合逻辑。阿拉伯语具有很亚里士多德式的结构。

· 鲍威尔在联合国演说时，反复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名字念成“所多玛”（Sodom）^[1]，你听了一定会皱眉头。那是怎么回事？即使我们不懂阿拉伯语的人也知道那应该念“萨达姆”（Saddam）。

那是一种傲慢和露骨的藐视表现。我想这一方面是为了把萨达姆给妖魔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显示那种我们熟悉的藐视。伊拉克被当成就是萨达姆这个人本身，不只如此，他的名字——就像你说的——还常常被拼错。他毫无疑问是个糟透了的独裁者，但在世界独裁者的俱

[1] 所多玛是古代巴勒斯坦的一座城市，据《旧约》记载，它因为邪恶与堕落而被上帝摧毁。——译者

乐部里——甚至只是二十世纪独裁者的俱乐部里——他只算小儿科。

· 这样的情形可不只见于鲍威尔一人，年薪数百万的新闻主播也老是说“埃拉克”（伊拉克）、“埃朗”（伊朗）、穆斯林（穆斯林）、“伊兹兰教”（伊斯兰教）。

对，这全是东方学家那一套，以此来把阿拉伯人异类化、距离化、非人化。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阿拉伯人都对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极为憎恶。流行的大众论述对我们阿拉伯人生活的核心部分是那么的无知而又那么的藐视，以致我们不得不把它们视为对我们文化与文明的一种攻击。

· 我们再来谈谈诗的话题。总统夫人劳拉·布什（Laura Bush）原定于二月十二日在白宫举行一场向惠特曼、狄更生和休斯（Langston Hughes）致敬的颂扬会，但后来突然取消，原因是她得知部分受邀的诗人打算要借机表达对攻打伊拉克计划的异议。^[1]

非常明显，要是有任何诗人参加那个颂扬会，就是自取其辱，因为这件事情是白宫想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主子的一个无耻和赤裸裸的表现。这种事情在美国很常见，它想要把诗人的角色中性化，让他们成为一种装饰品，而不是积极参与者。我很高兴劳拉·布什有那个聪明把颂扬会给取消了，而不是请来几个诗人，让他们站在那里，假装惠特曼和狄更生没有说过任何反战的话。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议题被劳拉·布什这次邀请给整个凸显了出来。有些诗人公开表示他们不认为出席颂扬会是正确之举，而我也很高兴整件事情泡了汤。

[1] Tim Rutten, "The Poets Fly Like Doves,"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2, 2003, p. 5: 2.

- 接下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逆向阅读 (counter-readings)。

这反映出这场战争有多么不得人心，又特别反映出，很多人已看出美国正在走进了一个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阶段。政府操在一个小集团的手上。我觉得与其称之为一个政府，不如称之为政权或军事集团，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是在真正的意义下代表人民。民主党并不构成一种替代力量。布什政府由一群好战的新保守主义分子主导，他们都是以色列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之所以铁了心要出兵伊拉克，不是为了什么美国的安全，而是为了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不管会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带来什么伤害。因此，诉诸诗乃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替代方式。

- 纳德 (Ralph Nader) 等人称布什、切尼 (Dick Cheney)、沃尔福威茨、珀尔这帮人为“胆小鹰” (chicken hawks)。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服过役，而他们本来是可能轮得到的。布什七〇年代是有在德州的国民兵服过役，但却开了近一年的小差。^[1] 所以这些人没有打仗经验，现在却又主战，着实可耻。

- 这帮人说他们希望把民主带到中东。

他们这样说，是把民主这个观念给琐碎化。我不认为历史上有过民主可以透过征服和轰炸建立的事例。我纳闷这种错乱的观念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很高兴有那么多反对对伊战争的声浪和示威。但我惊讶它们没

[1] Seattle Times News Service, "Impact of Old DUI Unclear as GOP Charges Dirty Trick," *Seattle Times*, November 4, 2001, p. A1.

有更激烈些，因为这战争不但有损这个国家的利益与福祉，而且彻头彻尾是不道德的。我纳闷布什政府怎么还能继续恶搞到现在。

· 在二月十五日，有多达五十万的人在纽约走上街头。第二天，又有大概二十万人在旧金山游行示威。^[1] 这样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它也许反映出人们的批判意识正在提高，而讽刺的是，这是“九一一”事件的一个后果。美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别人批评美国也许是有道理的，已经开始怀疑那套一贯的说辞：别人恨我们是因为嫉妒我们的民主自由和价值观。别人批评我们老是进行海外干涉，老是炫耀武力，老是想要证明我们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们藐视联合国。我所期望的是，美国人民有朝一日也会明白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以色列）就像美国一样无法无天。布什反复说现在是联合国展现其贯彻对伊拉克决议案的决心的时候了。但我们不禁要问：有多少联合国决议案是美国和以色列不屑一顾的？巴勒斯坦人每日每日被杀，而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也违反了许许多多的联合国决议案。我想，已经有更多人了解到美国政府的虚矫。

· 看来，民意与在位者看法的落差不只见于欧洲，也见于美国。

绝对是如此。到处都是如此。我想除少数例外，在大部分国家，

[1] Peter Ford “Antiwar Movement Awakens over Iraq,”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8, 2003, p. 1; Anastasia Hendrix, Pamela J. Podger, and Steve Rubenstein, “Peaceful S. F. Crowd Protests Stance on Iraq,”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ruary 17, 2003, p. A1.

民众的意愿和人民的所谓“代表”之间都有着巨大落差。我想我们已经走到了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破产的边缘。它在任何地方看来都没有行得通。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显然就是如此。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声称代表人民的政府也不真的是代表人民。

阿拉伯的公众意见常常被（美国媒体）贬称为“街头”（the street）。有趣的是，当罗马有三百万人走上街头和两百万人在英国示威的时候，美国媒体却没有称那些游行者的意见为“街头”。^[1]

我来告诉你一些有关“街头”这个字的事。很多东方学家都喜欢用它。人们都潜意识地把阿拉伯人和“街头”联想在一起，然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流行起“街头阿拉伯人”（street Arab）这个词儿来。它指的是无业游民。很多维多利亚时代作品在提到小贩、乞丐这一类我们称之为“街民”（street people）的人时，都称之为“街头阿拉伯人”。而我想，现在美国媒体之所以喜欢把阿拉伯民意称为“阿拉伯街头”（Arab street）^[2]，是为了暗示持这些意见的人都只是社会上的渣滓，基本上是一群野蛮人和次人（subhuman）。所以，我想“街头”这个字会被用来指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意见，并不是偶然的。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讨论要比美国细致，意见光谱要宽得多。位于卡塔尔的“半岛”（Al-Jazeera）卫星电视网就是一个好例子。阿拉伯世界的非国营电视台比美国的非国营电视台具批判性。正如你指出过的，美国媒体正处于历来最乱七八糟的时刻之一。^[3]在动员

[1] Angelique Chrisafis et al., "Millions Worldwide Rally for Peace," *The Guardian* (London), February 17, 2003, p. 6; Todd Richissin, "Millions March for Peace," *Baltimore Sun*, February 16, 2003, p. A1.

[2] 读者可把这个字理解为“阿拉伯人的街头意见”。——译者

[3] David Barsami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Broadcasting*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1).

战争这件事情上，电视台都自甘充当政府的武器。

· 我们再来谈一谈民主的弱化。当二月十五日有一千万人走上街头的时候，乔治·布什不当一回事地把他们贬称为一个“焦点小组”（focus group）^[1]。如果那是一个“焦点小组”，那一定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对，一定是。我们总统目中无人和我行我素得不可思议。从我读到过有关他的一切都让我有一个印象：他自以为能够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是一神论基本教义派的一个特色。我家族的其中一支就是基本教义派的浸礼宗教徒。这种世界观认为，上帝是会直接对个人说话的，而相信这一套的人会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拒绝接受任何理性的论证。这种思想完全不是伊斯兰教的专利。你可以在犹太教中找到这一套。它也是清教徒和新教徒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我相信它也是天主教传统的一部分。但如果持这种信仰的人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它就会特别可憎和危险。

巴格达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资本

· 讨论伊拉克的时候，一个一贯被抹杀的事实是伊拉克乃是世界上三个最古老的基督教会的家园，它们分别是迦勒底教会（Chaldeans）、亚述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把它们的源头溯至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的出生地是伊拉

[1] “Size of protest-it’s like deciding, well, I’m going to decide policy based upon a focus group,” Bush said. “The role of a leader is to decide policy based upon the security, in this case,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 Quoted in Richard W. Stevenson, “Antiwar Protests Fail to Sway Bush on Plans for Iraq,”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03, p. A1.

克南部的乌尔 (Ur)。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伊拉克乃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整个伊斯兰文明的文化中心。伊拉克的文明是跟几千年前的苏美文明、亚述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一脉相承的。但它如今却被化约为“所多玛”——一如你刚才指出的。不要忘了伊拉克曾是阿拔斯哈里发王朝 (Abbasid caliphate) 的所在地，而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是阿拉伯文明的高峰。伊拉克至今仍是阿拉伯文化的重镇。有一句谚语说，埃及人善于写，黎巴嫩人善于出版，伊拉克人善于读。巴格达显然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资本。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是自然和人文资源最丰富的。它拥有充沛的石油和水源。它拥有一个高度发展的中产和专业阶级，但这个阶级却受到禁运的严重削弱。美国人对伊拉克的文化伟人——伟大的作家、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和科学家——一无所知。这只是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存在着巨大鸿沟的又一证明。

· 伊拉克也是发明书写的地方。

没错。这一点在任何阿拉伯人的意识里都很有分量，又特别是伊拉克行将受到攻击的现在。我想，说阿拉伯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爱萨达姆，这话并没有错。但他们却关心长期受苦难的伊拉克人民，后者承受禁运之苦已有十二年之久，持续为轰炸、营养不良、饥饿、健康恶劣所折腾，得不到学校需要的用具和书本。这一切都是阿拉伯世界感受深切的。布什说：“我们跟伊拉克人民没有龃龉。”但接着就有六千枚巡弋飞弹朝巴格达而去。显然这中间是有矛盾的。^[1]

[1] David E. Sanger, “Bush Tells Critics Hussein Could Strike at Any Tim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6, 2002, p. 1: 22.

“震慑 (Shock and Awe) 攻击”^[1] 只会唤起人们对闪电战 (Blitzkrieg)^[2] 的记忆。^[3]

就是这个目的。就像德累斯登 (Dresden)^[4] 和广岛一样，这攻击被认为可以对伊拉克全民产生震吓和瘫痪意志的效果。

你一向对语言的使用十分注意。语言可以被操纵，用来制造误导。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来自《纽约时报》：“大部分巴勒斯坦人都认为 (consider) 约旦河西岸的屯垦者和士兵是非法占领行为的尖兵。”^[5] 另一个媒体自我设限的例子是这个：“巴格达宣称 (claims)，美国主导的禁运导致了大规模的营养不良和高得异常的婴儿死亡率。”^[6]

现在谈到阿拉伯人的苦难时，“所谓” (alleged)、“宣称” (claimed) 这一类字眼已蔚为流行。说起来令人难过，我自己就亲身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去年秋天，我和一群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与校长会晤，讨论一个卖掉学校一些股票的计划（要卖的是一些与以色列有军事生意来往的公司的股票）。然后我们谈到以色列的践踏人权、轰炸和推倒民宅，建立了一个形同种族隔离的系统。没想到校长的反应却是说，把以色列所做的事跟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相提并论是

[1] “震慑攻击”是指美国在对伊拉克展开地面战前进行的大规模密集飞弹和轰炸攻击。——译者

[2] 利用速度或火力上的优势突然袭击，对敌军造成心理上的震动使之瓦解的战术。这是纳粹德国擅长的战术，以色列亦曾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和其他场合使用之。——译者

[3] Dan Plesch, “Operation Regime Change,” *The Guardian* (London), February 19, 2003, p. 17.

[4] 德累斯登为德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晚期英美曾出动八百架飞机对之进行大规模轰炸，城市几乎全毁。——译者

[5] James Bennet, “Palestinian Subdued and Shot, Yet His Bomb Kills Thre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02, p. A3.

[6] Justin Brown, “Saddam’s Rise Puts Pressure on US Official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21, 2000, p. 1.

不伦不类和令人愤慨的。他又把以色列的践踏人权说成是“所谓的践踏人权”。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因为有关巴勒斯坦的人权报告现在已经是高高一叠了——有来自“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有来自“人权瞭望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有来自“以色列占领区人权资讯中心”（B'Tselem）的，有来自联合国的。所以那是一个共同的策略，那就是把阿拉伯人的诉苦说成是夸大其词，认为不管他们受了多大的苦，都是未经证实的。这现在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也是那个诋毁阿拉伯人和把他们非人化的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另一个策略是宣称巴勒斯坦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一样。说他们对人命的看法跟我们不同。这是始于十八世纪的殖民主义经典论证之一。把被殖民者称为未开化的人，说他们不珍惜土地、不懂得怎样利用土地，因此欧洲殖民者把土地拿走是合情合理的。现在这个国家使用的就是这个论证。它在非洲被使用过。在印度被使用过。而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初期抵达巴勒斯坦的时候，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他们自认为是从原住民那里把土地“救赎”回来，而原住民则被形容为不过是游牧民族。

反犹主义

· 在二〇〇二年，一位相当知名的诗人鲍林（Tom Paulin）应邀到哈佛大学演讲。这个邀请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因为他一向大力批判以色列。^[1]

[1] Claire Sanders, "Harvard Drops Paulin's Talk,"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vember 15, 2002, p. 52. See also Claire Sanders, "Harvard Makes U-turn and Asks Paulin Back,"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vember 22, 2002, p. 48.

那是个复杂的故事，要讲得从头讲起。它可以回溯到今年稍早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疏远运动”（divestment campaign）的回应。他在哈佛的主教堂作了一场演讲（还是讲了一场道？），谈到反犹主义在美国正在复燃。他的主要证据是反对以色列的声浪在全美国逐渐升高。一个疏远运动正在全国的大学蔓延开来（指要求大学当局疏远跟以色列有军火贸易的企业的运动），先是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然后扩延到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伯克利，再蔓延到其他大学。其鼓动者主要是大学教员，使用的是七〇和八〇年代美国大学生抵制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模式。

我们当然要问：批评以色列的行径为什么跟反犹主义扯得上边？但萨默斯就是要这样扯，就是要把批评以色列等同于反犹主义。鲍林受到邀请，是那之后几星期的事。他是个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任教于牛津，是当今英国最有名的四五个诗人之一。他同时也是优秀的文评家，我为哈佛主编的“汇聚”（Convergences）系列丛书中有一本是他的作品。他也是杰出的讲者，常常以评论家的身份上BBC的谈话节目《深夜秀》（*The Late Show*），畅谈电影、音乐、文学和芭蕾舞。所以说他是个极为多才多艺的人，以前就应邀到哈佛主持过年度的格雷（Morris Gray）讲座。但一个叫戈尔贝格（Rita Goldberg）的人——他既不是英语系的人也不是哈佛教员——发现鲍林在一次访谈里说过痛恨以色列的屯垦者，说他们让他想起纳粹党卫军。鲍林更早些还写过一首关于阿尔杜拉（Mohammad Al-Dura）的诗。阿尔杜拉就是那个被以色列士兵射杀、死在父亲臂弯里的小孩。当时的情形恰巧被记者拍到，举世皆知，他如今成为抵抗运动某种象征性的人物。戈尔贝格把这些事告诉了文学院，院方则去征询萨默斯的意见。萨默斯说他尊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却担心鲍林的出现会引起校园不安，所以那邀请就被取消了。我当然愤慨，因为鲍林说的话也许激动，却是对媒体偏颇以色列立场的公允回应。

顺道一说，《纽约时报》几乎每天都会有一篇关于以色列的文章，

而在最后一段，你通常都会读到这样的文字：“今天，又有三个巴勒斯坦人被杀。”我们像只苍蝇一样被杀，没有人跳出来说话。而我想鲍林会说那样的话，是出于对以色列行径的愤慨，而且也没有说错。但他马上就因此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者。

但后来英语系再次开会讨论，决定还是恢复邀请他。所以说整件事情的目的不只是钳制言论自由，还是企图要在批评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之间画上等号，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公正的、操纵性和机会主义的。它反映出，以色列的支持者已经变得多么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另一方面，这事件也反映出，以色列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把任何批评都打压下来，就因为这样，他们才会用势力、影响力和恐吓策略反击，让人们觉得这些人是反犹太主义者。

我还想补充的是，目前校园的气氛因为一个网站的存在而更加翻腾。这网站专门点名那些批评以色列或看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学界人士。^[1] 站长名叫派普斯 (Daniel Pipes)，基本上是个二流、没有教职的学者。他进一步把批评以色列和反美国画上等号。所以批评以色列不只是反犹太主义，还是反美国。有个叫克拉默 (Martin Kramer) 的无耻以色列人用这个网站来攻击任何说话不中他听的人。例如，他把哥伦比亚大学称为“哈德逊的巴尔宰特 (大学)”，理由是那里有两个教员是巴勒斯坦人。^[2] 八千教员中的两个！如果你那儿有两个巴勒斯坦人，就会被当成为恐怖分子的隐匿之所。这种气氛和麦卡锡的时候没有两样。

· 派普斯是一个称为“中东论坛” (Middle East Forum) 的组织主持人。他经常是谈话节目的来宾。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充满

[1] See Tanya Schevitz, "Professors Want Own Names Put on Mideast Blacklis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8, 2002, p. A2.

[2] Martin Kramer, "The Columbia Club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ttp://www.MartinKramer.org>, November 5, 2002.

反讽。因为首先，阿拉伯人就是闪族的一支（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一词的原意是“反闪族主义”，而闪族〔Semites〕一词在近代兼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这个词现在从来不会用来形容那些攻击阿拉伯人的人。我想我们应该首开风气，把那些攻击阿拉伯人的言论称为“反犹太主义”。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反犹太主义是同时指反犹太人和反阿拉伯人的行径。

· 这触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明显是仇恨犹太人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过一段反犹太主义的恐怖历史——欧洲和基督教的反犹太主义尤其要命。在欧洲，这种反犹太主义以纳粹大屠杀为其高峰。任何否认有过反犹太主义或纳粹大屠杀这回事的态度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允许任何民族的苦难史被篡改、被否认。另一方面，承认犹太人受过压迫绝不代表他们可以以此为口实，来压迫另一个民族。我们必须搞清楚，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受过多少苦是一回事，以色列有没有权利军事占领巴勒斯坦又是另一回事。别忘了，以色列所做的是以犹太民族的名义去做的，而不是以中国人或其他民族的名义。所以，犹太人与以色列和以色列行为的关联是由以色列自己提出的。

记得有一次在约旦河西岸拍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以色列人用推土机破坏属于阿拉伯人的农田。我问那些以色列人：“你们怎能做这样的事？这些土地是属于这些人的，他们在这里务农已经很多代。”他回答说：“那不是他们的土地。那是以色列人民的土地。”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你们怎么能用‘以色列人民’这样的口实来压迫别的人民，怎能单单因为犹太人在欧洲受过苦，就希冀所有人听你们支

使。你们不能拿这一套来这里掠夺另一群人。”

我们必须对什么才是反犹主义严加鉴别。我认为必须把目前中东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普遍反感区分于欧洲过去的反犹主义，和目前出现于奥地利和法国这些国家的新形态反犹主义。后者是货真价实的反犹主义，因为他们恨的是犹太人本身，非关其他。但中东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反感却跟犹太人本身无关，而跟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有关。它们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欧洲的反犹主义是神学性的。它奠基于基督教的神学。欧洲人因为犹太人是害死基督的元凶，所以不信任和讨厌犹太人。例如天主教对犹太人的谴责就有很悠久的历史。这样的态度完全不存在于伊斯兰教，因为在伊斯兰教，犹太人被认为是“《古兰经》之民”（people of the book）^[1]。无疑，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之类的国家，确实有人想从欧洲引进《犹太人贤士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2]之类的小册子，制造风浪。但那是相当不寻常的，其根源相当有别于欧洲的古典反犹主义。

· 苦难要怎样量度或比较？

比较苦难是无聊和令人反感的。“发生在今天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就是昔日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事”这话全不是真的。犹太人经历的苦难极为可怕，是史无前例的。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来使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残暴压迫合理化的理由。比较是无关宏旨的。重要的是指出两者都是不能接受的暴行。

[1] 伊斯兰教是各大宗教中唯一在圣典里要求信徒宽容其他宗教的，认为其他宗教的信徒皆为“《古兰经》之民”。——译者

[2] 《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是十九世纪俄国秘密警察为诬告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而杜撰的文件，是反犹主义所依据的重要文件，曾被纳粹党作为反犹太的圣典。——译者

David Barsami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Broadcasting*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1).

· 因为我是亚美尼亚人，所以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

有一次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演讲，一个亚美尼亚人问我：“你会不会拿亚美尼亚人遭到的集体屠杀来跟犹太人或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比较？”我回答说为什么要费这个事呢？它们全都是恐怖的历史经验。它们之间显然有些共通特征。有很多人被杀，无辜受苦。但重点是它们都是不能接受的，不应该让类似的事继续发生。

· 我记得二〇〇二年过世的作家兼诗人乔丹（June Jordan）提过，不应该把苦难量化。

对。不应该比较苦难，比较就是一种量化。美国黑人受过多少苦难？我近期演讲强调的其中一点就是，这个国家里面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苦难，却没有人愿意承认。我不相信苦难是有起讫可言的。换言之，你不能说苦难开始于哪一个时候、结束于哪一个时候。它是会持续下去的。它会烙印在受苦难的民族的意识里，而不管那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没人有资格说：“我们谈苦难谈得够多的了。换个话题吧。”很多人现在谈到奴隶制度、纳粹大屠杀和亚美尼亚集体屠杀时，都持这种态度。事实上，那种加诸于一个民族生活上的扭曲，即使事隔几代以后仍然会是个阴影。它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很难去给它定个起点、中间点和终点。

记忆是一种保存身份认同感的有力集体工具

· 亚美尼亚人在一九一五年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第一起集体屠杀。金泽尔（Stephen Kinzer）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亚美尼亚人永远不忘记。也许他们应该忘掉》（Armenia Never

Forgets. Maybe It Should.)。^[1] 这篇东西的基本主题就是奉劝亚美尼亚人“把事情忘掉”。它没有引起反弹或评论。要是金泽尔敢劝犹太人忘掉过去，事情可没完没了。

我碰到过一次相当类似的事。那是一九八八年。勒纳 (Michael Lerner) 在纽约办了一个《复兴杂志》 (*Tikkun*) 的会议，我和朋友阿布鲁浩德 (Ibrahim Abu-Lughod) 同属一个座谈小组，在座的还有沃尔泽。谈到一个火爆处，沃尔泽说：“你们将要建国了，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事是不要再去想过去。你们会有你们的国家，而我们会有我们的，事情应该到此落幕。”这时候，一个叫希尔达·西尔弗施泰因 (Hilda Silverstein) 的女听众怒冲冲站了起来，说了一番我永生难忘的话：“你凭什么叫巴勒斯坦人不应该再提起过去？你和我所属于的那个民族不是老在提醒世界我们受过多少苦难、要求世人永不忘怀的吗？你凭什么要求巴勒斯坦人忘记？”什么时候该记着、什么时候该遗忘，是一件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事情。今天有些犹太人——不管这里的还是以以色列的——喜欢对巴勒斯坦人这样说：“不要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了，开始怪罪你们自己吧。”我觉得这简直是秽亵。遗憾的是，有相当数目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也是这种调子。“别再谈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罪恶了。我们的伤口是我们自造的，让我们开始反省这个吧。”阿贾米和马基亚 (Kanan Makiya) 之流就是这个样子。那是一种深深的自卑自贱，我感到深恶痛绝。它完全呼应了那个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人应该为他们所受的罪负责。假如帝国主义没有出现过就怎样，假如集体屠杀没发生过就怎样，假如种族清洗没发生过就怎样——这一类的话令我发指。

·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在他的小说《笑忘

[1] Stephen Kinzer, "Armenia Never Forgets. Maybe It Should,"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1998, p. 4: 16.

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里说：“人反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1]

我现在的演讲总会强调记忆对巴勒斯坦人的重要性。我们没有组织性的记忆，因为我们没有国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尽管如此，几乎每一户巴勒斯坦人家（哪怕他们已是一九四八年以来的第三代）都仍然会保存着祖屋的钥匙、旧信、旧契约、老照片、旧剪报——这些都是我们的生存相对整全的时代的遗物，而保存它们，就是为了保存那个时代的记忆。记忆是一种保存身份认同感的有力集体工具。它不只可以通过官方论述和书本来保存，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记忆来保存。那是抵抗历史被擦拭的一座要塞，是抵抗的一种方法。

巴勒斯坦口语的字尾变化仍然保存在一九四八年迄今的第三第四代巴勒斯坦人口语里。我儿子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在纽约长大的，但最后还是学会了巴勒斯坦语。你听他讲巴勒斯坦语的时候，会听得到他祖父的腔调。他显然是从我跟别的巴勒斯坦人讲话时学来的。所以，语言确实是铭刻记忆的一块大书板，应该加以激活化和利用。它可以把过去带进现在再带往未来，让它不致消失，不致被扔到记忆洞(memory hole)^[2]里。

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说故事，图解般说出苦难的性质

· 你常常在文学作品里挖掘可以支持你对记忆的这个观点。

[1] Milan Kundera,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trans. Aaron Asher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9), p. 3.

[2] 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里一种奇想的洞孔，供人丢弃“不应该”保留的纸张文件，是极权政府钳制人民思想的一种设施。一栋办公大楼里会有成千上万这种洞孔，纸张丢进去后，会有一股气流把它卷到大楼底部的大熔炉去。——译者

你讨论过的一篇小说是博尔赫斯 (Borges) 的《丰代斯, 他的记忆》 (Funes, His Memory)。^[1] 另一篇你提到的小说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In the Penal Colony)。^[2]

我在那篇文章中想要谈的是某些在美国甚至在欧洲都完全不被欣赏的东西。我谈卡夫卡, 是为了说明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达到多么细密的程度。你要怎样才能设计一部可以从日到夜折磨人, 好让他们失去生之意愿、失去集体意志的机器呢? 这就是卡夫卡要揭发的。巴勒斯坦人生活中的每一部分——从上学到上班到上菜市场——都受到以色列军队的规限。你得先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检查站。哪怕是需就医, 哪怕是病情紧急, 你仍然得排几小时的队接受检查。人们往往就这样死掉。学校经常关闭。单是约旦河西岸就有几百个检查站。加沙地带形同一座硕大的监狱。它三面都被通电的铁丝网完全包围起来 (第四面是海)。轰炸、推倒民宅、摧毁农田、拘禁年轻人——以色列用尽一切方法来羞辱和惩罚巴勒斯坦人。

在那篇小说中, 卡夫卡显示出一部狂想的酷刑机器——它可以用针在人的全身上刺满文字图案, 让人生不如死——到头来怎样反噬它的操作者和发明者。我想同样的事情正在以色列上演。以色列军队习惯于羞辱巴勒斯坦人, 但这种行径对以色列人的伤害或许还比对巴勒斯坦人大, 因为它反而刺激起巴勒斯坦人排除万难生存下去、抵抗到底的意志。

· 你刚才提到记忆洞, 而那当然会让人联想起奥威尔 (George

[1] Jorge Luis Borges, "Funes, His Memory," in *Collected Fictions*, trans. Andrew Hurley (New York: Penguin, 1999), pp. 131 - 370. See also "Unresolved Geographies, Embattled Landscapes," lecture by Edward W. Said, Hampshire College, Amherst, MA, September 17, 1999. Text available from Alternative Radio.

[2] Franz Kafka, "In The Penal Colony," in *The Complete Stories* (New York: Schocken, 1995), pp. 67 - 140. See also Edward W. Said, "Punishment by Detail," *Al-Ahram Weekly*, August 8 - 14, 2002.

Orwell)。在《流亡的反思》一书中，你有一篇谈奥威尔的文章，题目是《狗中间的观光》(Tourism among the Dogs)^[1]。

奥威尔的情况很复杂。他是个很有天分的观察者，对一些苦难深重的人们的处境观察入微，像他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对矿工的描写就是个好例子。^[2]他是头一批详细描写帝国主义有多么不人道的作家之一。不过，他同时也是个与自己的观察对象保持疏离的人。除《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以外^[3]，我们没看到奥威尔投身过任何政治运动。他晚期得了多疑症，对周遭的人产生一种仇恨的情绪，认为他们其中一些是“相公”或“赤共分子”。他的作品包含着一种极端不讨喜的组合：一方面是对不义的强烈仇视，一方面是对人的憎恶。奥威尔也是个亲英派。在他看来，世界的中心是英国。他对印度人或黑人或犹太人都没什么好感。他其实是个反犹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相当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 英国是他的世界中心，但与此同时他又批判帝国的运作。他写过他的缅甸经验。他在那儿当警察，目击过一次绞刑。^[4]

对，他是揭发了不义，但在我看来却是以一种很有局限性的方式揭发。我不认为你读奥威尔的作品会感觉得到他有追求人类解放的意愿。他做的事，是揭发攻击多于为人们指出新希望之所寄。他是那种从不会想要与草根性运动有瓜葛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是某种政治事业的

[1] Edward W. Said, "Tourism Among the Dogs," 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3-97.

[2] George Orwell, *The Road to Wigan Pier* (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73).

[3] George Orwell, *Homage to Catalonia* (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87).

[4] George Orwell, "A Hanging," in *Essays*, ed. John Carey (New York: Knopf/Everyman's Library, 1996), pp. 16-20.

一部分。他有一种孤立心态，甚至对他人有一种仇恨的情绪。这种情绪活脱脱表现在《一九八四》，书中每一个角色都是主角潜在的敌人。^[1]

· 这小说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出版于一九四九年。最近，因为布什政府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和宣示一个永久战争纪元的到来，使这本书常常被人提起。

我想你说得没错，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永久战争的纪元。但我不认为奥威尔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他的远景是荒凉和狭窄的。我不认为他对希望、解放、批判性参与和人与人之间的携手并肩有什么信仰。人类进步的观念在他的远景里是非常陌生的。

· 你提到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是奥威尔对西班牙内战的报导。它让我想起德国空军在一九三七年对巴斯克城镇格尔尼卡（Guernica）的轰炸。毕加索以此为题材画了名画《格尔尼卡》。在联合国总部的入口处，原挂着一幅此画的复制品。讽刺的是，它现在被盖了起来。显然，联合国是不想让那些大谈要摧毁伊拉克的美国官员看到画中的断头残肢时难堪。

把这幅画盖起来，原是不想让要到安理会演说的鲍威尔难堪。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任何会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死伤或恐怖的东西都应该移除。一切都应该先经过卫生处理，让它们变成 CNN 式的报导，也就是说，把战争变成一种电子画面而非活生生的画面。你会看到的只是一些威风凛凛的武器，它们让战争的恐怖显得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我想这是一种安抚大众的方法，让他们觉得，打仗是无妨的，因

[1]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Knopf, 1992).

为它不会带给我们和别人太多死伤。

· 如果这种死伤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就轻描淡写称之为“附属毁坏”（collateral damage）。

你甚至不一定会看得到那画面。

· “说故事人”一词的阿拉伯文作 *hakawati*。就你多年来在美国述说巴勒斯坦人的故事而言，你就是一个 *hakawati*。我看到你不断为这个故事引入新的音符组合、新的和弦结构和新的排列组合。

让我惊讶的是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总是讲不完，是它竟然会经历那么多的转折。事实上，那不是个有组织性的故事，因为我们乃是一群无国之民和放逐之人。所以，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把这故事讲出去，尽可能持续地讲，并以尽可能有说服力的方式去讲它。理由无他，只因为它是个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故事，而这是我们一直害怕的。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就是透过说故事，图解般说出这起苦难的性质，提醒每一个人，我们正在谈的是人。我们谈的并不是抽象的东西。

· 哥大在二〇〇三年一月底办了一个电影节，名为“一个国家的梦想”（*Dreams of a Nation*）。其中一部电影是苏雷曼（*Elia Suleiman*）的《交叉命运》（*Divine Intervention*）。电影节的介绍单里称他为“当代电影最杰出的作者/演员/导演之一”^[1]。电影可以作为一种武器吗？它可以是推进政治诉求的工具吗？

[1] *Divine Intervention*, dir. Elia Suleiman (New York: Avatar Films, 2002).

绝对可以。电影节是我的伊朗裔同事达巴希 (Hamid Dabashi) 策划的，他是中东语文系的人。展出的电影大约七十部。特别令人动容的是每一场都座无虚席，很多人都进不了场。

苏雷曼的电影之所以不寻常，之所以理当引起注意，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战斗性、宣传性的——就这个字的严格意义来说。相反地，它们是很委婉、很讽刺性的，风格跟巴斯特·基顿 (Buster Keaton) 或雅克·塔蒂 (Jacques Tati) 的作品相当相似。有一些涉及以色列部队和巴勒斯坦人的长长段落是无声和搞笑的。在电影里，对占领经验的描写是带着幽默感的，不是直接把它呈现为一种苦难。我想，这电影引人注目之处乃是它那种刻意的漫不经心。

· 《交叉命运》曾经提交给美国电影学会角逐奥斯卡奖项。
后来怎样了？

它本来是要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但却被电影学会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国家。^[1]这种事稀松寻常。达维希那首谈身份证的诗早已触及这个主题。很多巴勒斯坦人身份证的国籍栏被填写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未定”。这就是巴勒斯坦人今天的地位。每个人都知道巴勒斯坦的存在，但有些人却拒绝承认它，只愿意称之为“未定”。

· 在今日的媒体，你看到的是对帝国主义、对战争的公开拥抱，是对美国力量的投射的欢欣鼓舞。

伊格纳蒂夫、布特 (Max Boot) 和威尔 (George Will) 这些人只是

[1] Stuart Klawans, "The Eastern Front: Films of the Present Conflict," *Nation*, February 10, 2003, p. 34.

其他人思想的装点者。他们是帝国的辩护士。他们不是帝国政策的制定者，但他们却会给帝国的政策加固。他们会粉饰它，给它一种知识的外装。但他们无一不是原创性的思想家。他们是系统的产物，被系统用来为打着美国价值观旗号的赤裸裸侵略提供包装。诚如康拉德 (Joseph Conrad)^[1] 所说的：“如果你深入看，就会发现……征服土地并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它包含着把鼻子比我们扁和皮肤比我们黑的人的土地给抢走。^[2]

· 在康拉德的时代，帝国主义的借口是开化原始人，又把这种使命称为“白人的负担”。今天的说辞则换成“打击恐怖主义”。

对，就是所谓的“打击恐怖主义”或“为民主而战”。布什说他准备做的事是为善而打击恶，是要把民主价值观、美国价值观散播给全世界。每个帝国都会做两件事：一是说自己跟从前的帝国都不同，一是不会用“摧毁”之类的字眼说话，而是反过来。换言之，它会说它的目的是要把文明与启蒙、和平与进步带给其他人。虽然帝国的辩护士都不会明说，但在他们心里，被征服者都是次等人。所以，征服他们只是把所有美好的事物带给他们。康拉德的时代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

一个追求自由、启蒙与解放的人汇聚之所在

· 今天帝国主义者胆子会那么大的原因何在？

[1] 康拉德：英国小说家，《黑暗之心》的作者。——译者

[2]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New York: Penguin, 1999), p. 31.

其中一个理由是缺乏有力和有组织性和持续动员的反制力量。我不会说那是因为苏联的解体。我认为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失败有以致之。知识分子之间都太爱搞小圈圈了，为定义和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而忽略罔顾了最重要的目标：赛泽尔所说的“胜利的集合点”（the rendezvous of victory），也就是一个追求自由、启蒙与解放的人汇聚之所在。导致这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其中，美国的实用主义和语言分析，以至于法国的解构主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阶层都对启蒙和解放的大叙事背过身去。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告诉我们，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另一个关键理由是代议民主的失败。在美国或英国这一类两党制国家，在野党只是游戏的一个玩家，而不是扮演对立面的角色。对立面的观念已经从正规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现在它寄寓在别的地方：大学、教会、工运等等。我想那是一个集体的奋斗。我不认为那可以透过一些明星级的知识分子或在上位的人可以达至，应该是刚好相反。

· 弗里德曼在二月十三日的《查理·罗斯秀》里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伊拉克是个“很少美国人了解些什么的国家”。^[2]罗斯没说什么，马上就把话题带到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弗里德曼的话相当有启发性。

是很有启发性，比他把话说破还有启发性。我想他要说的是美国正准备向一个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发动战争。

[1]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译者

[2] Thomas Friedman, “Thomas Friedman on Iraq and the UN,” interview by Charlie Roes, PBS, *The Charlie Rose Show*, February 13, 2003. Online at <http://www.charlierose.com/archives/archive.shtm>.

与其透过调和来理解音乐，不如透过不调和

· 看看我能不能在音乐里找出若干类比，因为音乐之于你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认为商业媒体乃至教育系统是不是已经让很多美国人变成音盲，无法分辨不同的音符？

对，人们的分析力被麻痹和迟钝化了。其结果就是，你会马上就接受容易懂的东西。你忘了一切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 普鲁塔克 (Plutarch)^[1] 说过，想要在音乐中创造和谐，一个人得先要研究不和谐。

阿多诺甚至说过，与其透过调和 (consonance) 来理解音乐，不如透过不调和。我认为这有几分道理。音乐的妙处在于调和与不调和之间的平衡度，其中更大的分量应该是放在不调和与不和谐的一边，而不是反过来。

我努力生活在差异中

· 我知道你不喜欢谈自己，但还是想问一下，萨义德的身份为你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你知道自己是被注视的，知道你的一言一行都被盯着看。你觉不觉得累？你会不会宁愿弹弹钢琴或看一场精彩的网球赛？

[1] 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典作家之一。——译者

很少。我通常都忙得和累得没心思想这种事。多年以前我就学会不去多管别人怎么看我。我每天都得花很大的劲才能把一天的事做完，得病以后更是如此。我接受治疗迄今已有九年。虽然身体衰弱和得面对很多很多的危机，但我还是竭尽所能，把工作持续下去。所以，我必须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上，别人怎样看我在我的优先顺序表中位置并不是很高。

· 你在回忆录《格格不入》里写道：“我偶尔会感觉自己像一束不同水流的集合……我的生活充满不调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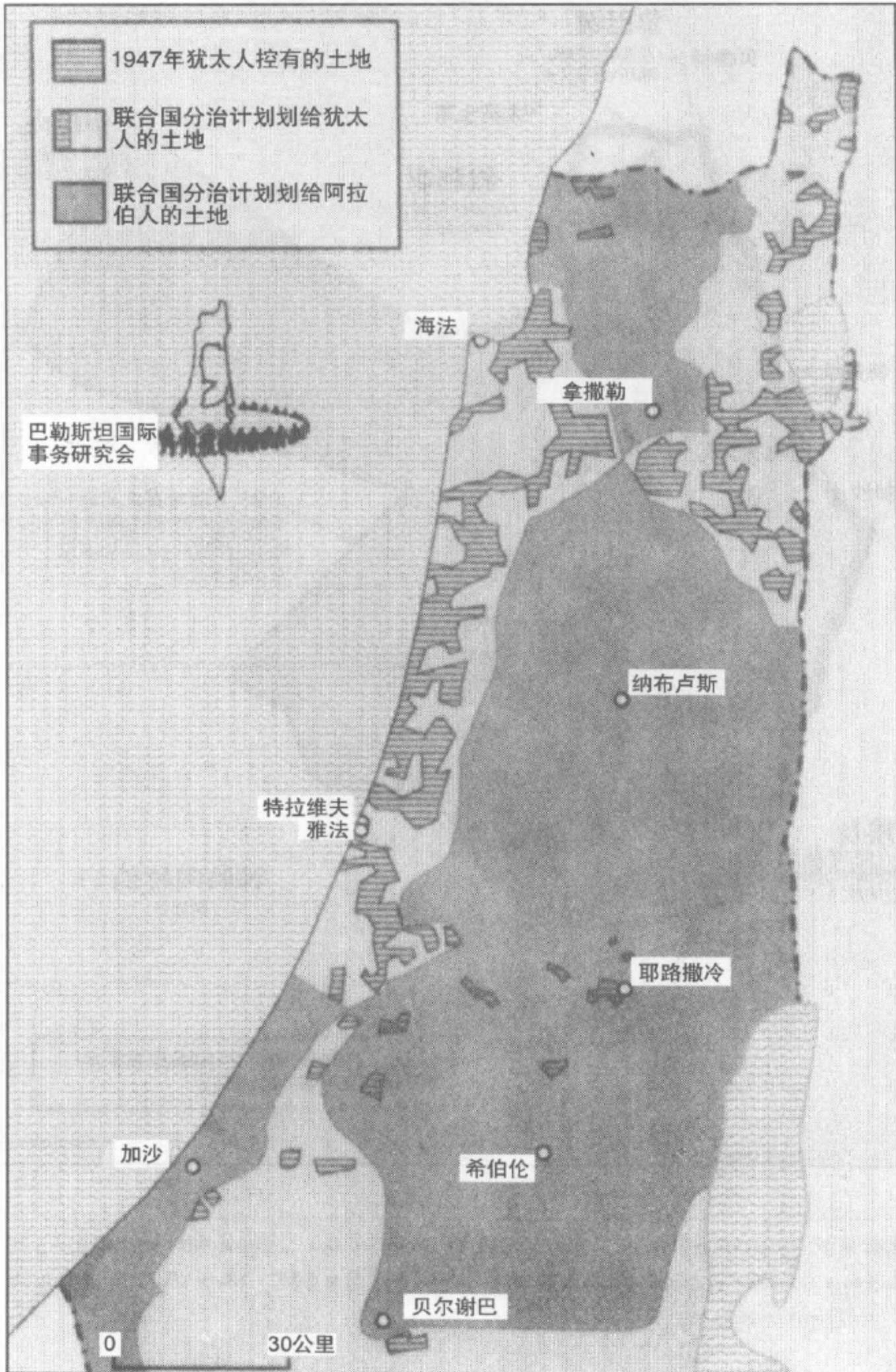
我不认为我是个一贯、单一的人。我是由很多不同的东西组成的。我也没有企图在它们之间取得平衡。我不认为自己有需要补缀一切的差异。我努力生活在差异中。

· 我在很多次访谈中都问及你的健康，而你总是说：“我得挺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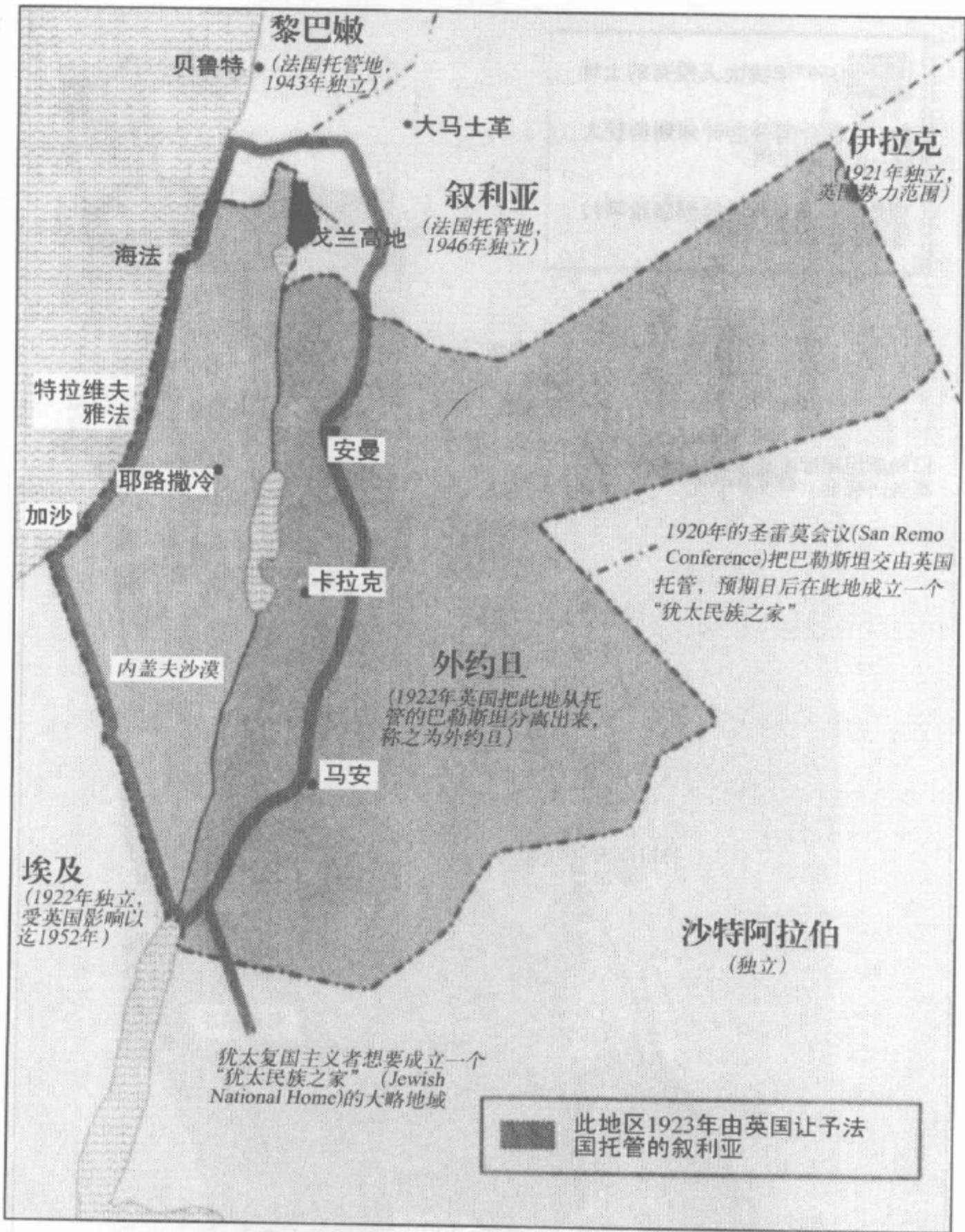
相当程度是这样。我能活到现在，我的医生居功厥伟。没有他，我大概四或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他是个有独创性的人，是个优秀的医生、杰出的科学家。我身上的疾病是阴险残忍的，但他在疗法上的创意激起我继续奋战的意志。我必须说，我享受生命。我爱我周遭的人。我爱教学。从跟我互动的学生身上，我吸取到巨大的能量——但因为我已经缩减了教学工作，所以这方面的能量也减少了。然而，能够身为学术界的一员，能够身为追求解放与体谅的政治积极团体的一员，那种感觉还是让人很振奋。事实上，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事情比我做过的那些是我更喜欢做的。

[1] Edward W. Said, *Out of Place: A Memoi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p.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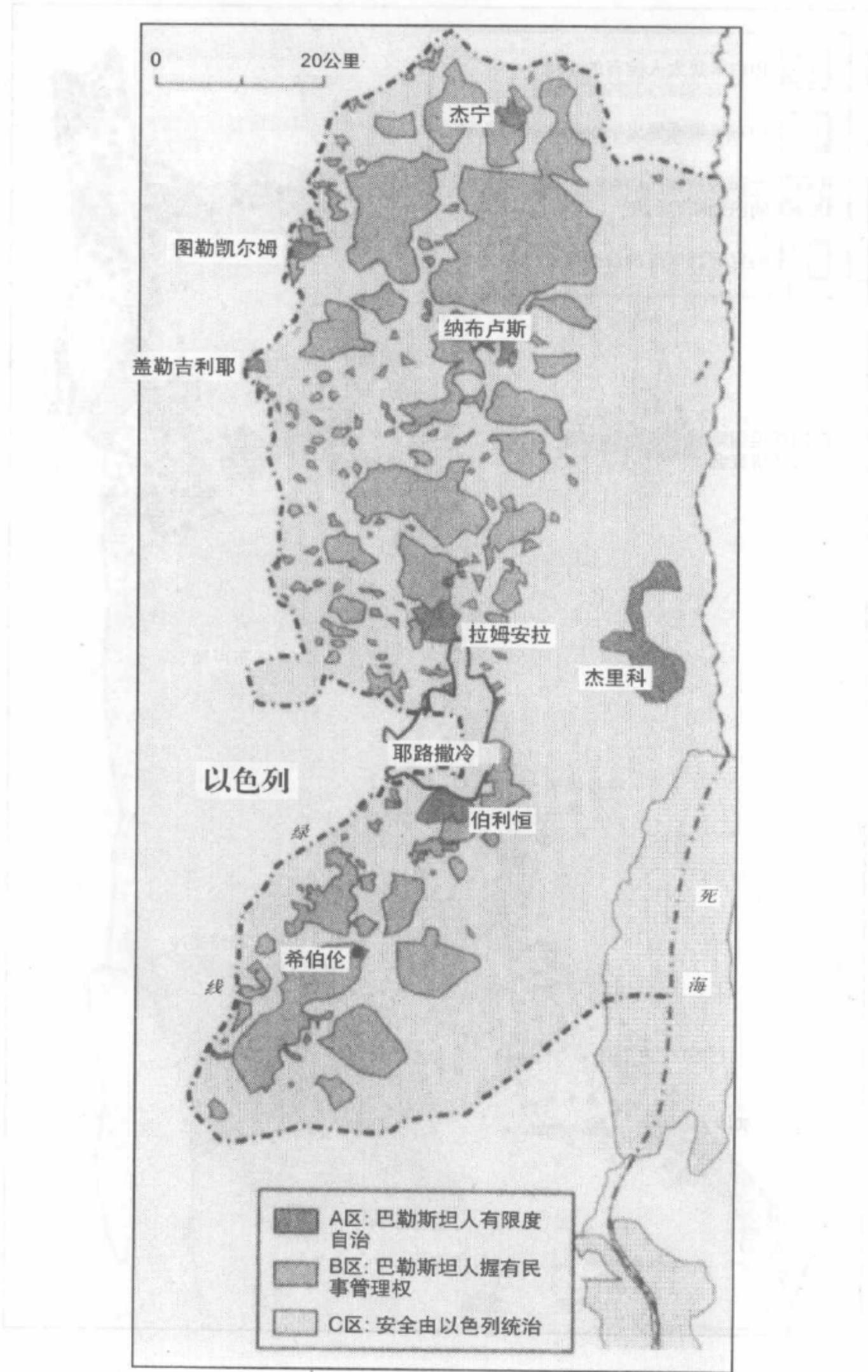
1947年巴勒斯坦土地的控有状况和联合国的分治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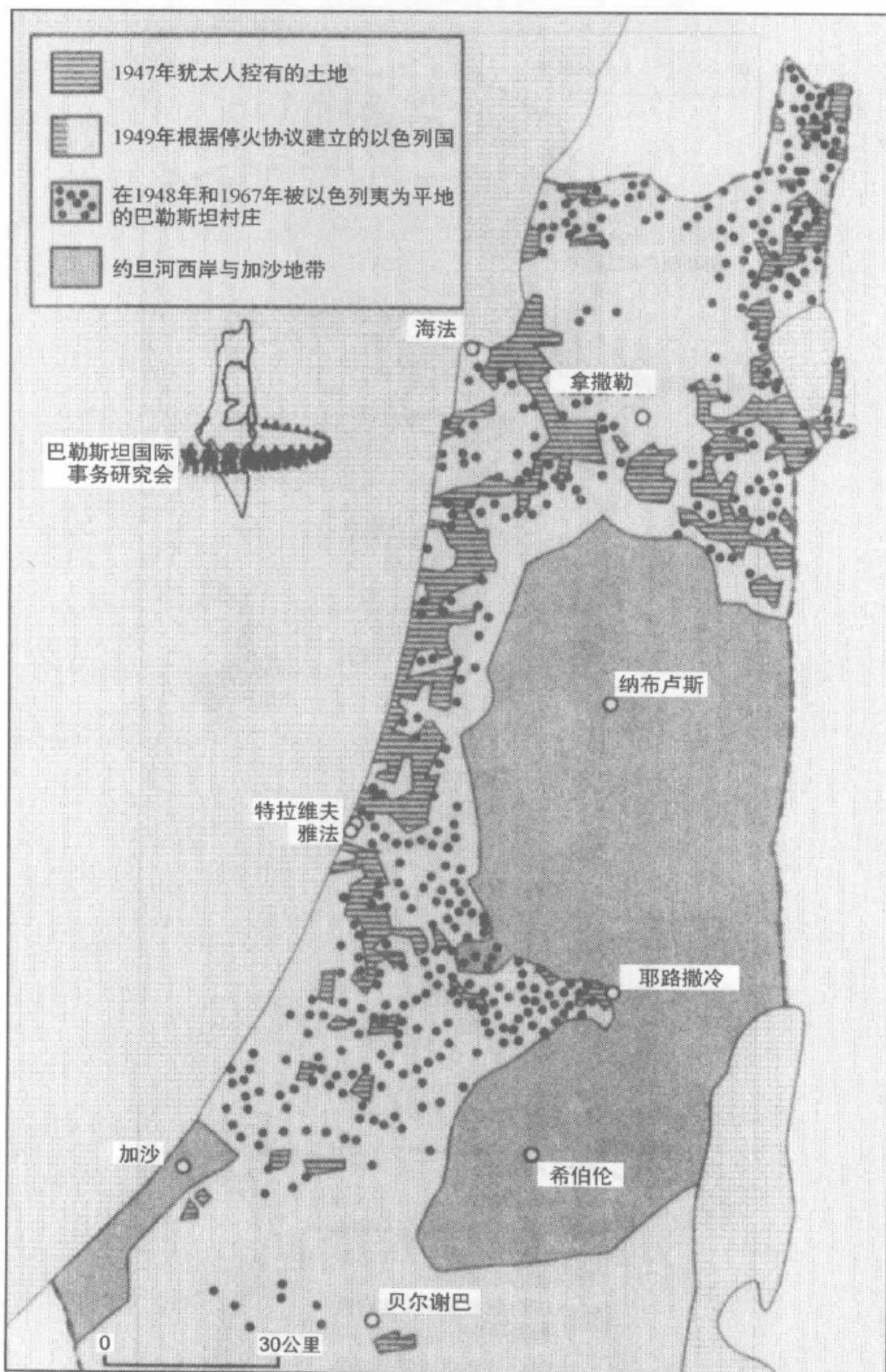
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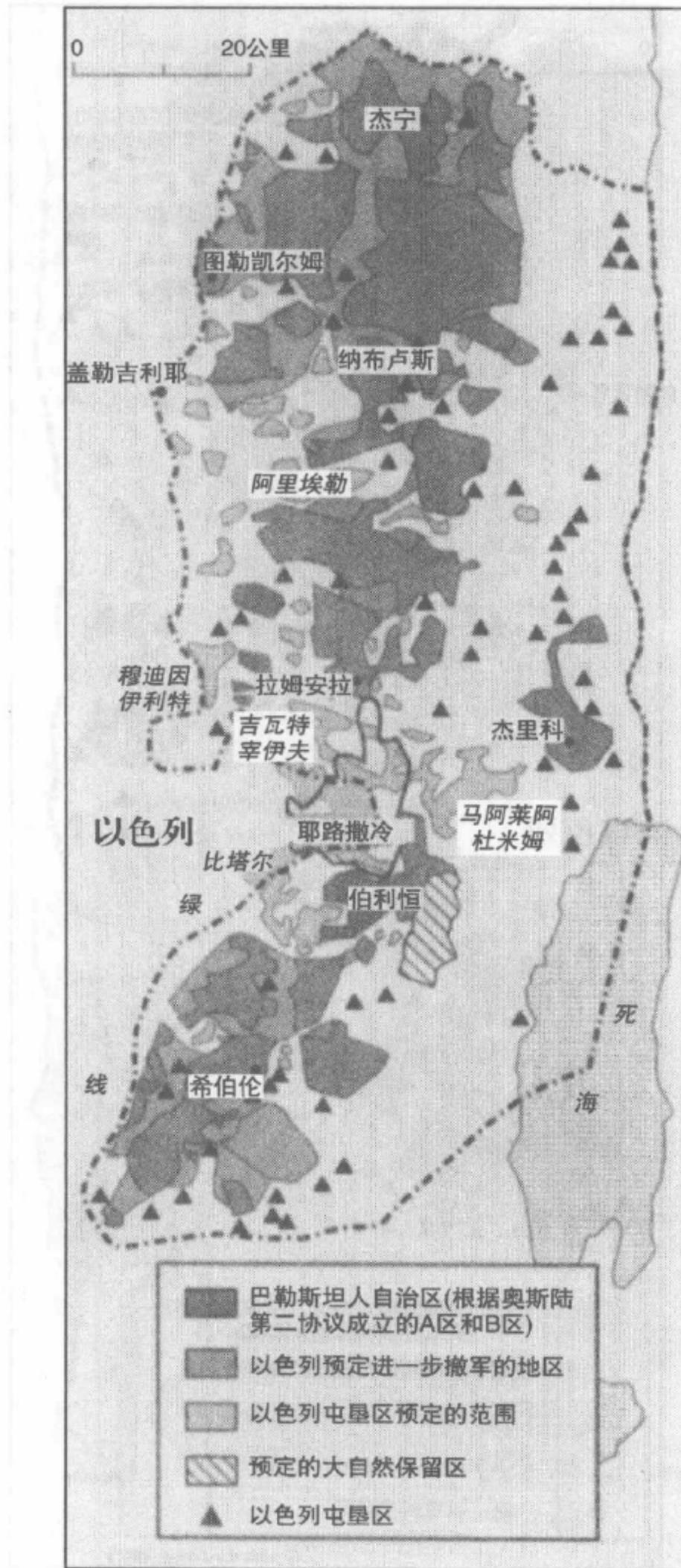
过渡协议（奥斯陆第二协议），1995年9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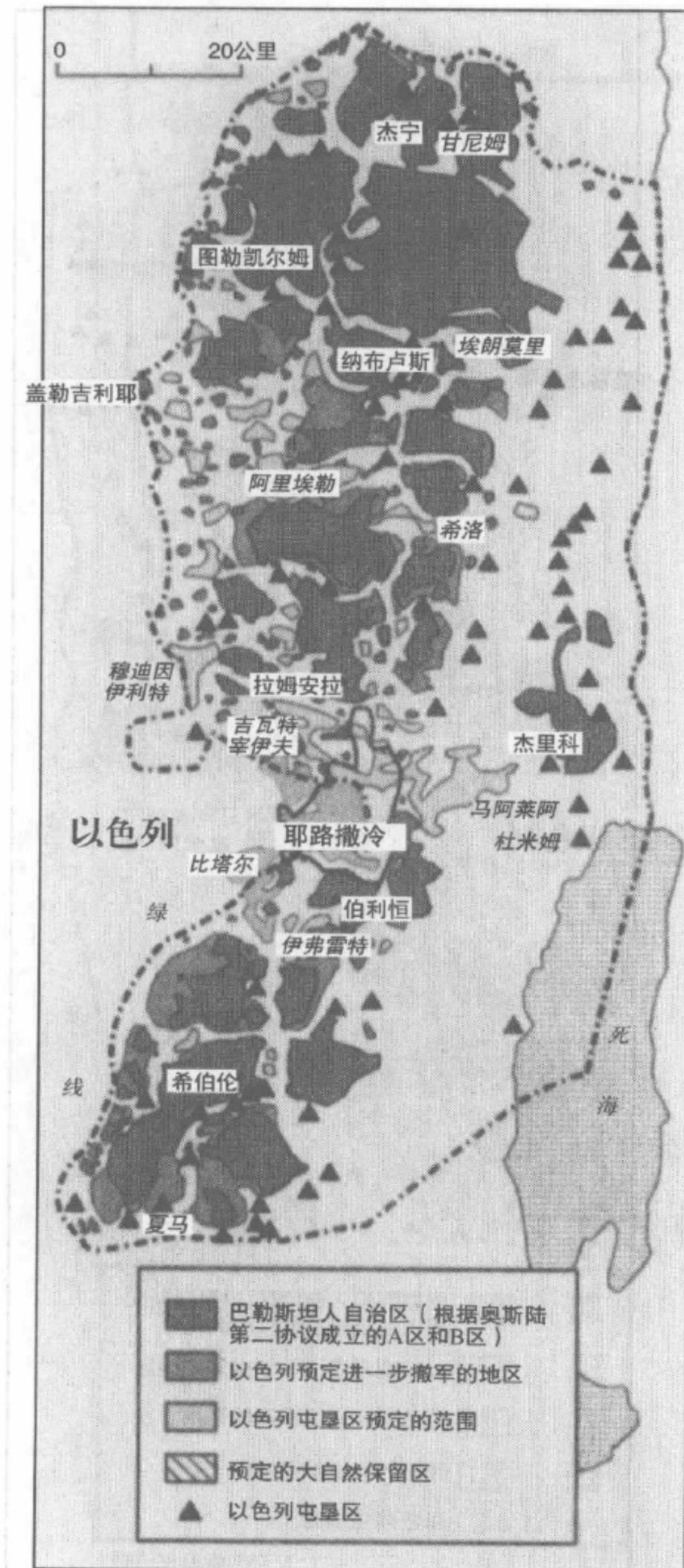
在1948年被以色列夷为平地的巴勒斯坦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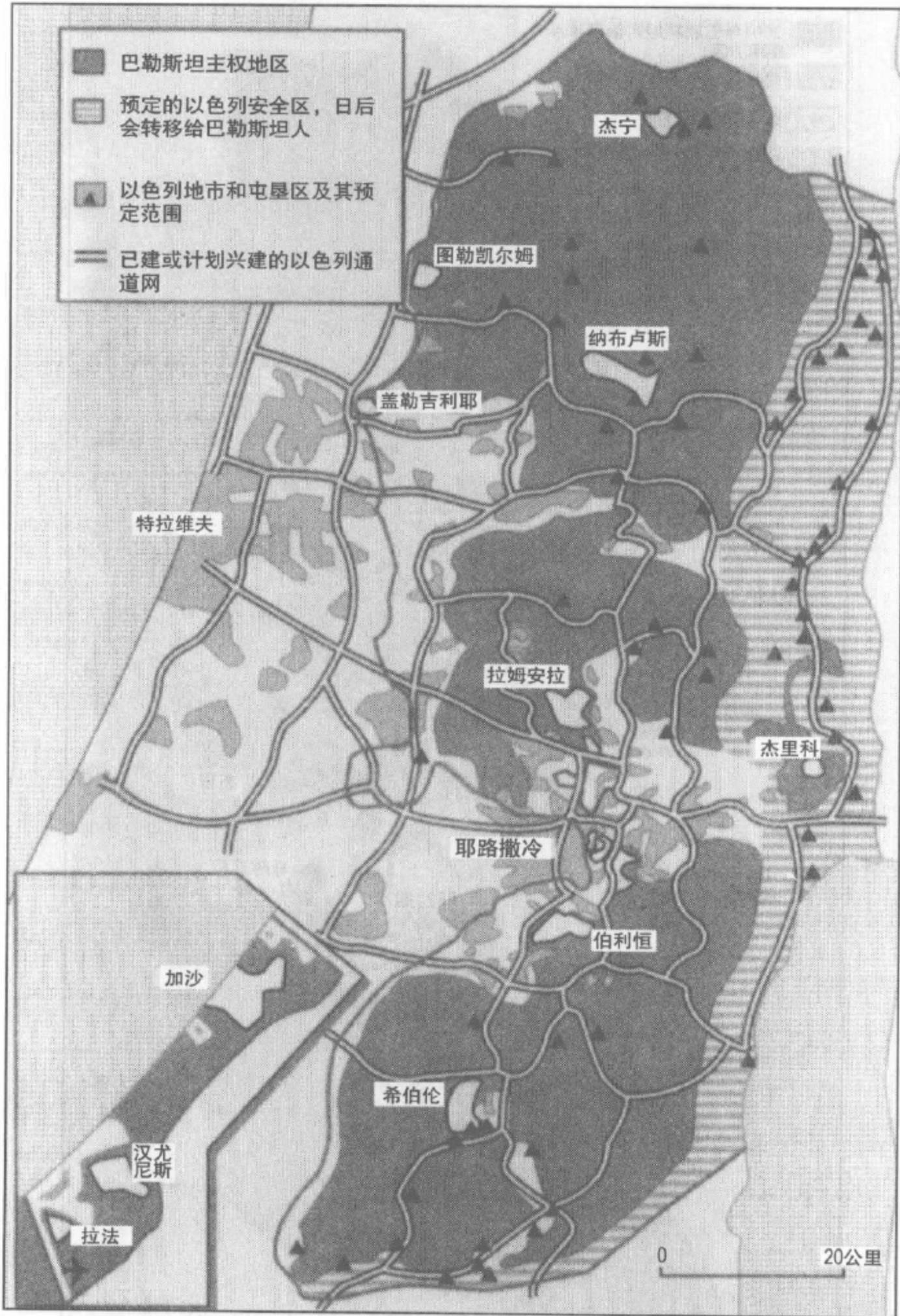
日本怀伊备忘录(Wye River Memorandum), 1998年10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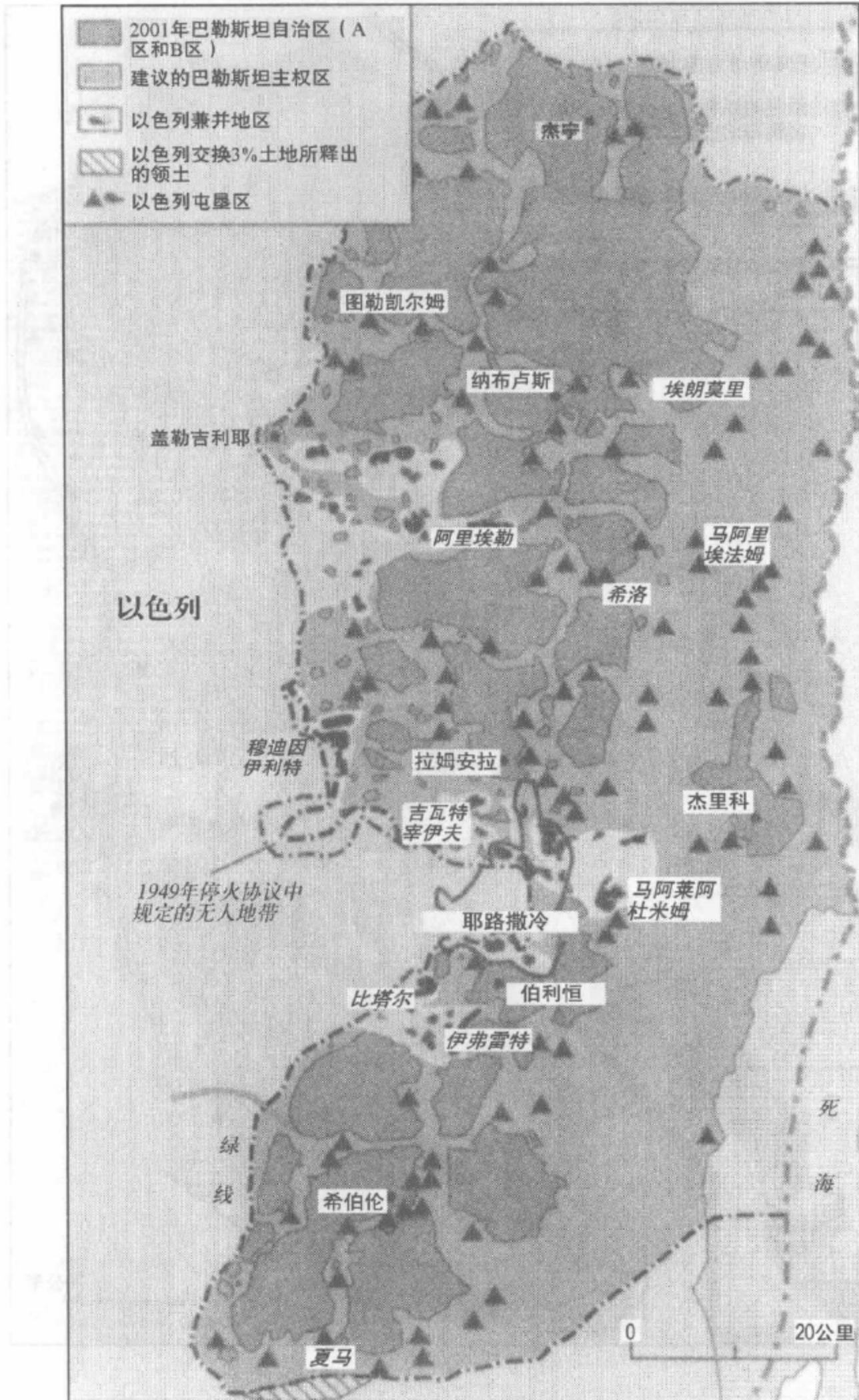
沙姆沙伊赫协议(Sharm Esh-Sheikh Agreement), 1999年9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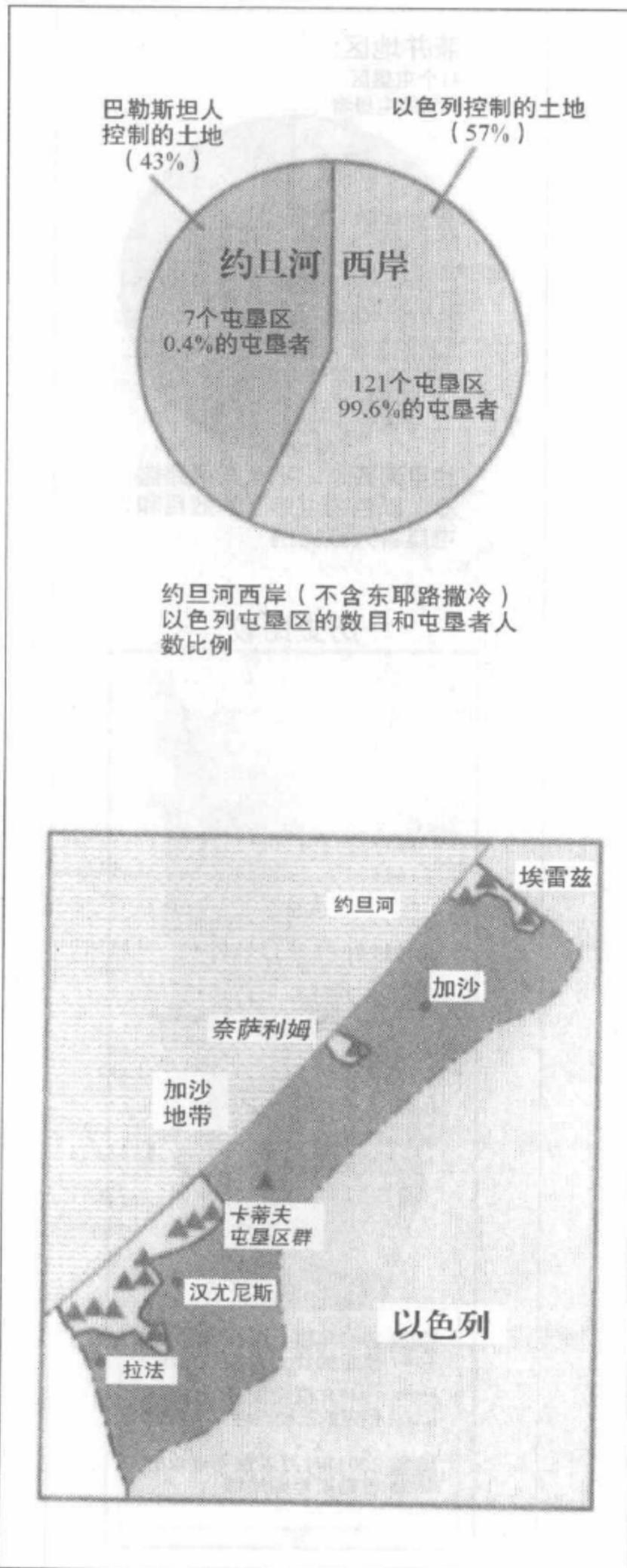
戴维营方案，2007年7月



塔巴谈判(TABA Talks)构想, 2001年1月



沙龙提议，2001年春天（迄今有效）



塔巴谈判, 2001年1月(迄今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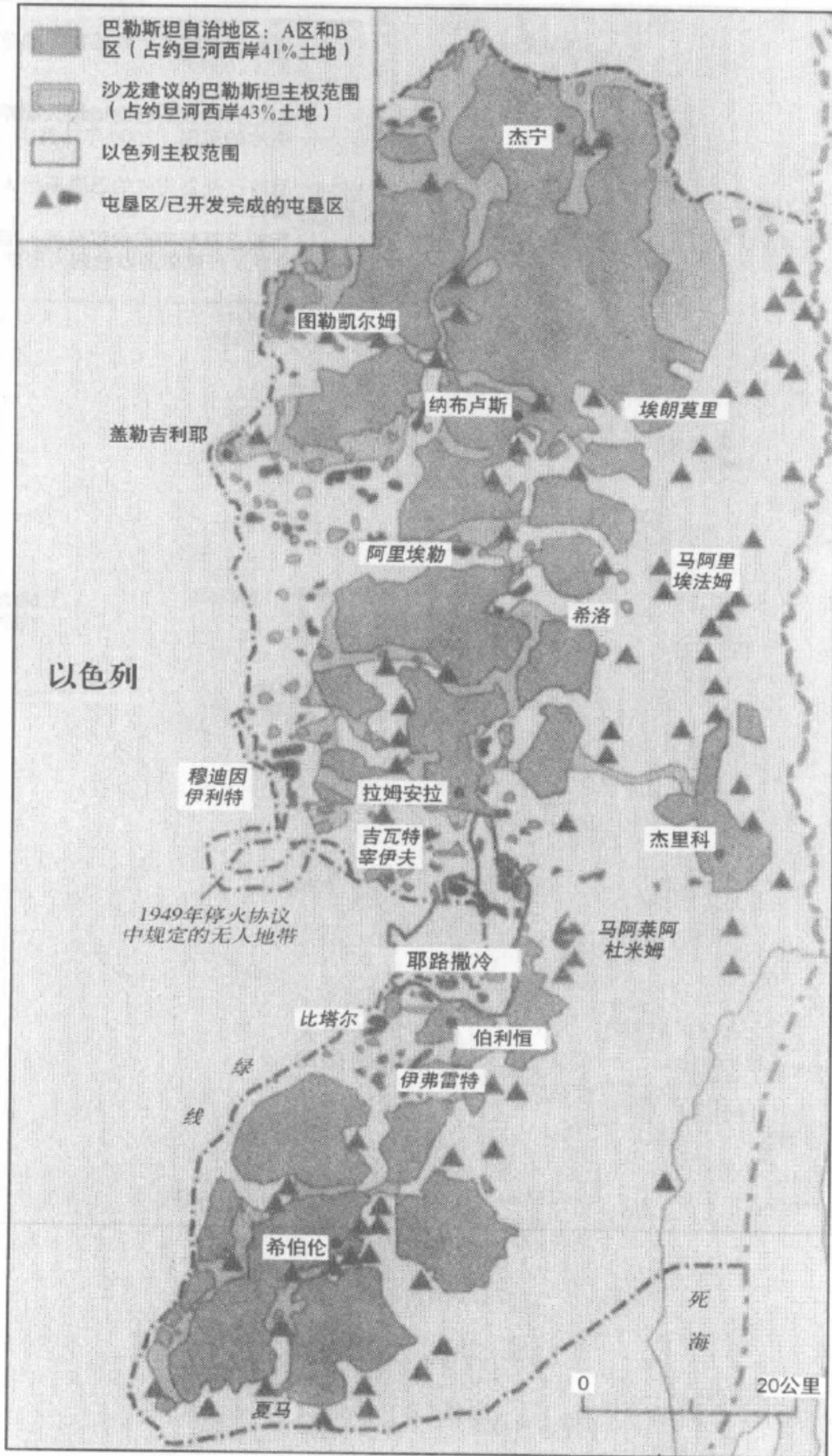
兼并地区:
41个屯垦区
65%的屯垦者



约旦河西岸 (不含东耶路撒冷) 以色列屯垦区的数目和屯垦者人数比例

历史比较





耶路撒冷市界：1947~2000

